# 北京牛街

刘东声 刘盛林

北京出版社

# 北京牛街

高戈 

刘东声　刘盛林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北京出版社

# 北京牛街

Beijing Niujie

刘东声　刘盛林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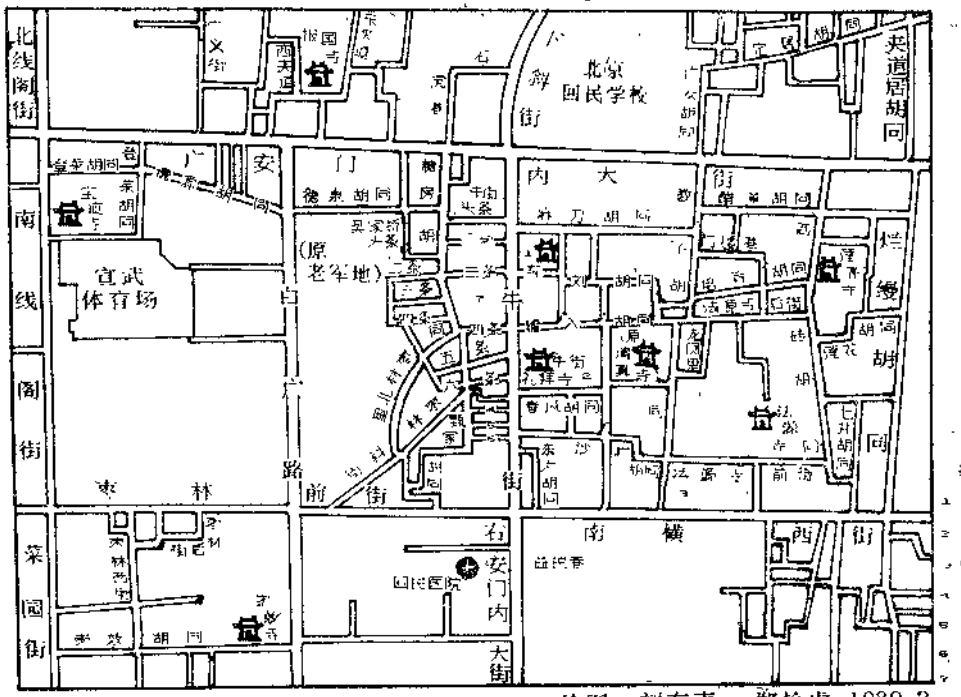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8000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ISBN 7-200-01002-2/K·94
定价：3.60元

# 牛街地区街巷示意图




绘图：刘东声　郑拴虎 1989.2



牛街鸟瞰



牛街礼拜寺所存康熙圣旨牌



从牛街看礼拜寺。红栅栏门后建筑为望月楼。

牛街礼拜寺大殿外观





大殿抱厦

大殿内部。最里面系密殿，其左右二窗为阿拉伯文窗棂。



礼拜寺院内邦克楼
（唤拜楼）



礼拜寺东南跨院内筛海坟



# 前　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56个兄弟民族。回族，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族，共有721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7%强。北京市回族人口据1987年测算统计为18.5万人，占北京市人口的2.01%，而其中宣武区占的比重尤大。宣武区人口56万多人，其中回族31900人，占全区的5.7%，大部分集中居住在牛街一带。

牛街作为一条回民聚居的街道，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尤其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央政权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很多民族政策都从这里制定推广到全国，各地的民族关系也必然反映到北京。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牛街礼拜寺矗立在这条街道上，接纳着来自国内外的穆斯林。因此，无论研究北京史、民族史、宗教史或近代史，都离不开牛街。长期以来，研究整理牛街的历史已成为牛街有识之士迫切的愿望。还在1978年，已故的市政协委员马祝三先生就曾各处走访，搜集了不少素材。1985年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征集与牛街地区回民有关的文史资料》的启事，并附发了征集提纲，两年多来搜集到30多万字资料，宁夏大学副教授杨明德（新民）、云南大学教授杨兆钧（涤新）、新疆文史馆王静扬（徵言）、北京大学杨汝佶（雪门）以及马敬儒、唐震宇、杨文

联、马崇义、刘树琛等老先生都撰写了重要的资料。1987年下半年起，经久居牛街的回民刘东声、刘盛林、马耀3位同志反复调查核实，由刘东声、刘盛林用8个多月的时间参考这些材料撰写了《北京牛街》一书的初稿，这就是今天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这本书，记下了有关牛街的翔实史料，实现了广大回民的宿愿，是值得庆贺的。

本书所撰写的资料，除牛街的历史沿革外，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为时间上限，如再往前提，就很难收集到亲身经历的资料了。时间的下限，基本上截止北京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和事，多有档案可查，知者较多，留待来日整理。当然有些事情很难以时间划线，解放后的情况也略有涉及。

由于我们接触面有限，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也都有局限性，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界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正补充。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年10月

# 目　录


前　言……（1）
沿　革……（1）
经　济……（29）
政　治……（74）
宗　教（清真寺）……（124）
教　育……（147）
医　药……（189）
民　俗……（197）
结束语……（214）

# 沿　革

牛街，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西南隅，呈南北走向，北起广安门大街，南至南横西街，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街道。牛街一带是北京市最大的回民聚居区。以牛街为中轴，在它的东西两侧，有大小几十条胡同，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回族居民。牛街回民聚居区由于历史悠久，不仅在国内颇有影响，在伊斯兰教世界也是闻名的。

历史上的牛街，其地理位置正处于唐代幽州藩镇城之中。后来辽的陪都——南京，金代都城——中都，都是沿唐代幽州藩镇城拓建而成的。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南城，在今城西南，唐幽州藩镇城及辽、金故都也。"《日下旧闻考》引文维简《塞北事实》："燕山京城东壁，寺名悯忠，盖唐时幽州镇城遗址……。"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称："（悯忠）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悯忠寺的位置确定下来，对于牛街的位置即可了若指掌了。牛街东距法源寺（即悯忠寺）约半里之遥，则牛街过去正处在幽州唐藩镇城的子城之中，是有文字资料可证的。

牛街，曾名柳河村、冈上、牛肉胡同、礼拜寺街。这几个名称，代表着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着它的历史沿革。

我们先从柳河村这一旧地名说起。作为柳河村，其前提一定是河水潺潺，绿柳掩映的所在。但是历史上的唐幽州镇城之内没

有河流经过的记载。据郦道元《水经注·濡水》载："……又东与洗马水合，水侧城南门东注……。"濡水，又名桑干河、卢沟河、浑河，即今永定河，下游自卢沟桥下通过，洗马沟是今天的莲花河。何以知道它是莲花河呢？《水经注》引《后汉书》："世祖（刘秀）与姚期出蓟至广阳（即今长辛店一带），欲南行，姚期与之奋战开道于洗马沟畔。"洗马沟既是刘秀等南行所要经过的河流，而这个河流又流经蓟城南门之外，所以洗马沟即今之莲花河可资证明；同时也就完全证实了唐幽州镇城内无河流通过。待到辽代，依唐藩镇城建立了陪都南京。辽统治者惯于"岁时游猎"，并无久住燕京之意，因此对这一原来的幽州镇城，并没有投入大规模的营建，只是在子城之内修建了一组宫室，以备辽主"游幸"而已。金灭辽以后，直至海陵王篡权，于贞元元年（1153年），金迁都于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大事营建中都，城池扩大，城市中心西移，据传在今白广路西侧附近。据记载，燕京城大半入宫室，规模宏丽，极其豪华。为了建设园林的需要，把发源于城西的所谓西湖（即莲花池）的水引入城中，河流自西而东，入城后南流。从这时起，城内即今牛街一带开始有了河流。今牛街稍西，有地名吴家桥，或系当年河道支流经过的地方而得名。因为北京地名中，凡以桥命名的地方，当年都曾有水、有河流。吴家桥这个地名给牛街一带曾有过河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清光绪《顺天府志》在牛街条内，引宋范成大《揽辔录》："乾道六年（1170年）使金，至燕山城外燕宾馆，燕至毕，与馆伴使副并事行柳堤……入金之丰宜门（金之南门），过玉石桥，上分三道，皆以栏楯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拦以杈子，两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龙津桥。"这就是当年金中都城内豪华景象的写照。

元灭金，金中都守将投降献城。缘蒙古军于1211年突破南口一带天险[①] 到1215年之役，蒙古人由古北口入塞，先掠取中都之东的景、蓟、檀、顺以及通州等地，然后再向西进攻中都[②]。当蒙古军包围中都不久，金守臣完颜承晖自杀，抹燃尽忠逃跑，中都居民开城投降[③]。根据史料记载，说明中都并未遭到兵灾的过多毁坏。况且蒙古将领石抹明安原来是金朝将领投降过去的，他们了解中都的特殊地位，而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政策。不幸的是，蒙古人进驻之后两年，即1217年，是年为成吉思汗十二年，岁在丁丑，着了一把大火，把金朝宫殿烧毁[④]。这之后，金都就日益荒芜了，昔日的宫阙变成了阡陌，剩下来的只有掩映着“御河”的垂柳，这就为以后“柳河村”地名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柳河村之名，最早也要到元大都建成之后若干年，那时南城（指金中都旧城）已完全沦为郊野，也就是柳河村被命名之时。

应该指出，自中都陷落到忽必烈称帝，其间尚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时的中都又改称燕京。尽管中都已成废墟，它仍然是大蒙古国所管辖下的“汉地”的首府。蒙古大汗派遣达鲁花赤（断事官）作为自己的代表，驻守在这里，以处理“汉地”的各种事务。也就是说，在金、元之际的燕京，仍是北方重镇，并不因为它的残破而减色。

牛街，又称“冈儿上”、“藁上”或“阁上”。清《顺天府志》在南燕角条下说：“南燕角，俗讹烟阁，少南曰燕藁儿，藁即角之误也。”看来冈、藁、阁，均系角字之讹音。更具体地

---

① 见《金史》卷十三《卫绍王纪》；《元史》卷一《太祖记》，卷一百九十《木华黎传》，卷一百二十《札八儿火者传》。

② 见《元史》卷一百五十《石抹明安传》。

③ 见《金史》卷一百一《承晖传》、《抹燃尽忠传》，《元史·石抹明安传》。

④ 见程巨夫《旃檀佛像记》，《雪楼集》卷九。

说，这几个字的讹音，均与燕角有关。燕角在什么地方？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燕角儿在广宁门、右安门内西南角。"所指的也正是牛街一带。有人明确指出："冈儿上"当系指现在广安门内，南线阁南口以东原来一片空旷地带的共名或泛称。犹如宣武门内南闹市口以北一带被称作"坡儿上"，西山模式口村以东被称作"碑儿上"是一样的。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冈上名称的来源是合乎情理的。但也有人认为"冈上"就是指这里地势高耸，以地貌而言。牛街过去地势较高是事实，今天牛街西侧房基均高出马路不少。但今天牛街一些老人仍把《冈志》称作《藁志》，把燕角称作"烟藁"或"烟阁"，南燕角、北燕角（即今南线阁、北线阁）读音为"南阳藁"、"北阳藁"。看来这两种解释都是讲得通的。"冈上"之名，至清初仍在沿用。

刊行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说："白纸坊，五牌二十一铺，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有"……牛肉胡同，大圣安寺，小圣安寺，教子胡同……。"从其地名的排列来看，"牛肉胡同"所指显系今天的牛街。而牛街一名，可能由牛肉胡同一名演绎而来。又据刊行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宛署杂记》第五卷《街道》载称，在白纸坊五排二铺有礼拜寺街，老君堂街……。不知为什么，较《胡同集》刊行晚30多年的《宛署杂记》，不沿原来"牛肉胡同"旧名，而另以礼拜寺街称之。目前只能说，牛街的曾用名又多了一个"礼拜寺街"而已。

牛街之名，或开始于清初，刊行于康熙二十五年的《日下旧闻》，已有牛街地名出现。但成书时间与《日下旧闻》差不多的《冈志》，则仍沿用旧名，令人费解。还有一说，牛街曾名榴街。因为这一带曾遍植石榴（是西域人带来的种子），用以名街。

并说牛街是榴街的音转。但是遍查坊巷籍志均不见榴街之名，况且石榴自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加以石榴在北京，由于气候的关系，不能遍植成林，只宜盆栽以供观赏。北京俗谚说："天棚、鱼缸、石榴树"，是老北京对有钱人家的一种形容，不独是回族。故榴街一名，恐嫌牛街之名不雅，想用榴街加以雅化吧！？

## 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和变迁

据历史记载，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可远溯到唐永徽二年(651年)。此后即有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不断来华。唐天宝九年(750年)安史之乱起，黑衣大食[1]曾派兵东来，帮助唐王朝平乱。安史之乱之后，这一支黑衣大食兵，多不愿返回，而被安置于九江地区并准许他们择配。这是第一次定居中国数量较多的西域穆斯林[2]。而更多的西域商人涌入中国是在南宋。宋偏安于临安(杭州)，国库开支浩繁，为了增收，乃大开海上贸易。设番掌司、市舶司，专理其事。在沿海各地对来华的西域商人，专辟居住区，称作"番坊"。坊内自成风气。当时称这些海舶商人为"番客"，他们之中有携眷者也有与中国妇女婚配定居的，其所生的子女称"土生番客"。这些"土生番客"在长时间里，子孙繁衍，人口日多。但在唐宋以前的中国政府，只认为他们是侨居中国的西域人，而番客自己也并未以中国人自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毕竟不再回去了，而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居民。日后，这些定居下来的番客，就成了回族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

① 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在阿巴斯王朝时中国对它的称谓。

② 穆斯林：阿拉伯文音译。信仰伊斯兰教者的通称。原意为"顺从者"，指顺从真主安拉的人。

蒙古人崛起，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大举西征，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随着战争的转移，就有大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细亚人被迁徙东来。人数多至数十万，其中一些年轻的军士，就被编入蒙古军的"探马赤军"① 服役。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元王朝。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下诏，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氓等"②。这样一来，众多来自西域的军士，在中国各地就地落户，并与当地中国妇女成亲。由于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原因，这些人很自然地聚族而居。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回民散处于全国各地，形成了无数聚居村镇，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以上简单概括地叙述了回民聚族而居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形成。北京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北京市内回民居住的情况，也呈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牛街则是"小集中"群里一个较大的回民聚居点。牛街回民的来源和这一聚居区形成的起因和年代，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文字记载，这里仅就史料所及作初步的探讨。

前面，叙述历史沿革时，曾谈到牛街的历史地理。牛街位于唐代幽州藩镇城，即辽、金故城之中。从历史记载来看，辽与回纥人往来很密切，并有与大食王联姻的记载。辽与回纥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是很多的，如在辽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南门外有回鹘③ 营，即回鹘商人居住的地方，犹如南宋的番坊。但在

① 探马赤军：成吉思汗攻金时，以所属部族编为五部，名为"探马赤军"。除蒙古族外包括色目人和汉人。在战争中出力很大。探马赤军实际类似野战军的性质。

② 编氓：即编民。氓字据古训为"自彼来此之民曰氓"。就是外地流入的人民。

③ 回鹘：即回纥。唐贞元四年（788年）改回纥为回鹘，元明时称畏兀儿，即维吾尔族。

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并无回回营（即回鹘营）的记载。到了金代，金把辽的南京变成金的都城中都，金拓建了南京，使城内“大半人宫室，百姓绝少”。在这种情况下，城内，尤其是临近其“大内”的现在牛街附近，恐难有回民聚居于此。1215年金中都为蒙古军所攻占，从此北京地区发生一场新的变化。从中都被蒙古军攻陷至忽必烈称帝，这期间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都被改称燕京，如前所述，燕京仍是北方的政治、军事重镇。

蒙古族的统治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处理上，乃至日常行政管理等等，多依靠色目人。色目人当中主要是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细亚的回回。据记载这里曾聚居着数以万计的回回人口[①]。还有人考证，牛街礼拜寺就是始建于元代的。从寺的规模也可想见当时这里的伊斯兰教徒之多，这不仅可以窥知当时人口的多寡，更可推断这一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年代。更有实物可凭的是目前牛街礼拜寺内东跨院，有两座筛海[②]坟，墓石上镌刻着古语法的阿拉伯文。西边所瘗者为筛海阿哈默德·布尔塔尼，殁于至元十七年八月（1280年）；东边则是筛海阿里，殁于至元二十年十二月（1283年）。这两位筛海很可能是牛街寺的掌教，先后逝世于此。筛海墓的存在，不仅可以作为牛街寺创建年代的物证，也是牛街回民聚居区形成时间的一个旁证。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一般通例，凡有清真寺的地方，即必须当地穆斯林聚族而居。这是因为，过去的清真寺不仅仅是为教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它也是聚

① 见王恽《秋涧先生集》卷88：“今体察到本路（中都路）回回人户，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统四年续抄，计二千五百九十三户。”按平均每户五口人计算，人口达万余。

② 筛海：阿拉伯语译音。指伊斯兰教中具有很高宗教学识和修养的人，也可以解释为“长者”。

居区社会活动的中心。早年清真寺的伊玛目① 不仅掌握宗教权，在其所辖的坊② 内，教民的婚、丧等生活问题甚至民事争端的调停处理，也都过问。这种情况，恐与伊斯兰教的教规和当年“番坊”组织有关。坊内自成系统，伊玛目就是坊内当然的首脑。正因为清真寺在聚居区内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哪里有回民聚居，那里必定有清真寺。以同样的道理，牛街礼拜寺最可靠的始建年代是在元朝。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是在牛街礼拜寺建寺稍前的年月。至于传说中，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朝(宋太宗至道二年，即公元996年)，或按当时这里政权属辽，在辽圣宗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的说法，将在本书清真寺章节内加以叙述。我们认为，这一说法目前没有发现较为可靠的文字佐证。在这里姑存此说，以留待今后研究。

元建大都于旧城之北。大都建成后元帝下诏，旧城居民迁移新城者，其条件是：“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元朝的穆斯林确有不少人身居要职，从这规定可知凡有钱人家或在职官员，优先迁入新城，而旧城内剩下来的只有平民百姓。于是使旧城更染上一层穷苦的色彩，越加显得荒凉了。据记载，有一个时期，原中都的遗丘废墟之间，已成了杀人越货、逃役走私出没之所。元王朝为了大都本身的安全，不得不多次在旧城进行剷除活动。至明

---

① 伊玛目：阿拉伯语音译。即清真寺内掌管教务的人。在伊斯兰教国家伊玛目与中国所说的“阿訇”没有什么区别。“阿訇”是波斯语，北京习惯汉译为“教长”。而伊玛目在中国回族中指的是清真寺的行政负责人。过去伊玛目是世袭的，子承父职，汉译为“掌教”。清真寺内伊玛目为大掌教，还有二掌教(海推布)、三掌教（穆安金），也为世袭。而阿訇则是聘请的，任期届满可以换人。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已取消了世袭制度，寺务由“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阿訇，为取得和国外一致称谓，有时也称作伊玛目。

② 坊：市街村里的通称。旧社会回族聚居地区，按清真寺对居民区执行宗教活动的范围，称之为坊。犹天主教的“教区”。回民过去说“坊上”就是指一个地区，“坊众”即指这一地区内的回族群众。

初，这一带也仍是荒凉的郊野。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明王朝为了首都的安全，建立了外城或称外罗城，遂使城外的西南一带，圈入城中。尽管牛街一带圈入城内，并未改变这里的郊野面貌，因明代供皇宫蔬菜的"官家菜园"都设在这一带，如官菜园、南菜园等地名沿用至今，即是很好的说明。至清初满族人刚刚进驻北京时，为了"拱卫皇居"曾驱除非满人于城外，并规定汉官除有赐第或在中枢当值者，也不得留住于内城，所以汉官们、文士们纷纷下榻于"宣南"，尽管这一带也曾有过名士们的居处，但总的来看，南城一带比其他地方还是荒芜一些。实际上，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牛街南口外，东边有很大的乱葬岗，两边则为豆纸作坊、菜园、粪场，仍是荒凉的郊野旧貌。据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冈志·小引》中介绍说："明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耸，居教人（即回民）数十家，称曰冈儿上。居民多屠贩之流，教之仕宦者，率皆寓城内东西牌楼（东四、西四牌楼），号曰'东西两边'。居两边者，视冈上为乡野。嘉靖年间增筑外城，则冈上为城内地。明亡，大清兵入关，驱民出城，居两边者失其所有，遂尽趋冈上。迩来时移世易，年久贫富变迁，向之茅舍零星者，今且烟火万家矣。"这百十多字，说出了自明至清牛街地区的兴衰。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其他情况，下面做些说明：

一、明时北京回民当中的富有者居"东西两边"。虽然说的是明代，却也使人联想到元代大都城内回回的居住情况。前面说过，大都建成后，曾诏示有钱有职者优先迁入新城。迁入新城的回回，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需要，仍聚族而居。他们当时落居何处，应该就是东四、西四，也就是明朝所说的"东西两边"。明代的北京城，只把大都城的北边（即自今土城至德胜门）五里割去，其南沿向南拓出二里（即自原来长安街一线向南推至今

“前三门”一线）。所谓“东西两边”，元、明两代当不会有很大变化。今天仍完好的东四清真寺和西四的锦什坊街清真寺，都在元大都城内，且两寺都有始建于元的记录，它们的位置也正合明代的“东西两边”的说法。可见聚居“两边”的回民，是元代延续下来的。尤有令人可信的是“居两边者，多仕宦之家”，这也正符合大都建成时迁入新城者以“有贵居职者先”的情况。沿袭到清末民初，东四、锦什坊街的坊众乡老① 仍以任公职和有文化的人居多。从居民的职业构成和财产状况来看，也可以作为这里的回民是元代回民后裔的一个佐证。

二、《冈志》说，清兵入关后，“居两边者……尽趋冈上”，使昔日荒凉的冈上，一变而成“烟火万家”的景象。清初的北京曾把城内“分列八旗，拱卫皇居”。当时不仅回民，连汉人也一起被驱赶到外城。但为时不久，城内被赶的居民又搬了回去。《冈志》说明了这个变迁。如“康熙已卯（康熙三十八年），东城豪富金、张诸姓”对舍云善（舍，回民特有的姓氏，读如瑟）阿訇“扫榻候之”。于此可知，康熙中叶，回族有钱人家又成了内城的居民；同时处于内城之中的禄米仓和什刹海等清真寺都建于康熙初，这就更加说明，内城不仅有回民居住，而且已形成了新的聚族而居的回民网点。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牛街回民聚居区最初形成于元代初，历元、明、清以迄于今，伴随着回回民族的发生和发展，她始终是北京回族聚族而居的最大的地区。

## 牛街回族人民的来源

北京自战国时已成为燕的都城蓟城，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

① 乡老：信仰伊斯兰教虔诚、经常参加宗教活动而又热心宗教事务的人。

史。辽代在此建立了陪都，金代在此建立它的首都。元、明、清三代北京都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从一个地区性中心，发展成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历史上，北京地区从来就是各族人民进出往来的地方，各族人民在这里互相融合。远自秦汉时期开始，如匈奴、鲜卑、乌桓等民族曾大量涌入幽州。魏晋时鲜卑拓跋部和丁零、高车等族的涌入北京，较秦汉时尤多。唐代，由于执行了民族开放政策，北京地区涌进了更多的少数民族。以后这些众多的民族，有的被赶了出去，有的被融合于民族大家庭之中。只有回回民族，自元代大量涌入北京后，至今仍和其他民族共同生产、生活于首都。直到今天，北京回民在全市有50多个聚居区点，分布于街道、村、镇，它和全国少数民族杂散地区城市的回民来比，人口数和密度都占第一。基于回民在北京市居住时间之长，以及人数之多都超过了居住在北京的其他少数民族，可以说，称回族居民为“老北京”是当之无愧的。

牛街的回民，除元代定居下来的以外，据《冈志》载称：“今燕都之回民，多自江南、山东等省份分派来者。何也？由燕王之国，护卫军僚，多二处人故也。教人哭父曰‘我的达’，其亦山东俗也……”。《冈志》所介绍北京回民的来源，符合多年来在牛街流传着的：“祖先是随燕王扫北，揪着龙尾巴来的”的说法，即指朱棣曾封燕王，封地在今北京（当时称北平）。所谓“燕王之国”，即是朱棣就燕王封，自南京北来。如今牛街仍有所谓“门刘家”，据自称，他们来自南京水西门刘家；再如有梁姓称大顺堂梁，据说他们祖辈是燕王随军厨师，大顺堂是朱棣赐的堂号。

北京牛街的回民住户，在相互称谓上有个特点，在姓氏之前，都有一个类似汉族的“堂号”（如“三槐堂王”之类）性质的“定

语”，便于区别同一姓氏的人家。这种“定语”一般称作姓氏的“小说”。如上面所举的“门刘家”等等。这些小说，有的能说明这一住户来自何处，有的则是说明它的职业。姓氏“小说”对于考证牛街回民的来源、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冈志》中列举了当时牛街回民的姓氏，在今天的牛街，上述姓氏有的仍可找到。

## 牛街回民聚居区的街巷和聚居区的疆域

牛街回民聚居区，随着它的兴衰、人口的多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疆域”。因为聚居区不同于行政区划那样有定界，要考察它的疆域就只能依据回民聚居的街巷和街巷的方位。《冈志》有《街巷》一章，它把冈上范围内的各条胡同一一列举出来，其中有的地名已不可考，有的地名尚可在旧坊巷籍志中找到。现就《冈志》所列的地名逐条加以考订和说明，这样既可弄清冈上地区清朝时与今天的四至，也可进一步了解牛街的历史和人民的来源，以及当地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宗教生活等情况。《冈志·街巷》内所列地名如下：

### 街　巷

东街（俗名轿子胡同）、西街（俗名牛街）、大圣安寺街、火药局、小圣安寺街、贞节坊（俗名熟肉胡同）、栅栏胡同、白纸坊、枣林街、愍忠寺街、瓦街（俗名羊肉胡同）、簪儿胡同、麻道胡同、香儿胡同、老军地、醋张儿胡同、郑家园、甄家穿店、丁

家穿店、史家坑、水平庵、陈家园、穆家园、薛家园、楼房坑、白马寺坑、旧栖流所、旧象房、邵家夹道（据清《京师坊巷志稿》，邵应为邹）、王乡老夹道、白家园、火神庙胡同、井巷、糖房胡同、干面胡同。

下面，就对上列各条街巷逐一加以考证和说明：

1．东街。东街，是教子胡同的别名，教亦作轿。《冈志》注称："东街，俗名轿子胡同。"其实这条胡同的本名就是教（轿）子胡同。东街才是俗称，只有居住在冈上的回民才用这个叫法，因位于牛街之东故称。教子胡同与牛街是平行的，街的长度与牛街相若。牛街与教子胡同之间，有东西走向的麻刀（《冈志》作"麻道"）胡同、寿刘胡同、春风胡同（《冈志》作"王乡老夹道"）、沙栏（《冈志》作"栅栏"）等胡同沟通其间，把东、西两街连在一起，成为牛街回民聚居区的主干。

教子胡同是北京一条古老的街巷。明代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以后简称《胡同集》）载："五牌二十七铺，在新城右安门里东，宣武门大街南，有教子胡同。"清《京师坊巷志稿》说："教子胡同，教或作轿。自教子胡同以西多回人所居……。"清初，在教子胡同南口处，还有一所著名的园林，就是赵吉士所营建的"寄园"。据《曝书亭集》描述寄园的情形时说，"赵恒夫（吉士）所居寄园，浚池累石，分布亭馆，种花木。海内外名士入都，恒流连不忍去……"。以后，乾隆四年进士、著名诗人沈德潜也在寄园内住过。著名学者、《日下旧闻考》总编纂朱彝尊也曾到此盘桓。可知清初的教子胡同南口处，既有园林之胜，复得名流燕赏，骚客盘桓之所。

教子胡同中间稍南西侧，有著名的教子胡同清真寺，亦名永寿寺，牛街回民皆称为"东寺"。东寺建于明清之际的连班、独

班聚讼纷纭之秋①，寺的规模不减于西寺（牛街礼拜寺）。

2．西街。即牛街，按“西街”之名，是牛街回民给予的称谓，不载于坊巷籍志。

3．大圣安寺街。《冈志》对大圣安寺街的提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据《胡同集》的提法，只把圣安寺按古迹列出，因当时这一带居民散落，尚未形成街巷。按圣安寺系建于金代的古刹。据《析津日记》载：“圣安寺，其地名东湖柳村……。”因此这个寺又称“柳湖寺”。据记载，原来门前有著名的怪柏二株，寺内有金世宗、章宗和李宸妃的画像。还有明代著名画家商喜所作的壁画。进入山门后有天王殿、瑞相亭、大雄宝殿等建筑。这些遗物今已荡然无存。只余山门尚立于道旁供人凭吊。瑞相亭，式样古朴玲珑，现已移建于陶然亭公园东北角山顶上。最令人痛惜的是明代画家商喜所作的壁画，解放后有关部门曾加意保护，不幸毁于十年浩劫中。原来圣安寺的前面是湖波荡漾、绿树掩映的去处。有人认为东湖柳村与柳河村有关，因为它们近在咫尺，牛街既称柳河村，而湖柳是否系柳河之误？抑或由柳河溢流，汇而成湖，这些都是揣测，已不可考了。到了清代，从乾隆北京街巷图上看，这里标为南横西街（与今名巧合），但是，刊行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日下旧闻考》则称：“圣安寺在圣安寺街”。光绪《顺天府志》亦同。至民国初，据有关记载描述，这一带仍是“多菜圃、坟场，居民散落”的荒凉景象。牛街人曾把这地方称作“南沟嘴子”，盖以牛街有南北走向的下水暗沟，至牛街南口

① 连班、独班：伊斯兰教规定，作礼拜时有七个人以上就要站成横排，名曰“班”；人多时可以排成若干“班”。不足七人时可以自己随便站。“连班”就是领拜的人和被领的人站在同一班里；“独班”是领拜的人从班里站出来单独一人站在领拜的位置上。所谓连班、独班之争，实际上是对教义不同解释的争执，也是乡老间的派别之争。

处即变为明沟，其沟口高大，终年淌着污水，令人掩鼻。再后这里曾名“牛街南口外”、“南横街西口外”等地名。直至1956年整顿北京城区街巷地名时，才把这里改名“南横西街”，即东起今菜市口胡同（原丞相胡同）南口，西至枣林街东口。更具体地说，就是把原来的南横街向西延伸了。

50年代，圣安寺内曾成立武训小学校。自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后，小学校名即改为圣安寺小学。再后，圣安寺曾一度为牛街地区的少年之家。圣安寺稍东，为解放后在荒地上建起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绿色阿拉伯式圆拱建筑（当地俗称“大绿包”）矗立于教子胡同南口外。今圣安寺附近，居民楼群林立，昔日荒凉景象已不复存在了。

4．火药局。据清光绪《顺天府志》在右安门大街条下载称：“……右安门西半里许曰三圣观。又西曰火药局……。”后来就火药局址建成“财政部印刷局”，但过去牛街老人仍把印刷局称之为火药局。《冈志·疆域》中记载：冈上回民聚居区“南至白马寺、鱼脊庙”。按白马寺在旧坊巷籍志中尚有记述，鱼脊庙在《冈志·灾异》内曾谈到过：“……鱼脊庙在西街（牛街）往南，地势洼下，乃东西二街交会处。庙建于大路之中，直对右安门。中塑山神五道之像。庙之鸱吻作二鱼尾形。无碑碣可考，今已基址无存。”上述文字中，虽未确指其地，但若与白马寺一线，仅牛街南口外稍南，距火药局尚远，因此说，火药局不应包括在冈上地区之内。另从沈凤仪钞本《冈志》的笔迹上观察，火药局三字与原来笔迹不一致，恐系后人加的。

5．小圣安寺街。明《胡同集》在“圣安寺”之后标有“小圣安寺”。至于“小圣安寺”究在何处？《日下旧闻考》等坊巷籍志只说“已无考”。查《胡同集》和《冈志》都把大、小圣

安寺顺序列出，可见二寺相距不会太远。今天牛街有一胡同名"小寺街"，是一条走向不规则的胡同，呈南北、东西走向，北起输入胡同，南至南横西街，南口处与圣安寺紧临；东至教子胡同，西与春风胡同相通。小寺街地名的来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小寺街系因教子胡同清真寺得名，因该寺俗称"东寺"或"小寺"，且寺之后窑殿即在小寺街；一说因小圣安寺而得名。大、小圣安寺既相距不远，而小寺街的南口几与圣安寺毗连，据传小寺街也确有过一座小庙。

第一说把东寺称作"小寺"，是在"连班"、"独班"聚讼不休，宗教派性争执剑拔弩张形势下的一种"派性语言"，说"小寺"，是对东寺的贬称。再以教子胡同清真寺其正门在教子胡同，并不在小寺街，看来第一说是不能成立的。说与小圣安寺有关，无论从地理位置、各种坊巷籍志上对大小圣安寺的排列顺序以及牛街对小庙传说的旁证等来看，都是令人信服的，应以后说为是。

6．贡节坊。《冈志》注称，贡节坊即"熟肉胡同"，即今输入胡同。根据什么说贡节坊就是输入胡同？《冈志》未作进一步交待。在旧的坊巷籍志中也找不到贡节坊其名。清《顺天府志》称："熟肉胡同，熟亦作瘦"。《宸垣识略》所附的外城西南图，也标为"熟肉胡同"。民国后均作"输入胡同"（见民国期间刊行的北京街巷图）。按由"熟肉"一词音转为"输入"，显系民国后对地名进行雅化而成的。其实"熟肉"与牛街地区屠宰牛羊有关。熟肉者可有二解，一为经过煮制的肉食品，至今牛街人仍把酱牛肉称为熟肉；一系牛、羊肉业的行话，凡牛、羊活体经屠宰后所得的鲜肉，均称作熟肉。当年这一带牛锅房林立，是北京牛肉的集散地，因此熟肉之名，当与屠宰业有关。

7．栅栏胡同。即今沙栏胡同。西起牛街，东至教子胡同，与小寺街相交，北与春风胡同相通。“沙栏”或“沙拉”是古称。清《顺天府志》载：“栅栏胡同，栅栏或作沙拉。”“沙拉”乃蒙古语珊瑚之意。以沙拉一词名街的，不仅牛街这里有，今鼓楼东的纱络胡同，旧地名也叫沙拉胡同。据清《顺天府志》在介绍沙拉胡同时曾援引《析津志》的记载称：“沙剌市一巷，皆卖金银珍珠宝贝，在鼓楼前。”接着按称：“沙剌即沙拉，国语谓珊瑚也。”《日下旧闻考》译作舒鲁。乾隆十五年（1750年）北京地图称为“小栅栏”。

牛街出现以蒙古语沙拉命名的胡同，并非偶然。前面已经叙述过，牛街的所在地，在大都建成之前，有半个世纪是中都旧城蒙古人管理“汉地”的政治中心，是达官富贾云集之所。这里出现金银珠宝的沙拉市是合乎情理的；况且回回向以经营珠宝为传统行业，从西域贩售珠宝，并有“识宝回回”之称。沙拉胡同很有可能是大都建成之前在旧城的沙拉市——珠宝市。

8．白纸坊。据清《顺天府志》援引《张远隩志》：“南城诸坊，白纸坊最大……。北自善国寺，南至万寿宫，西极天宁寺，皆是也。自嘉靖筑新城后，坊划而为两矣。”可见，白纸坊乃是地区名，而非街巷胡同名。冈上许多地方是在白纸坊辖境内的，而《冈志》复将白纸坊也作为胡同名列入，是不正确的。况从沈钞本的《冈志》上看，白纸坊三个字的笔迹，与原笔迹不同，像是后加进去的。现牛街以南右安门大街西侧为白纸坊街道办事处管辖，仍是地区名。

9．枣林街。是北京一条较为古老的街巷。明《胡同集》说：“白纸坊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有‘枣林儿’。”可知明嘉靖年间，这里还是一片枣林，尚未成街。可能到了清代

才形成街巷。《析津日记》记载："嘉靖辛亥(1551年)太监李朗于崇效寺中央建藏经阁，阁北有台，台后有僧塔三，环植枣树千株。"这千株枣树蔚为枣林，即《胡同集》著录"枣林儿"的依据。后来这一带形成街巷，因以枣林名街了。又据清《顺天府志》说："枣林街东距牛街半里。"又说："崇效寺在唐城内，旧地名柳河村。"这样的记载已明显说明，枣林街是当年柳河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冈上回民聚居区应是无疑的。

自明代嘉靖间称这里为"枣林儿"之后，迄今400多年的时间里，以枣林之名，又派生了以下几个地名：枣林前街，枣林后街，枣林斜街，枣林前街夹道，枣林北里，枣林西里。

10．愍忠寺街。愍忠寺建于唐代。清雍正十二年重修，赐名法源寺。经查各种坊巷籍志表明，以寺名街乃开始于民国初年。如《日下旧闻》、《日下旧闻考》等都未曾把愍忠寺所在的胡同称作"愍忠寺街"。直至清光绪的《顺天府志》也还是在西砖胡同条下说："西砖胡同西有法源寺，寺前门在白帽胡同。"按白帽胡同即今之法源寺前街。也就是说，到了光绪年间，这里仍未以寺名街。为什么这里形成街巷较晚呢？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带空旷，旧时较多坟场义地；二是法源寺四周多为停放待葬棺木的"灵房"，从而影响了民居。既是这样，《冈志》上"愍忠寺街"的出现，看来是后人揣测加上的。

11．瓦街。《冈志》在瓦街之下注明"俗名羊肉胡同"。经与《胡同集》相核对，其注解是不正确的。《胡同集》把瓦街作"瓦街儿"，并说："五牌二十一铺，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有羊肉胡同、礼拜寺……老君地、瓦街儿、纸坊胡同……。"从《胡同集》的记载来看，瓦街和羊肉胡同不是一条街巷；而从其地名的排列上来分析，羊肉胡同与礼拜寺及老君地相近，当是牛

街羊肉胡同（即今牛街四条）。瓦街儿则在老君地之西邻近纸坊胡同（或即今白纸坊胡同）。据此可知瓦街儿的具体位置已是靠近今天的白纸坊，是冈上回民聚居区的西南一角了。乾隆十五年地图称为生肉胡同。

12。簪儿胡同。清《顺天府志》：“簪儿胡同，北有谢文节祠。”谢文节祠，俗称谢公祠，今在法源寺后街（清光绪年间簪儿胡同东段尚未以法源寺名街）。谢公祠的面积很大，曾占簪儿胡同东部的4/5。簪儿胡同东部南侧为法源寺北墙，北侧即是谢公祠。原来簪儿胡同仅在西口至龙凤坑(今龙凤里)北口再东一点，有几处人家。今天这里已成居民密集的地方，如法源寺后门及其一部分院落，已辟为居民点，名为法源里。谢公祠后门，原来也是一片空旷之地，居民散落。过去，自教子胡同以东至西砖胡同之间，原属“南营箭厂”，是清代南城守备营打靶演箭之所，故俗名“箭厂子”。目前已成桅灯厂厂房。

按谢公祠，乃纪念南宋末年谢枋得的祠堂。据《宋史·谢枋得传》：“……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才为急，欲荐枋得为功。枋得见天祐，傲岸不为礼。与之言，坐而不对。天祐怒，强之而北。至元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师，问谢太后攒所及瀛国公所在，向之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憨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不食而死。”明景泰七年，谢与文天祥同赐谥，天祥曰“忠烈”。枋得曰“文节”。这就是谢公祠的由来了。现谢公祠已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13。麻道胡同。清《顺天府志》作麻刀胡同，刘仲泉先生在《冈志》“补志”中解释：“麻刀胡同，又名马道胡同。”虽然旧的坊巷籍志均不见马道胡同的名字，但事出有因。缘憨忠寺在唐幽州镇城的“子城东门外东百余步”，据此，则唐城的子城东

沿，约在今教子胡同南北一线上，而麻刀胡同东口处，可能即当年子城城墙的一个马道口，后来形成街巷时，即以“马道”名之。至于“麻刀”二字乃“马道”的音转。根据该地历史地理位置来考察，这一说法还是合乎事理的。

解放前，麻刀胡同南侧为湖南义园(俗称花园子)。这个义地几乎占据了这条胡同的1/2，园内坟丘累累，棺木多系暂厝，状极荒凉。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湖南义园的棺木迁至颐和园以北的西北旺，平整了土地，建起了楼房。这里现为中共宣武区委、区人民政府、区法院所在地。原义地西侧有小胡同，南与寿刘胡同相通，旧时称“花园子胡同”。1956年已并入寿刘胡同。

14. 香儿胡同。清《顺天府志》在牛街条下载称：“牛街……又南有回人礼拜寺。北小胡同曰香儿胡同，南小胡同曰巴家胡同……。”从文字的叙述看，香儿胡同似在礼拜寺之北，现在已无此胡同，恐早废。30年代北京街巷图标有“香饵胡同”，在糖房胡同之西。北起广内大街，南抵老君地旷地。查此地虽仍属冈上地区之内，但过去住户稀少，且回民住户密度不大。1956年以后，这条胡同已并入德泉胡同。

15. 老君地。明《胡同集》作老军地。是牛街回民聚居区的“西陲”。据传，早年的老君地向西至南线阁一带，房舍栉比，居民稠密。另据记载，老君地之北，旧有“峨眉禅林”，康熙初建。当时还有许多达官富户，居住在附近。峨眉禅林也曾一度是名流宴咏之所，可以想像当年这里是车水马龙、熙攘热闹的去处。但在康熙二十二年的一次地震之后，大户纷纷迁离，遂使这里陷入荒凉境地。翻开30年代北京地图，可以发现牛街稍西，乃是一片空旷。这里夏天高粱玉米遍地，秋收后至冬初时节，老君地的田野上，到处驼铃当当，使人有置身子塞上之感。牛街回民经营驼

行，即骆驼运输业和屠宰业的“骆驼锅房”，多在老君地和吴家桥一带。

老君地东侧，即羊肉胡同西口外稍南，当地人称之为“西巴巴坟地”，有一座筛海墓，传说是一位西域学者葬此。墓四周有短墙和木栅栏门，坟前有墓碑。每逢伊斯兰教节日，当地穆斯林多来此“游坟”（念经扫墓）。自这一带建筑兴起后，筛海墓被拆除，墓碑亦不知下落。

今天老君地已为高耸的楼群所代替，但已不是回民聚居的地区；老君地的地名也已消失。今天的枣林北里，就是过去老君地的东沿。

16．醋张儿胡同。清《顺天府志》作“醋张胡同”。今作“醋章胡同”。西起教子胡同，东至烂缦胡同，中间与西砖胡同交插。它是冈上回民区靠东的胡同，向来回民住户密度较小，近年来回民住户尤少。

17．郑家园。已不可考。

18．甄家穿店。过去牛街一带地处城区西南隅，临近广安门。海运未通时，广安门为北京通往南方各省的孔道。当时运输工具主要是马车，因此大车店就应运而生。一般的大车店占地面积很大，设前后门，便于大车来往，行人穿行。日久，有些地方即以店名代街名，如甄家穿店，丁家穿店就是。牛街的甄家胡同，就是甄家穿店演变而来的。原来牛街中间西侧的甄家胡同，在东口处有木质牌坊一座，横眉有“财政部印刷局”字样，实际是一座路标，牛街人俗称之为“大牌楼”，把这条路称之为“印刷局路”。当时通往印刷局的马路只有这一条，这条路除工人上下班时行人较多，平时很清静；另外，一年一度牡丹盛开的季节，这条路又是通往崇效寺（俗称牡丹花庙）的主要通道，赏花人群络绎

不绝。目前这条路改名枣林斜街，甄家胡同只余斜街东口南侧一小段，算是保留了这个地名。

19. 丁家穿店。这是个旧地名，原来在盆儿胡同以西。据清《京师坊巷志稿》（卷下）盆儿胡同条下载称："……盆儿胡同之西皆旷地也，旧有丁家穿店，邹家穿店，今皆废。"这是冈上地区靠东南角的居民点。

20. 史家坑。曾名史家胡同，即今西砖胡同北段的一部分（见民国初北京街巷图）。以后西砖胡同向北延伸，乃将史家胡同并入。

21. 水平庵。无考。

22. 陈家园。无考。

23. 穆家园。有谓即穆家胡同，现名牛街六条。小巷走向曲折，早年只有北侧有几户人家。

24. 薛家园。相传，牛街南口外东侧有一片土阜，俗称"薛上坡"，或即薛家园的遗址。并说，园子的主人薛姓是个大户，为珠宝商人，或说是康熙年间任钦天监夏官的薛宗俊及其弟宗伟的故居。后来家道中落，园子卖掉，房屋卖了"拆货"①，遗下的废墟，日久积为土丘，故有薛上坡之名。其具体的地址，就在圣安寺对面。解放前还是一片土丘，现已成为益民巷居民楼群。

25. 楼房坑。据考证，楼房坑即龙凤坑的音转。这个地方位于教子胡同东侧。清《顺天府志》在教子胡同条下说："……东小胡同曰龙凤坑。"这条小巷的南端地势洼下，与北口的法源寺后街落差很大，形成大坑。西侧有小巷名穿堂门，可达教子胡

① 卖"拆货"：一般指拆卖房屋，把砖、瓦、木料，按旧建筑材料出售。北京土话谓之"卖拆货"。

同。龙凤坑现名龙凤里。

26. 白马寺坑。也是旧地名，在盆儿胡同以西，早废。另据《宸垣识略》载："白马寺在宣南坊悯忠寺南，地名添官保，隋刹也……今寺已圮，其地名白马寺坑，明碑尚存。"50年代初，在教子胡同南口外，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对面之北京工业大学土建时，迁坟掘地，掘出"白马寺界石"一方。估计白马寺坑即在此一带。

27. 旧栖流所。在坊巷志书中无考。所谓栖流所者，乃是收容流民的暂住之所。查今小寺街东口路南42号，是一处很大的院落，国民党时期做过教养院，后改为社会救济院。考虑到教养院、救济院乃至栖流所，其性质大体相近，而且过去的机关衙署，往往前后相沿，因此旧栖流所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栖流所不是巷名，是机构名，可能早年这一带尚未形成街巷时，即以衙署名称代替了街名。

28. 旧象房。在今广安门内报国寺。据清《京师坊巷志稿》上卷，在头发胡同条下援引《燕都游览志》："真如寺元季为定力院，南向，今之象房是其山门。盖象房初设于报国（寺）古松之畔，所隔城致稍赴阙，乃割定力院为驻象所。"从上述记载可知，旧象房就是指报国寺而言。另据《冈志·疆域》说，"北至报国寺"，两相印证，旧象房即是报国寺。

29. 邹家夹道。清《京师坊巷志稿》有邹家穿店，在盆儿胡同之西，与丁家穿店毗邻。《冈志》所说的邹家夹道，揣系与邹家穿店有关。按北京胡同和夹道之类的小巷，不少是由原来的"穿店"演变成的。

30. 王乡老夹道。清《顺天府志》作王老胡同，并说今废。这个王老胡同，可能是王乡老胡同之误。按"乡老"一词，是回民

特有的称谓，凡热心清真寺事务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都称之为乡老。民国以来，称王老师傅胡同（见《燕都丛考》及30年代北京街巷图）。盖以这条小巷紧临牛街礼拜寺南侧，原来牛街寺的世袭伊玛目王姓，即祖居于此。疑王乡老或王老师傅之名，均与王姓伊玛目有关。现在这条胡同改称春风胡同。

31．白家园。无考。

32．火神庙胡同。旧地名，早废。清《京师坊巷志稿》称："盆儿胡同……南曰红水坑……前有火神庙，明宣德四年建。碑称其地为元之火焰营。"火神庙胡同，显系以庙名街。

33．井巷。有人认为即今之七井胡同，待考。

34．糖房胡同。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羊肉胡同（即今牛街四条），它与牛街东西相望南北平行。清《顺天府志》作"馓房胡同"。据当地老人说，原北口处尚有几处制做麦芽糖的糖房，糖房胡同的名称当由此而来。

35．干面胡同。清《京师坊巷志稿》载：干面胡同，南有宝应寺，"寺旁为明琅王安墓，其外山左义园也。"《冈志·郭城》说，冈上回民区的西沿在宝应寺。即自干面胡同向南一线。现干面胡同已改称登莱胡同。

以上是对《冈志》中所列街巷地名的考证和说明。经与现在牛街地区的胡同相核对，发现原来冈上的胡同率多在牛街以东，以西只有老君地、瓦街、枣林街等少数几个地方。这是因为牛街以西，地处空旷，居民稀少，形成街巷较晚。而且过去这一带住户的门牌排列特别紊乱，这就是因在空旷地段内无计划建房的结果。这些后来形成的街巷有：堂子胡同、周家胡同、丁家胡同、羊肉胡同、张家胡同、穆家胡同、枣林斜街、甄家胡同、巴家胡同、西大胡同、石羊胡同、寿刘胡同、东大胡同（寿刘胡同与东大胡

同都在牛街东边）、吴家桥一、二、三、四条等等。在上列这些胡同当中有的已在叙述冈上的街巷时论及，未论及的现在逐条叙述如下：

堂子胡同，即今牛街头条。东起牛街，西至糖房胡同。原来在胡同东口路北有澡堂一处，因名“堂子胡同”。旧时西口处有“大兴店”，是回族著名学者杨同璞及其子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希枚的故居。

周家胡同，现名牛街二条。因胡同内住有“馅饼周”家故名。按“馅饼周”是位于前门外煤市街东侧一家中档回民饭馆，字号为同聚馆。因以卖馅饼起家，待营业发展后，群众仍以“馅饼周”呼之。经营两益轩饭庄的“两益轩杨”家也住于该巷东口内北侧。

丁家胡同，又名“丁顺店”，传早年有丁顺其人在此开店，故名。现已改称牛街三条。著名大阿訇马德宝（善亭）曾住此胡同南侧。

羊肉胡同，即今牛街四条。详见前瓦街条。

张家胡同，即今牛街五条。东起牛街，西与枣林北里相通。《燕都丛考》称这条胡同为“马张家胡同”，牛街老户也有人这样叫它，因早年骡马行张家住此而得名。张姓在广安门内大街路北开设马店，主持人就是马张家的张绍三，人称张三巴，精通艺拳，是牛街武林名宿。

穆家胡同，今牛街六条。详见前穆家园条。

甄家胡同，详见前甄家穿店条。

巴家胡同，东起牛街，西与大胡同相通。从“巴”这个姓氏来说，是回民独有的姓，因此这条小巷带有浓厚的回民色彩。清《京师坊巷志稿》称：“……礼拜寺之南有小胡同曰巴家胡同。”另据刘仲泉先生考证，牛街礼拜寺曾有巴姓伊玛目，或以

巴姓掌教住在这里，故名。

西大胡同，东起牛街，西与甄家胡同及石羊胡同相通。

石羊胡同，东起牛街，向西南与甄家胡同相通。据《燕都丛考》说，石羊胡同之西南有道士坟。其根据是清《顺天府志》在牛街条下有这样几句话："……老君地，其北有峨眉禅林，西南曰道士观，元之长生殿也，曰道士坟，明之官园也……。"道士坟就是长生观，而长生观在金的城南关厢。而金的南门在今右安门左近，其关厢当会再远些，谓在石羊胡同西南是不确的。

寿刘胡同，是牛街中间东侧的一条走向不规则的小巷，西起牛街，东至教子胡同，往北有两个口可通麻刀胡同，向南有三个口与输人胡同相通。这条胡同在《冈志·街巷》中未著录，也可能形成街巷较晚之故。相传这里有一位身怀绝技的玉器工人，绰号"寿面刘"。他传授了许多徒弟，后来都成了回民中的玉器名师。为了纪念这一代名师，人们就以"寿面刘"名街。后来简称为"寿刘胡同"。

寿刘胡同北侧有清真女寺，始建于1923年。现为牛街回民幼儿园。胡同南侧，回族著名厨师、西长安街西来顺饭庄经营者褚连祥曾住在这里。回族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杨小亭，也曾在这里居住。

东大胡同，在牛街南端东侧，西起牛街曲折向南抵南横西街。30年代北京街巷图称之为东大院。

吴家桥一、二、三、四条，头条走向曲折，东起糖房胡同，向西再北与德泉胡同相通，二、三、四条，也是东起糖房胡同，向西形成南北并列而又相通的三条街巷。这三条胡同过去均径达老君地。二条西口处为"四棵树"，即一个坟墓，围种四棵柏树而得名。老君地这一带起初住户稀落，大部为庄稼地，青纱帐起后，

与郊野无异。北京解放后，老君地西侧开辟了一条新马路——白广路，路的东西两边高楼拔地而起，自此吴家桥二、三、四条的西口外空地，均为高层建筑所代替。

昔时，吴家桥一带住户，多是畜养骆驼的人家，一般院落宽敞，一排北房，临街无门楼及过道，只在两墙之间开一豁口，上宽下窄，以便骆驼出入。随着驼业的消失，这一带的“门庭”也随之改观，往日豁口，已不复可寻了。

关于吴家桥各条胡同，清《顺天府志》载：“牛街以南（似应说牛街以西），有吴家桥头、二、三、四条，今皆废。”民国年间出版的《燕都丛考》则说，“广宁门大街南，曰吴家桥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顺天府志》所谓“吴家桥各条胡同皆废”的话，显然是失实的，这四条胡同至今犹存。

吴家桥，又称吴家湾。按金代中都城内曾引莲花池水进城，其流向是自西向东入城后再折而向南。吴家桥，当是河流经过的地方；所谓吴家湾，或是河流转弯处。

## 疆　域

至此，我们已把冈上的旧地名和今天牛街各条街巷，大略地作了考证和说明，其中还有几条旧地名如陈家园、郑家园、井巷等等尽管尚属不可考，但不影响对今昔牛街回民聚居区变迁的探讨。《冈志·疆域》告诉我们说：“东至愍忠寺，西至宝应寺、峨眉庵，南至白马寺、鱼脊寺，北至报国寺、增寿寺。周回十余里。”这个四至按照今天的地名则是：东至西砖胡同，东南抵南横西街的盆儿胡同以西，西至登莱胡同，南至万寿西宫附近，北至报国寺向东如下斜街及过街沟（今广安胡同一带）。与过去相比，牛街

回民聚居区的范围显然是缩小了。目前的范围是，西起白广路以东，东至西砖胡同以西，南至南横西街，北至广内大街。现在的牛街街道办事处分为东、中、西三片，中片回民较多，共有10个居民委员会。

北京刚刚解放时，牛街这一条街和教子胡同以西，白广路以东的各条胡同，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现在大。后来逐渐减少是因为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的就业面扩大了，不少人到各大工厂、机关去工作，随着各单位宿舍的兴建，人们不断地迁出牛街。另一方面，后来迁来的居民，不一定都是回民。但从绝对数字上来说，回民人数并未减少，仍超过这一地区总人口的1/2。这一带的商业网点特别是食品商店，都是经营清真商品。从这一点看，这是其它回民密集点所少见的。

# 经　济

旧社会，人们谈论牛街回民的经济状况时，常常用“两把刀、八根绳”来概括，这说明了牛街回族群众简单的职业构成及狭窄的生活道路。“八根绳”是对挑担行商小贩的泛称，一根扁担，两个筐，前后各以四根绳系起来。当然，携带货物的方式，不仅限于挑担，有推小车的，设地摊的，甚至还有只提个篮子的，但都属于“八根绳”的范畴。“八根绳”的经营者，多属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大众。而“两把刀”者当中就不同了。他们当中既有行商，也有座商，其中有颇具资产的小康之家。“两把刀”指卖牛羊肉和卖切糕的。因为牛羊肉和切糕要用刀切开来卖，故称“两把刀”。当然，牛街人所从事的行业，不仅仅限于“八根绳”和“两把刀”。牛街人从事的较大的行业尚有牙行、牛羊行、饮食业、珠宝玉石业等。现就上述各行业，逐一加以叙述。

## 一、从“两把刀、八根绳”说起

在旧社会以小商贩为生的，几乎占牛街回民的一半以上。数量所以这样多，除在旧社会回民受政治压迫等原因之外，还由于回民自身受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束缚。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化水平低，在职业选择方面余地不多，清代回民做官的和在大企业中掌权的很少，无人引荐，这条道路就会

愈来愈窄；二是旧社会工商业职工多食宿在企业内，由于生活习惯和饮食上的限制，回民只能受雇于回民企事业，造成就业范围极为狭小；三是自己做生意缺乏资金，结果只能做些小买卖养家糊口。旧社会菜行、果行、牛羊肉业等批发市场，交易不以现金，而是用“信用”方式，即赊销方式，只需有人“搭话”（即有介绍人并负担保之责），即可进货，售出后归款。这种“信用”虽然要买方付出10%的佣金，但它对于没有资金的小贩来说，确实开了方便之门；凡是其他行业搞不下去，或是失业的人，最后大多数都当了小商贩。

小商贩经营的货物品种繁多，除青菜、水果之外，以卖各种小吃的为最多。有卖孩子吃的糖豆零食及小玩具等；夏天有卖果子干、酸梅汤、酸枣汤、刨冰、雪花酪的，秋冷以后有卖山楂酪、糊子糕、冰糖葫芦的，这些山楂制品牛街回民特别喜爱，因为食肉多，吃山楂制品能助消化。还有卖熟芸豆（或把熟芸豆挤压成芸豆饼）、熟玉米和熟白薯的。牛街小贩经营早点品种繁多。如：面茶、茶汤、杏仁茶、豆浆、甑儿糕、豆腐脑、老豆腐、肉粥、炖牛杂碎、炖羊肚、炸豆腐、豌豆黄、切糕、盆糕、炸回头等。早点过后扒糕、凉粉、奶酪、牛蹄筋、骆驼掌、白水羊头肉、江米黄米面炸糕、牛头肉等小吃又上市了。牛街有的小孩刚刚五六岁，家长就给他一个盛香烟的硬纸盒，纸盒的四角用四根细绳系着，盒内装有麦芽糖棍儿。孩子串巷叫喊：“我的一赌两呀！”这是一种有赌博性的买卖。如果不赌，一个铜板买一根麦芽糖棍；若要赌，买卖双方各执一根，在台阶上放好，用一手敲糖棍，谁敲得远谁胜，买方胜了可以吃两根，故曰：“一个赌两”。孩子长大一些，就学做生意提篮卖煮花生，夏天卖些咸豆角、熟豌豆、冰核之类。虽然获利不多，但从小训练出一身经营小生意的

本领。年龄再大一些，他们就能根据不同的季节，改变着经营品种，这情况叫“杂抓”。“杂抓”也有抓得不错的。但只是一人糊口而已。

从事“八根绳”小贩的收入，在正常情况下，一家数人可以勉强糊口。他们得过且过，挣多少钱花多少钱。饮食不算太苦，早上要喝茶，早点要吃烧饼、麻花、切糕。赶上生意顺利，肉是不会少吃的，瓜果零食也不吝花钱，认为吃喝是孩子、大人的“口头福”，是“恩典、慈悯”①，不能亏了自己；尤其是卖力气的，更要吃好，认为身体就是本钱。他们生活上无计划，一天的收入，常常是除了应偿还的赊款和佣金之外，所剩已经不多；做小吃生意的，只要能买进下一天的原料，就心安理得。这类人家，大多数没有隔夜粮，甚至连生火用的煤柴也是提个小篮子当天现买。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生活上作长远打算。条件顺利，尚能温饱。若遇到刮大风或连阴雨，就糟糕了，如再遇上自己或家里人闹病，那就更糟。就是有些细微积蓄也花不了几天，到时把归还的货款透支挪用了，把一点点资金吃光了，再去市场赊购，因失去了“信用”，对方也就停止发货，小生意只好停顿。到那时只好乞灵于高利贷。一般是“借五打六”，就是借10元，还12元。付不了，就要本加息累进，即通常称作“驴打滚”印子钱。凡是和印子钱打上交道的人，十之八九是越陷越深。不少人最后走投无路，投河、上吊，结局极为悲惨。当然，有的小商贩由于经营得法，或有些技艺，有熟主顾，有比较好的销货地点；在生活上又能节俭谨慎，家庭劳动力多，因而就有积累，即使遇到天灾人祸也可以抵挡一阵。但这毕竟是少数。

---

① 恩典、慈悯：是伊斯兰教的经堂用语，意思指的是真主安拉给予的恩惠和仁慈的照顾。

牛街人挑"八根绳"中还有一种情况比别的小商贩优越。这就是收旧货的。旧时称之为"喝烂铁"的，或叫"打鼓儿的"，因他们手持一个单面蒙皮、直径一寸左右的小鼓，用竹条敲击小鼓叭叭作响而得名。"打鼓儿"的拥有的资金差距很大，低的只能收购破铜烂铁、废旧家具，高的专收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货到手后，即到"攒儿上"去卖。宣武门外原瓮城圈旧址辟有平民市场，每天下午从4时左右起，卖旧货者云集于此，各行的收货人（也称作"行里人"）也都来此收购。如在平民市场未曾脱手的货，于次日凌晨还可到晓市去卖。晓市位于广安门内的广安胡同向北抵达司家坑小桥一带，因在拂晓以前开市，购物者多提马灯照明，远望灯火磷磷，故也有"鬼市"之称。有的人家发生事故或全家迁徙，需要把所有家具卖掉，打鼓的称这种货为"抄家货"。遇到这种事，单个打鼓的资金少，常常几个人合股收购。为了赚钱，出价极低，大捞一把。

牛街打小鼓的，也有因善于经营面富起来的，成为牛街的富裕户。这些人由打鼓儿起家，后来有的合股收购报废的汽车，进而拆卖零件、废铁，开设起汽车零件材料行，在全国范围内做买卖。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汽车配件行业的里手。至今牛街回民仍有从事这一行业的。

"两把刀"之一的卖切糕的，基本上还是小商贩。牛街回民卖的切糕种类很多，都是用粘面作的，原料是糯米（江米）或黍米（黄米）。从粘面糕演变成为爱窝窝、黄面豆面糕、"驴打滚"、春节前后的年糕坨儿等，还有用黄米煮成糊状的叫抹糕，这些都是粘面制品，但不属于切糕的范围。通常说的切糕是指这几种：黄面加芸豆或豌豆制成的糕，带枣放在有洞盆内蒸熟的盆糕，江米面加豆沙和枣制成的糕，用碎熟芸豆拌江米面制成

的豆豉糕，江米面夹豌豆黄、豆沙的卷糕（这种糕冬天用小笼屉加热后再卖更好吃），还有用江米蒸熟的年糕。切糕用料有高低之分，加工也有精细与粗糙的差别。有掺入大米面（通称“笨面”）的，但货次售价就低廉些，也有不少人喜欢吃。卖切糕的都推一个独轮手车，上放长方案板，靠辕处竖一个竹筒，放钱用。卖切糕的也有不少有名人物。牛街有个“切糕张”，老少都称他“张六巴”。他以经营豆豉糕、卷糕有名，是卖切糕的佼佼者。他做切糕用的江米面和豌豆黄、豆沙都过细箩。卖切糕的车子也是最讲究的，木案板的四边和圆竹筒的周围都镶着白铜和红铜的花饰，上有“清真回回”镂空的字样，案板上放着三面带玻璃的罩子，连同“汤瓶牌”① 一起擦得一尘不染。案板也刷洗得木纹毕露；“切糕张”人也精神，蓝布半大褂子，高挽白袖口，白围裙，白礼拜帽。车锃光耀眼，人精神矍铄。他卖的切糕，一层切糕一层豆沙，上面洒满青红丝、瓜子、葡萄干等百果。还有一大盘绵白糖，随卖随给一勺糖。车上还带有水盆，随卖随洗瓷碟和竹筷。到了冬天“切糕张”卖豆豉糕时还带个小炉子，有一套小笼屉，吃起糕来热呼呼的。其他卖切糕的车子虽然没有他的讲究，也刷洗得十分干净。一看就引起人们的食欲。

卖切糕的看起来只有一个人推车上街，但他好比是前台的演员，后台则是全家男女老少。如把江米磨成面粉，小豆煮成豆沙，小枣挑选煮熟，糕蒸熟后用湿布拍成片再加进豆沙和枣，这一般是几个人一天的劳动量，而且需要熟练的技术。即使这样，他们所得利润是不高的，要看销货情况与天气好坏而定。到了年

① 汤瓶牌：旧社会作为回民出售清真食品的标志。一般为木制（有铜制的）牌子，长方形，上刻有“清真回回”或“清真古教”、“西域回回”等汉字，有的还带有阿拉伯文。牌子上的主要图案为一把穆斯林沐浴使用的阿拉伯式水壶（壶肚大、颈高、嘴长，有把手），称为汤瓶。

节，除了出车子还要加做一些“糕坨”出售，收入就会好一些。有的卖切糕的由于经营得法，逐渐富裕起来。如“切糕马”的马宝贵，后来加上他哥哥投资在牛街开了聚宝源牛羊肉店，在40年代直到公私合营以前一直是牛街牛羊肉店中的强者。至于其他卖切糕者大多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生活是极不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牛街小商贩的生活起了本质的变化。有技术的商贩被组织起来，吸收到国营、合作社营的回民小吃店、副食店去工作，成了国家职工。如位子菜市口的南来顺小吃店，牛街北口回民食堂（现两益轩），广安门大街的广丰，北线阁南口小吃店(现改名欣春小吃店)，白广路小吃店（现名燕春轩），还有大栅栏西口小吃店（现改同和轩），虎坊路小吃店（现改元兴堂）等。也有的参加了北京市民政局民族事务科举办的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学习时事政策、文化知识。经过短期培训，被介绍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去工作。彭真同志指示“一定要打开回民就业门路”。刘仁同志说：“解放回民就业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要注意进行教育，各民族要团结生产，团结建设。”这个班从1951年到1957年招收了少数民族学员（包括干部）7600人，其中80%是回民，回民中起码有近半数是牛街地区的。包括有年青的小商贩和小商贩家庭失学的青年。培养出的北京第一代回族电车女司机陈雅香，就是牛街人。后来不少人成为工厂、企业的骨干。而参加国营小吃店的原小商贩，也带出了不少徒弟，使回民擅长的风味小吃得以流传。

## 二、牙　行

牙行，特别是菜牙行和果牙行，和牛街的小贩有着“唇齿相

依”的关系。旧社会成千上万沿街叫卖青菜、果品的小贩，要赖牙行以求生。他们离开牙行就断绝了货源，但假如没有小贩，牙行也会失去它最大的销售对象而无法支撑。

牙行，它是处于供需两者之间，代客买卖，交互说合，以从中收取佣金的一种行业。之所以称作牙行，据考证，牙字是互字之讹，因是为买卖双方交互说合，以促成交易，故中间人曾有“互郎”之称。按古体汉字的互字与牙字近似，因此就讹互为牙。据《辍耕录》卷十一《牙郎》条：“人谓驵侩者为牙郎，本谓之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牙。（其字形如‘牙’。清代木版书本有的互字仍如此写法。）互与牙相近，因讹为牙耳。”近代对牙行又称为行纪或牙纪。北京一般称它为牙行，或牙经纪。

牙行起源很早，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据《史记·货殖列传》：“于贷金钱千贯，节驵侩。”《史记索引》解释说：“节者，节贵贱也……驵者，度牛马市；云驵侩者，合市也。”就是说，在牲畜交易中，沟通双方，度量价格的中间人叫驵侩。从而说明，牙人，最早乃是出现于牲畜交易市场。

唐代称牙人为“互市牙郎”。《旧唐书·安禄山传》：“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唐德宗（780年）及其以后长安市商品交易活动增加，牙郎有时被称作牙人、牙于、市牙子等等。称谓虽有不同，其职能是一样的。

五代时出现了牙行（即牙人的同业组织）；这时期开始出现了官牙，即由官方认可的牙人。官牙由官方指定，私牙也须政府批准，并一律取得印信文书（后来称之为牙帖）之后始得营业。官牙直到近代仍然存在。

明清两代都规定，凡开设牙行的须经官方批准，所缴纳的帖

费和税银，称为牙税。牙帖原由地方政府发给，清代改为户部颁发。但各省藩司所出的“司帖”和县政府所出的“谕帖”，其效力相同。牙帖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种，按时领换。帖费，乾隆时最高为三两。辛亥革命后，各省发帖办法极为混乱，帖费也提高很多。如北京对一等帖费竟高达银元两千元。实际上帖主是受到官方保护的，而且规定不经牙行不准私自进行批发业务。由于牙行的半官方性质，它既被授权专卖，也是代收批发税的机构。

牙行抽取佣金的比率为十金抽一。这一比率自唐以来沿用至明清，及民国时期。

牛街回民从事牙行的人不少，相传，早年北京回民手中持有的各种牙帖，其数量高达440张另半张。果真如此，则旧时的各种牙行几为回民所垄断。其实有的是一货多帖，如那半张帖是芍药花帖；此外在菜牙行内也还有所谓“片货帖”，是指每年腌菜季节如雪里蕻、芥菜等的帖，它既有季节性，又属专行经营。看来过去的牙帖，是按照货物的品种和不同的季节来详细分出行次的，当时的牙行大有无所不在之势。

北京回民何时开始从事牙行？说者不一。在牛街有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传说，说北京回民之所以持多种牙帖，是皇上发给的“龙帖”。相传，在明代，回民随“燕王扫北”时有战功，待燕王据有天下之后，为了犒赏有功的回回，就把很多牙行的“龙帖”赏下来。这种传说得不到史料文献的证实，殊难凭信。但揆诸《明史》，常有以感情出发而定赋税轻重的记载。如凤阳是朱元璋的故乡，那里的税就定得极轻；同样，刘基的家在青田，“多半其赋”。同样道理，给有功的回回颁发一些牙帖，让回回得些实惠，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也还有人认为，这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一种羁縻手段，给这些回民牙帖，使之不文、不武、非

农、非商，只靠中间剥削吃饭。这样不事生产，不求仕进，一旦离开了牙行，将一无所长。这些看法，可以聊备一说。

上面说过，回民所掌握的牙帖有400多张，但到后来回民手中的牙帖日益减少下来。一是由于经营不善，陆续倒给了汉族人；一种则是由于某些货物随着时移世易，有的销路不畅，有的根本断绝了货源，因而终止营业。所以截至北京解放前夕，剩下来的只有蔬菜，及一小部分果品、牛羊栈业、骡马业、皮革、油脂、骨、羊毛等牙行，还有饮食行业中厨、茶行的人工介绍。现在就把北京解放前尚残存的一些牛街回民经营的牙行情况，扼要作如下记述。

## 菜　行

牛街回民操此业者如菜牙张家、菜王家、菜刘家、山药马家、葱胡家等等，可谓“实繁有徒”了。早年，在牛街附近的菜市，是北京几个菜市中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的蔬菜集散地。据说，清代的菜市，自牛街北口外稍东直抵今菜市口附近的大路两侧，每天凌晨即在路边设场交易。卖方是近郊的菜农，他们在前一天晚间把鲜菜运至菜行。菜行派专人接待卖菜的农民，除安排住宿外，也照管货物如洒水等，遇一时未能脱手的货，也要设法保鲜使之不晒不冻。昔时交通量小，可以在临街设场。后来交通日繁，临街设场渐有困难，乃于民国初，就在菜市口北侧，即今菜市口菜市场处建立了广安市场。市场建成后，其前部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副食商场，出售鸡鸭鱼肉、调料、干货；在副食商场的北部，北连广安东里，则属于蔬菜集散地菜牙行所在。

广安市场各个牙店的主人，早年都是回民，到北京解放前为

止，全菜市20多家菜行中尚有回民帖主15家，回民经营者所占的比例仍不算小。

菜市，又称作菜趟子，每家都有自己的字号，较大的如乾丰、中兴、春茂、俊山、鸿兴、巨兴等等。菜行如系由帖主自己经营的，也称之为经理，下设帐房。货场有掌秤的或称拿秤的，有写帖先生和搬运杂工等。拿秤的是货场甚至全企业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仅仅是过秤，同时还要掌握行情，还要有精湛的业务知识。过去有“快马跟不上青菜行市”的话，掌秤人对市场上货多少、天气好坏、季节变化都要了若指掌，信息灵通，对蔬菜品种、等次要一望而知。掌秤人的精明程度，对一个菜行的兴衰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有人说，掌秤人是菜牙行的实际经营者。货主即菜农，把货物送到城里，落到哪家趟子，与掌秤人的关系很大，要看掌秤人是否精明，货主和掌秤人之间都有一定的交谊。菜趟子能否招徕客人的另一因素，还要看菜行的信用、支付能力即结帐是否及时等等。实际情况是，客人落栈的多少和其营业额成正比。

菜市的交易方法，不零售，不收现金，买卖双方按信用。买方过秤后即提货，货款后付。每天凌晨市场就开始营业，一切货物均由掌秤人主持出售，诸如议价、过秤等。买方大都为副食店（过去称油盐店）、大饭庄的“上市人”和广大的小贩。牙店的掌秤人虽然是卖方的代理人，但是菜农也在一旁监视着。有时在议价当中，菜农认为价格过低，可以不卖。掌秤人则以居间的身分来“打圆场”以促成交。成交之后，掌秤人把秤杆一放，随即高声喊价，如每斤五分，一百斤合五元。掌秤的只喊“五元整”，意思是10%的佣金不在价格之内。根据掌秤的喊价，写帖子的先生就在各店自制的纸条上一式两张写上买方的姓名、品名、金

额，一张据以向买货人结帐，一张交菜农凭以向账房领款。

菜行除代客买卖，为客人提供服务外，在资金上也要有一定现款以备周转。有的小额货款，只要货物卖出，卖方可以马上凭条到账房结算领款。不必等待回收，即先由菜行垫付。菜行所收取的10%的佣金，完全由买方负担。菜店的佣金收入，要付给菜农（卖方）二成，称之为“回水”。每年蔬菜旺季有45天（一个半月），菜行付给卖方回水为三成，意在更多地争取货源。余下来的佣金作为菜行的开支。菜行的店员、工人，包括掌秤的在内，都是每天按份拿钱。份的金额根据每天所作的“流水”的多少而上下，每一份又因职位、责任的轻重，劳动强度等因素而各有不同。每天由账房算出，一天一付。掌秤的或账房先生都是拿头份钱的。特别是掌秤的，逢年按节，帖主另以“红包”馈赠，连卖方的菜农，对掌秤人也有馈赠，以希望在交易中得到照顾。菜行除了职工的工资和一切开支外，余下来的是老板的利润。

在广安菜市场出现的小贩，有90%以上都是牛街的回民，菜贩与菜行之间都是相识的。小贩买进菜之后，马上到街上去叫卖。晚间，菜店派专人拿着钱袋，提着马灯，挨户到各小贩家去收款。旧社会菜行曾直接间接养活许多人。牛街小贩可以不必先筹措本钱，背上席篓（席篓是小贩或称行贩的标识。“行贩”读若“杭贩儿”）到菜市即可赊来货物。如果经营得法，生意顺利，一家老小混个温饱还是可以的。但在事实上却也不都尽如人意，如进货时赶上行情高，零售时不好卖而滞销，待到晚间货已不够新鲜，特别是“叶菜”，时间稍长即不易脱手。遇到这种情况只好变价处理，有时就要亏本。长此以往，甚至交不出“帖子钱”，就发生了拖欠事情，于是收款人就把原来写的竖帖改为横帖（即欠款帖）。如果一个小贩的横帖过多，说明他的信用下

落；支付能力不足，菜行就会对他终止赊销。

临到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濒于崩溃，物价飞涨，百业凋敝，菜市当也不例外。尤其是居间剥削的行业，更是岌岌可危。一方面人们对于这种中间交易形式日益感到不满，企图加以改变，所以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名堂曾不断出现，以替代牙行这一交易方式。菜市为维持原有局面的延续，也起来反抗，有时甚至挑起斗殴；另一方面，菜市给农民 2 — 3 成的“回水”，也是意在安抚、拉拢菜农，使之进而参与维护这一形式的存在。至于帖主本身，他不仅需要经营的能力，还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如在经营上稍有疏忽，就有破产的风险，加以所收10％的佣金，除付农民2 —3 成外，还要付工资、税金和各项开支，所剩常常不多。所以有的帖主宁肯把帖出租，自己去给人家当职工，即所谓“耍胳臂”，也不肯冒风险。看来当时帖主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实际上，居间交易的方式是落后的，如果不是解放的话，这种落后的方式也会被不断前进的形势所淘汰。

## 果　行

牛街人从事果行的不少，有些是开店的帖主，更多的则是果行的伙计。今天牛街的姓氏“小说”中，尚可找到的有果子贾家、果子冯家、果刘家、红果张家等等。这些人家中只有果子贾家经营果品的时间最长。北京的果子市有南北二市。北市在德胜门内丁字街一带，今 5 路公共汽车有“果子市”站，即是北市的所在地。北市历史较久，相传始建于元代；南市建立较迟，据说始于清初，市场的地点在前门外大街东侧，规模也较北市大。至北京解放前，南市有63家果店，北市只有13家。牛街果子贾家的果店字号为永盛号（一般都称为贾家店），有独帖专营红果（即

山楂），据说自清初直至北京解放，始终垄断北京的红果经营权。

果子市的售货方法与提取佣金的方法，与菜市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果子市有明显的旺季、淡季之分，淡季自阴历十月至来年五月，这期间多以经营干果，如花生、栗子、瓜子之类或果干等，间或经营一些外来鲜果。牛街有干果子王家，可见早年经营干果也是有专帖的。旺季的开始，是自阴历五月，即自杏、李子、桃等下树开始，随后各种鲜果不断上市，直到西瓜上市，使旺季达到高峰。在西瓜季内，收取佣金也加大，最高时达12%。

牛街人还经营着另一种鲜果局，如红果张家在西长安街经营一家座庄，既不门市零售，也不作批发，而是专门向大饭庄供应干鲜果品和各种蜜饯等。和饭庄交易的果品，不论斤，不论个，而是论桌，当然一桌都有固定的数。所供应的品种是上好的。这种没有门面的座庄，表面看是冷落的，而实际销售量是不低的。它随着高档饭庄的起落而兴衰着。

果店的职工和菜行的不同。菜行对于菜的质量品次，产地的优劣等须有一定的知识，但是不如果行对水果懂得专而博，因此果行的商店有学徒工，他要学习许多业务知识，诸如果品存储、运输、保鲜等技术。据说葡萄保鲜是把葡萄整枝插入鸭梨当中，存放多日可保葡萄不蔫，其它如看西瓜的成熟度、甜度等，只须看一眼并用手一拍即可了然。这种丰富的业务知识，对于买卖双方都是需要的。

## 骡 马 行

骡马行设的店，既是外来贩运骡马客商投宿的地方，也是骡马交易的市场。成交后，店主人自买卖双方提取佣金6%。

骡马行也和其它牙行一样，相传自明代初期已取得“龙帖”。

牛街人从事骡马业者也大有人在。如驴子马家、驴子孙家、马杨家、马陈家、马张家等等，这些人家都是牛街老住户，都是从事骡马交易的牙商。

据考证，宣武门外的骡马市(即今骡马市大街)，明代以来曾是骡马的交易市场，故有骡马市之名。旧时这里有马神庙，并设骡马税局于此。此地西距牛街约里许。大凡某一集市的从业人员也大都在集市附近住家，昔日骡马市之距离牛街较近，故从事骡马业的牛街人不少。犹如后来骡马市场北迁至德胜门外（传于清初迁此），而一些从事骡马行业的人，又复集居于德外是一样的道理。据统计，截至北京解放前夕，全市有骡马店55家，其中回民经营者有44家之多，从上面的考证和统计数字来看，骡马业不仅是回民的传统行业，而且几为回民所垄断，不过住在牛街的骡马业者，后来已不多了。

骡马行的中间人称“搂包的”（包字读如雹儿）。一般搂包的与店主有关，有的店甚至由经理或其亲近的店员来充当。所谓搂包的，顾名思义，即是包揽一切。在骡马交易中，有的搂包人常常施用手脚，例如要使买卖双方不见面，使交易背靠背地进行，以便于施展欺骗和瞒价，从中获取暴利。更为恶劣的是有的人不讲职业道德，在牲口身上弄虚作假，如将老龄牲口的牙齿掰掉，并施以钻渠凿口的办法，使老龄的牲口变成小岁口；或者用打针、灌药等办法使衰老的牲口兴奋，以欺诈的手段谋取钱财。当时这个行业中曾流行“早上没饭吃，晚上有马骑”的话，用来形容搂包人暴富的情景。骡马行中有的搂包人的这种行为，给正当的商人带来恶劣影响，为广大群众所不满。新中国建立后，已由政府和税务部门结合建立骡马市场，将搂包人组织起来，佣金减为“买方负担一成，卖方四成”，共为5%。后来这一行业中的大

部从业人员已转业，剩下几十人，佣金也降为3%。现在这个行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 羊 栈 业

羊栈业，或称羊店，不卖羊肉，只做羊只活体生意，成交后收取佣金。牛街人过去经营此业者很多，如旧住户羊经纪沙家，就是从事这一行业的。

羊只活体，要从产地经过长途跋涉才运到北京。从产地来说有以下几处：热河一带称东口；张家口以北称北口；西口则指的是归绥一带（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一带），如内蒙古的“大盛魁”，在它的企业内专门设有京羊庄，用来接待北京客人。此外河北、河南两省也有羊只。各产地的羊贩子收购活羊后卖给当地羊店，产地羊店购进羊只后，有两种出路，一是由北京的羊贩子前去购买；一是由产地的羊贩子把羊只贩运来京。运活羊的方法，如利用火车运输，每120—130只羊需一个车皮，并需三个人押运；若由人工徒步哄赶，则120只羊需要四个人。所以在运费高下的比较之下，羊贩子常常采用徒步哄赶的办法。

贩运活体羊只的高潮是每年7—8月份。历年的淡季是春季。过去北京作贩运活羊的，有30多人，回民占80%以上，其中也有牛街人。

居住在北京的羊贩子称为“客人”；由外埠来京的羊贩子称作“外客”。羊贩子的盈利额，和他所拥有的资本成正比。最大的羊贩子，其交易头数，如超过一万头，可获纯利大洋一万元之谱。

过去北京羊店大部在德外马甸。除马甸外，西便门也有几家羊店，他们多接待河北省来京的外客。其它如通县、丰台、夏垫、

大厂等地也有羊店，经营者大部为回民。

羊只投入羊店后，在未出售前，羊店负责喂养。羊店店员均具有管理喂羊只的知识，羊入圈后喂养得不好，会造成掉膘，影响交易，对羊店及客人均不利，也是羊店注意避免发生的问题。羊只成交后，羊店向买卖双方提取5%—7%的佣金。羊店收取佣金，与菜行、果行或骡马行的比率及方法均有所不同，羊只佣金，只有一般的概率而无定则。一般是在各方同意的基础上商定，无硬性规定，并有通融的余地。

羊只被羊肉铺买进，多要依靠“把头”的传递信息及一系列工作。有关把头的职能，将在羊肉行业内详述。

## 其　他

前述菜行、果品、骡马、羊只等都属于大型的牙行，它们都有固定的交易场所，有店铺，有字号，还有较多的从业人员。除此之外，解放前也存留了一些较小的牙行，这种牙行，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没有其他从业人员，只由帖主自己承担着他的全部业务。当然，随着时移世易，很多牙行被淘汰，它们大多由于某些货物无人问津而随之消失，如牧草、柴炭等。在今天的牛街留下姓氏的“小说”，如炭陈、草张、草王等等，仅在说明这些人家的先辈曾以经营柴炭、牧草的牙行为生。下面介绍几种残留至北京解放前的小型牙行。

油脂业：主要是牛羊油脂，或称油坨子。属于工业用原料，而不是食用油脂。牛街有李新甫（套环李家），曾为油脂业的经纪人。其交易方法是，经纪人掌握油的货源、数量、质量、存放地点和价格等等情况。当买方求购时，经纪人从中议价、过秤，成交后收取佣金。

勤行也有中间人，是介绍人工的牙人。此中详细情况将在厨行中记述。

玉石业的居间行业，并没有什么牙帖。牛街的昌姓、云姓、计姓等都是玉石业的中间人，一般称作“跑合的”。他们除了到崇文门外的青山居之外，经常活动的地方最早在门框胡同，后在廊房二条一带。他们活动的方法与一般商业交易不同，跑合的多站在道路两旁，逢人就问：“卖点什么？”遇到卖主时，先请到附近茶馆坐下，再看他要出手的货物。跑合的常常是二三人在一起，把货色、要的价格摸清后，其中一人就持货到玉行看货兜售，留下另外的同行作陪。实际上，一个人拿走货物，为使卖货人放心，留下的人即暂作人质了。成交一次生意，常常要往返折冲多次始能定局。成交后由买卖双方付给跑合的佣金。因为跑合的作为中间人为同行之间寻找适销对路的货物，他和各商号同业关系极熟。这种玉石业的居间业者，对于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由于跑合的努力，常使卖方得到一个合适的价钱，而收购者也能买进合适的、对路的货物。由于玉行跑合的所从事的工作，对玉石交易起到了良好作用，而这类人员人数不多，他们之间竞争与摩擦较少，所以他们存留的时间也较长久。

## 三、饮食业

牛街人对饮食业又称勤行。勤行包罗的内容极广，上至高档饭庄、下至摊贩行商，只要是制做出售饮食或与之有关的人员，统统称之为勤行。这一名称的来源，已不可考，但从勤行的勤字来看，从事这一行业的过去都是手工操作，做起活来是十分艰苦的，从制做到出售，若不勤劳从事，将会收益不多，所以必须持之以

勤，克苦耐劳，服务周到，方可养家糊口，所以称作勤行。

牛街人从事饮食的小贩，几占全部小商贩的一半以上。旧社会的北京城，卖烧饼、麻花、切糕、白薯等食品的人，绝大多数是回民。为什么回民从事吃食行业的人比较多呢？首先这与回民的生活习惯有关，其次这也是杂散居地区的回民特点之一。因为回民虽聚族而居，但却共处于汉民之中。最初食品商贩的出现，是为回民自己供食产生的。由于回民食品经营得法，手艺出众，清洁卫生，特别是油炸货更有独到之处（据说这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喜吃油炸食品的传统有关），所以日久之后，越来越多的汉民也喜欢吃它。回民小吃食品立住脚了，回民中勤行的从业人员也多了起来。

有人对北京回民食品中的面点类作过介绍，统计有200多种。除小商贩沿街叫卖的以外，大部分是由烧饼铺、早点铺、馒首铺供应。一般烧饼铺都兼卖炸焦圈、麻花、蜜麻花、排叉、油酥火烧、罗丝转儿、墩饽饽、糖火烧、豆馅火烧等等炸、烙、烤制的面食。早点铺除烧饼麻花之外，兼营豆浆、杏仁茶、面茶等流食。馒首铺是以蒸货为主，有馒首、喜寿字饼、蒸饼（或称千层饼）、开口笑、蜂糕等等。虽然是小本钱的店铺，也有很出名的，如牛街王家，人称俊王家，在菜市口开设烧饼铺，他家焦圈、烧饼是北京有名的风味食品。

厨行，可以说是勤行的“正宗”。牛街的厨行从业人员，也和汉民厨行一样，有的受雇于饭庄和饭馆，有的自行开业卖饭，有的则是专应喜庆或丧事的宴席，名为“跑大棚的”。解放前，受雇于饭庄、饭馆的厨师是经过“口上”介绍的。所谓“口上”，是指旧社会一种专门给饭馆介绍厨师、茶房的“人牙”，这种“人”的居间介绍行业，也持有官帖。帖主称作头儿。他们的“办

公”地点，设在一个固定的茶馆内。每天早晨，失业的厨、茶人员都来此茶馆，以便有机会谋取职业。头儿得到的报酬——佣金，都由在职的厨茶人员在每天得到的小费收入中提取一定的份额偿付。所以头儿每天早上到茶馆，下午到各饭馆去取份儿钱。头儿终年吃着大家，大家的工作也全仗他调配。解放前最后的一位回族“口上”的头儿，名叫吴春元，现仍健在。至于跑大棚的厨子就用不着“口上”管了，是自己独立经营，因为他的雇主不是饭庄，而是红白事的当事人。旧时较富有的人家在办婚丧嫁娶等事的时候，多不去饭庄，而是在自己家里搭棚结彩，摆宴招待宾客。于是民间就有厨司专应包办教席。因为他们既非座商，也不是行商，只是谁家有事就去给谁家做饭，从这家棚下，跑到那一家棚下，所以称作“跑大棚的”。

有人考证说，牛街的厨行也是源远流长的。据传，牛街有名的厨子梁家的老祖辈是随“燕王扫北”来到北京的。当时的军队中有不少回族将士，梁家于明初即在军中当厨师，至今已有几十代传下来。据现在南来顺的梁德山老师傅说，他家原来外出应活，所用的自备餐具上都有“大顺堂梁”字样。这个“大顺堂”就是燕王朱棣亲赐的堂号。又据说，回民传下来的，牛街人称之“巴巴菜”的八大脍，如松肉、红片、白片、香酥鸡鸭、炖肉、炖笋丝等，都是预制熟了的，吃的时候上屉蒸了再浇汁，或过油炸即可上盘，这样的作法就是为了军旅行军的需要。但厨子梁的家谱早已失传，另外八大脍也不是固定的菜谱，军旅需要的说法只能看作是一种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尽管如此，牛街回民厨行历史悠久是没问题的。

跑大棚的应事有两种做法，一是包工包料，等于出售宴席，把每一桌的菜谱规格及钱数订好后，按实用桌数由本家付款；一

种是只出工不包料，由本家备料。一般都采用后者。人们说跑大棚的厨子做菜不细，其实并不是厨师的手艺问题，他们也都有很好的手艺，只是时间仓促，临时起灶，设备不齐，甚至连做活的地方都是凑合，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是不易做出较细的菜肴的。

在谈跑大棚的厨师的同时，还应提到随着大棚办喜事的“总司仪”——茶房（房读轻声）。茶房开始出现时，可能仅限于招待来宾、传菜、摆桌等，一如旧饭馆的堂倌。但发展到后来，茶房的服务内容大变，实际上竟成为办事人家的司仪、调度。旧社会办喜事有许多繁琐的礼仪，如稍有疏漏，会招致亲友的很大不满。茶房对礼仪娴熟，头脑清楚，口齿伶俐，有副好嗓子，出语高亢清脆。茶房事先和主人商量好，了解亲友的底数，届时主人只管与亲友周旋，一切礼节都可由茶房提出。回民有回民一套习俗，茶房既是回民，对此道又深有研究，做起来是“万无一失”的。办喜事时，男女双方家长和亲属会面，谓之“会新亲”，就是平素相识的人也要按新亲的辈数，重新排辈见礼。这时茶房有一套词要喧嚷出来：“姑太、舅太、庆家太见礼咧！”于是这一部分亲戚由女方请出来，一一介绍见礼。这时茶房随之还要高喊：“道喜咧您！”“道谢啦！”深恐礼有不周之处还要高喊：“让不到的贵宾请您多包涵！”“话到礼到咧！”等等，仅这一场面，他代表男女双方向亲友一一致意。新郎、新娘正式婚礼时，有阿訇参加作证婚人。回民习惯称这个结婚仪式为“写依扎布”①。在仪式举行过程中都由茶房主持。例如阿訇要让新郎、新娘以阿拉伯语回答对于这一婚姻“我愿意”；这时就由茶房高声重述他们的话，从而也活跃了喜庆气氛。茶房衣着整洁，一般

① 依扎布：阿拉伯语译音，意为“确定”，引申为“婚姻的确定”即婚礼。穆斯林结婚时需请教长或阿訇念经，写结婚证书，称为写“依扎布”。

都穿一件将及膝部的蓝布短大褂，高挽白袖口，一望而知是茶房。

牛街从事厨行有名的人家有：厨子冯家（又称元兴堂冯家）、厨子梁家（梁二巴），后来的有厨子杨家、厨子王家、厨子金家（金瑞）、厨子许家（许永）等等。据行家的评价，这些个体厨师，都是牛街具有较高手艺的厨师。他们也曾培养了多位高手，在继承和发扬北京清真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许多具有地方风味的菜肴流传至今。

下面介绍牛街人经营的有名饭庄。

## 元兴堂

早年，回民饭馆一般称为羊肉馆，从名字上看来，是以经营羊肉菜肴为主的。因汉族光顾者不多，多年来没有很大发展。元、明时的回民饭馆已不可知，清末，经济形势有所变化，光绪六年（1880年）京奉铁路开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京汉铁路始建，随着京奉、京汉铁路开通，清末民初，前门一带，往来客商云集，饮食业顿时发达起来，各类饭馆林立。前门之北新华门附近，是北洋政府和当时参众两院所在地，要员新贵，南北政客，麇集于此。一时饭馆业大振，有所谓“十大春”之称的南北风味饭馆出现于京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牛街人厨子冯家的冯余轩，于清末在前门外王广福斜街（即今棕树斜街）开设了元兴堂饭庄。开始，元兴堂的服务对象以清廷政府的王公大臣、绅商大贾为主。逮至民国建立后，它的服务对象除清朝的遗老遗少外又加上了军阀政客。元兴堂只承办成桌宴席，不营散座客卖。由于这种经营特点，使王公贵胄不失身价地在此饮宴，再加上它又雇用了清廷御膳房退下来的厨师高手，也曾使其营业鼎盛一时，成为

独具特色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清真饭庄。它的成桌酒席，从冷荤压桌，到盘碗大菜都是固定规格，从不变化。元兴堂这种保守的经营方式，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后来虽然改变做法，增加了零座客卖，吸收一般顾客来用膳，但依然不能挽回颓势，再加以内部新旧变革之争激烈，终于1932年倒闭。

## 两 益 轩

民国初，牛街厨师杨玉山、王德海开设了回民饭馆两益轩。开始，杨、王二人只是在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的三元客店内，租了两间房，雇用了七八个人，经营一间小食堂，为住在三元店内的客人包饭，兼营回民传统菜肴。由于经济实惠，制做精良，深受顾客欢迎。买卖渐趋发展，乃于三元店对面另建新点，从一个包饭食堂，改为正式的饭庄。据说："两益轩"字号是由熟顾客报人彭翼仲给取的，意指两姓合伙而两有益，也有企业与顾客也是两益之意。开张后，店伙陆续增加到四五十人。两益轩之所以兴旺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立足于改革，既改进经营方式，也改进烹饪技术。相传，当时在三元店居住一位南京来的回族古玩玉器客商童文裕，他平时喜爱烹调技术，就常向杨、王两位厨师介绍一些南方风味的做法。杨、王即在回民传统的做法上介入了南法。如过去回民馆不讲究高汤，后来注意用牛肉和鸡鸭吊汤，过去以带芡为主，后来改为用原汤煨熘，过去调味偏口重，后来改为清淡而味鲜香，并且甜咸适宜。还将煨牛肉、红煨鸡、白煨鸭、东坡羊肉等南方风味菜，尽都移到北京的回民菜肴中来。因此说，两益轩的杨、王两位厨师，对改进回民菜肴，增加品种是有过很大贡献的。杨、王二家，也被冠上了"两益轩杨家"和"两益轩王家"之俗称。

两益轩在当时的回民饭馆同业中有“革新派”的美誉。由于两益轩改进了菜肴的做法，增加了品种，烹制精良，服务热情，而且按照顾客的要求，既有高档的成桌宴席，也有一两个人的便饭，这样就扩大了服务对象，业务兴旺起来。当时文化界、梨园界及一些回族上层人士，多愿到两益轩来用餐。

## 同 和 轩

同和轩饭庄是牛街回民马万福兄弟三人共同经营的。马家因此也被人称为“同和轩马家”。

同和轩创办于1925年左右。创办人之一的马万福，原在两益轩学红案掌灶。待两益轩迁出三元店另立店面时，马万福也脱离了两益轩，并在两益轩的东侧与兄弟马万清、马万林共同开设了同和轩。最初只经营一般炒菜，服务对象以大众为主，一时颇受欢迎。据说，当时北京填鸭销路不畅，价格大跌，同和轩增加烤鸭，并且价钱较低，马上招徕了许多食客。从此增设雅座，包办宴席，由于有楼房有罩棚，营业场地比两益轩宽裕，并能承办喜庆宴会，就使它从一个普通饭馆上升为饭庄。尽管它的格局上升，但仍以大众化服务为主，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当时马氏三兄弟“堂”、“柜”、“灶”各理一摊，在经营上也有一定的抱负。比如他们为了开拓营业，在北海五龙亭设分号；在各种物料供应上，也有自己的基地，如在牛街南口外开设酱园及菜圃等（今回民医院院址即是同和轩菜园）。当时有人说，假如一切顺利，同和轩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东来顺”。

## 西 来 顺

西来顺饭庄是由褚连祥开设的。褚连祥，又称褚祥，牛街

人。自幼从牛街厨子杨即杨记厨行学徒。出徒后，于民国初在北洋政府一个部门充当清真厨房厨师，后来又到两益轩饭庄，专门负责烹调上的工艺指导，有时也掌灶。两益轩之后，转到又一村饭庄（在石头胡同内）。不久，由褚连祥领东，在西长安街路南，开设了西来顺。

西来顺饭庄既没有像样的院落与客房，更谈不上什么亭台花厅，它仅有一爿狭长的天井，冠以罩棚，罩棚的两侧即是客座。可以说设备简陋，了无饭庄的气派。但是褚祥凭他独特的经营方法以及高超的烹调技术，招徕了众多的顾客。

褚祥不仅是一位名厨，而且还是清真菜肴的革新家。所谓革新，是他跳出了清真菜的传统做法，在烹饪方法上广征博采，他向本民族的高师学，也向汉民的高手学，而且还向西餐厨师学。在60年前回族畛域严格封闭的环境下，象褚祥这样能虚心向汉族厨师学习、探讨，是不易做到的。当年西来顺的东侧就是有名的忠信堂饭庄，有此地利之便，褚祥和忠信堂的技师过从颇密，时常交流经验。他的创作有茉莉竹荪汤、芙蓉鸡片、独三样、扒海洋、拌三泥、鸭泥而包等；清汤类与奶汤类的菜肴品种更多。西来顺的甜食也与一般清真馆不同，除传统的莲子羹、八宝饭、拔丝山药和夏天的冰碗儿海鲜等制做精良配色美观外，还增添了像小汤元等多种菜前开胃、菜后清口的甜食。过去一般羊肉馆羊肉做法局限在炮、烤、涮、炖、炒、溜，褚祥的“全羊席”是把全只羊体从头至尾，烹制出各种美味佳肴来。如头部可做出酱口条、红烧千里风（即红烧羊耳），羊肉做成白片肉，用羊脑、羊眼、羊脊髓做出独三样，羊内脏可做成爆肚、烧羊杂碎，其它部位分别做成叉烧羊排、手抓羊肉，连羊尾巴油也能做出北京风味的“炒麻豆腐”。还有炸羊尾这道小吃，旧方法是用羊尾巴油

做，油腻太重，改用鸡蛋清做，炸出来松柔酥香，入口即化。当年西来顺经营全羊席时，每一道菜，都用竹牌标出名称来，号称“全羊带牌子”，曾轰动一时。

据和褚祥在一起干活的同业回忆，褚祥的烹调特点是：选料严谨，操作程序上一丝不苟。他掌灶时，设立两套火眼，可以同时制做北京和天津两个风味不同的菜。褚祥的创举，引起天津同业的极大兴趣，这就推动了京津两地的技术交流。褚祥的名字，不仅北京人熟悉，天津的同业和食客也同样知道他。

褚祥刻苦钻研、大胆创新的精神使他在清真菜肴的做法上独树一帜，在同业和美食客中间享有盛名。褚祥还培育了很多高足，有名的厨师如高义、马德洪、马德起、芦殿元、宋恩志等多人。可惜褚祥过世太早，终年仅50许。褚祥的技艺，虽属后继有人，但是褚祥的烹饪技法，未能以文字形式整理出来，终属牛街回民厨行的一件憾事。

除上述各家饭庄外，牛街回民经营较有名气的饭馆，还有同聚馆，一般称为馅饼周。甚至许多人只知道馅饼周，而不知同聚馆。可知这一饭馆是以卖馅饼起家的。直到买卖做大了，其经营方式仍是大众化的，既有较高一级的菜肴，也有低档次的包括馅饼和粥在内。其他，经营饭馆的牛街回民烤肉刘，在虎坊桥开业，烤肉陈在菜市口设点。还有以爆肉出名的爆肉马，在门框胡同开业。这些饭馆在南城一带也是颇有名气的。

## 四、牛羊肉业

早年，北京的牛肉铺、羊肉铺和屠宰业之间的分工不是很严格的，一般地说，羊肉铺购进活体，自行屠宰者居多，牛肉铺有

时自购牛只，自行屠宰，但资金较少、场地不大的牛肉铺还是向牛锅房取货。羊肉铺有的除一般销售外，也有兼营批发的，如牛街人梁姓，在菜市开设瑞升羊肉铺，即以批发为主。羊肉的批发商称“发肉的”，做小生意的摊商行贩称“取肉的”。

羊肉铺自羊店购入羊只，不用现金，也是以信用方式结账，每10天称一集，即购入羊只活体后可于10天内把货款结清，同样，羊肉铺发给行贩（自己不宰羊的小羊肉铺，自批发商手中买货，也称“行贩”）也是10天一结帐。这样的信用方式付款，对当时大小羊肉铺，在资金周转上都有很大的方便。

羊肉铺与羊店之间，羊肉铺取得羊店的进货动态和行情等，要靠一种羊行中的特殊职业者“把头”；也可以说羊店的把头是羊肉铺的眼线。在羊只活体的交易中，把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把头不仅仅靠传达信息吃饭，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羊行的里手，把头对于羊只具有高度的鉴定知识和能力。羊在羊群中，把头不用手去摸，只凭眼力，就可以估出羊只的份量和出肉率。质量好的羊，一般可出肉38斤左右，次羊在30斤左右。只需把头一过目，羊只价格就可定出来。所以羊只的成交，把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作为把头，一手托两家，他的作用，对于羊店、客人和羊肉铺都有利。当羊肉铺把羊买妥之后，由把头把羊赶到羊肉铺。过去一个羊肉铺一般平均每月可成交羊300只左右，到了一节，由羊肉铺向把头送节礼，数目的多少，根据羊肉铺的营业情况而定，好的一家起码要送给大洋40—50元，一个把头常常可以兼管十五六家肉铺，每年下来，把头也有可观的收入。据统计全市有把头30多人，其中回民占80%左右。也有不经把头而由羊客（卖方）与羊肉铺（买方）直接谈判达成交易的，称为“自兑”。自兑成交后，每头羊羊肉铺要给羊店一角钱作为落栈费。但是这种

自兑的情况是不多的。

北京的牛羊肉铺，汉民经营的极少，几乎成为回民的专业。从前牛街和其附近的牛羊肉铺有菜市场的大丰号，为李姓所开，稍东有瑞升（以批发为主），市场内有王姓、卞姓牛肉铺。牛街街里有大成号羊肉铺，由杨起龙、赵凤经营（杨起龙之子杨芳、杨林继承父业，现又在原址恢复营业），稍后有聚宝元（马宝贵）、玉丰刘家的刘文明开设的牛肉铺，再南有马德山（其子马珍）开设的牛肉铺和董姓开设的牛肉铺。

牛街人在牛街以外开设的牛羊肉熟肉店是全市闻名的，其中有的制品行销全国各地。它们之中有门框胡同德兴斋（经营人刘汉卿，后为其子刘树琛）、馥顺斋（刘国兴经营）。此外还有户部街的月盛斋（户部街即后来的公安街，在今天安门广场东侧）。

月盛斋是北京的老字号，创立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到现在已有200多年历史了。但这个字号真正扬名还是在清嘉庆年间，由创办人马庆瑞之子马永祥、马永富经营的时候。经太医院的太医帮助，他们在酱羊肉中增加了丁香、砂仁等中药配料，不仅口味提高了，而且增加了药物健身的效果，再加上所选用的肉料精细，调料适当，火候得法，使月盛斋声名大振。月盛斋做酱羊肉的肉汤每次要留出一部分浓汁放入坛内，下次再兑料使用，所以有“百年老卤”之称。月盛斋除酱羊肉外，还有烧羊肉、酱羊杂碎。独此一家的还有酱面筋，也同样脍炙人口。月盛斋代代相传，久盛不衰。到了解放后已是第五代了。

日伪时期的月盛斋，由于羊只缺乏，才增加了酱牛肉。这时的经理就是第五代的马霖，今已80多岁了。

1950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月盛斋迁到前门外大街西侧永增和银号的原址。解放前的鼎盛时期一天也不过七八十斤肉，现在日

产一千多斤，仍不能满足需求。

德兴斋，以卖羊肉为主，兼营早点烧饼、麻花等。以夏季的烧羊肉有名。40年代后期增加了烧羊肉浇面。

馥顺斋是牛肉铺，只卖酱牛肉，通常人们称作“门框胡同的酱牛肉”。馥顺斋制做的酱牛肉与月盛斋的不同，味道浓郁、醇厚，比较口重。

牛羊肉熟制品有名的还有位于西单北大街由溪村薛家经营的蒸羊肉，其做法是羊肉无汤汁，只是加上调料蒸制而成。还有西直门蒋家的牛肉干，略带甜味，越嚼越香。这些也是回民经营的，但其经营者都不是牛街人。

羊肉铺在自行屠宰羊只的同时，还有以下各类副产品收入：首先是羊被屠宰前要剪掉羊毛，每头羊的毛约值大洋二元左右。当羊群自羊店赶运来之后，收买羊毛的人也跟踪而至。屠宰后的羊皮，由皮局子收购。以前牛街有皮连家、羊毛李家等住户，据说这两家都不是直接经营皮子或毛类的商人，而是这种行业的经纪人牙行或清朝崇文门税务司收羊毛税的。羊血交血局子做血料用。旧时的羊肉铺把羊血灌入羊肠内，做成羊霜肠出售。这种羊霜肠只供汉民购买，洒上香菜、辣椒油，是一种小吃。但回民不吃，因为回民禁食血。所谓“能卖不能吃的东西”，即指此。卖羊霜肠的收入是不入正账的，作为店员工人的小费。羊骨头有骨局子收，供制油、作骨制品及肥料用。蹄、角由卖羊头肉的或骨局收购，角可做各种制品及钮扣，蹄角的下脚料亦可充作肥料。

羊肉铺的羊肉、羊头、羊内脏除供市民食用外，也供应各饭馆和卖羊头肉、爆羊肚、羊杂碎的小贩。到夏季，羊肉铺也添售烧羊肉、烧羊杂碎和熟羊头、羊蹄。

羊肉铺也有兼营牛肉的，但不甚普遍。牛肉铺只售牛肉。牛

只活体的来源，与羊只相若，经营牛只的有牛店，过去在三河县的夏垫镇，其交易方式与羊只大同小异。牛只买妥后，有专搞运输的（称“哄趟子的”）由脚行把牛送至指定地点。牛自三河进东便门，民国以后，在那里设有税务厅，每只牛交税金大洋四元七角，谓之“起票”。牛肉铺为了不受牛锅房的盘剥，也多尽量自购，自行屠宰、自销，牛锅房则专营批发。牛锅房把肉发给牛肉铺各行贩，也不收现款，规定5天为一票，到期结算。过去，牛街牛锅房林立，到30年代，只在老君地有北坞何姓、杨姓开设的牛锅房，玉丰刘家的刘祥甫曾在寿刘胡同内设锅房。后来大鄂牛锅房迁至崇文门花市大街以东一带。盖以这里距东便门近，牛只自三河进京后，抵达锅房较近，从而省脚，减少消耗。

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京开始建立屠宰场，羊只统一由屠宰场屠宰，不准私屠，有故违者要受罚。羊肉业公会也开始成立。牛锅房存在的时间较长，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沦陷，牛只屠宰也纳入屠宰场办理。与此同时，按“集”、按“票”的信用付款的结算方式也被取消，批发、购货一律凭现金交易。屠宰场的牛羊屠宰、销售仍由回民主持，现在则由食品公司牛羊肉批发部经营，从业人员仍是回民。

## 五、驼　　行

驼行，是骆驼行的简称。这一行业中的屠宰业是回民经营也是牛街人特有的行业。自清代以迄北京解放前，原来的糖房胡同、羊肉胡同以西的吴家桥、老君地一带是驼行的大本营。

驼行，有三种经营内容：买卖骆驼、用骆驼搞运输、屠宰“破”骆驼开骆驼锅房。这三种内容可以兼营并举。如驼行的某

一家，买进一批骆驼，处理其中一批，或出售活体，或自行屠宰，要看怎样合算，然后择其优者搞运输。搞运输的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纯属运输搬运业务。在运输不发达的时候，自北京跑内蒙古，甚至青海、新疆等西北边远地区，骆驼是主要运输工具。骆行在为客户长途运输的同时，自己也贩运一些有利可图的货物，一年跑上一两次“来回脚”，盈利是可观的，有的因而发财致富。另一种运输，实际上是一种以骆驼为运输工具的商品贩运。最常见的是以骆驼从京西贩运白灰、煤炭至城内销售。每个骆驼可驮千斤左右。买骆驼活体，除在张家口一带购进外，北京城郊各县，也有畜养骆驼搞运输的，牛街的驼行中人和这些搞运输户都有来往，也收购他们淘汰下来的老弱骆驼，牵回屠宰。骆驼肉的批发，与牛肉大致相同，行贩取货也不用现金，按票期5天结清。

驼肉与牛肉近似，不是行家，很难分辨出来。有谓驼肉较牛肉老，肉纤维粗，脂肪呈白色；也有说驼肉胜于牛肉，而且热量比牛肉大。但是，当时驼肉在价格上比牛肉低。常有牛街人以独轮车推着驼肉，冒充牛肉叫卖。驼肉的熟肉制品，与酱牛肉无甚差别。过去酒馆门前卖的“酱牛肉”，有的就是以驼肉冒充的。一般劳动人民吃不起酱牛肉，常常吃驼肉代替。但是驼峰与驼蹄却是高级食品，特别是驼蹄中的“蹄黄”更是名贵，骆驼筋则可充鹿筋制成高档菜肴，这些都是送大饭庄的。

牛街回族劳动人民过去所从事的多属小本经营的服务行业，给牛街回民带来了温饱或小康，也有贫困和辛酸。在旧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商小贩是劳动人民赖以谋生的一个较为方便的途径。这些服务性行业的存在，为北京市回、汉族群众在生活上带来了方便。他们风雨无阻地把鲜菜、食品送到千家万户门口，

品种繁多，制做精良，讲究卫生，价格便宜。所谓北京风味小吃，很多品种是回民经营的。这种情况，在解放以后仍以国营或合作等形式继续下来，可惜后来食品行业合并网点过多，造成人民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并使一些适合于回民生活习惯的传统风味食品在制做上，后继无人，甚至有些食品做法失传或名存实亡，而今回族厨师奇缺，就更能说明问题。幸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搞活经济，国营、集体企业挖掘传统，再加上个体经济的发展，许多人重操旧业，传艺带徒，使诸多濒于失传的手艺得以恢复，人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起来。

## 六、珠宝玉石业

珠宝玉石业（简称玉器行或玉行），是回民传统行业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唐、宋时期。阿拉伯商人沿海路来者，均在沿海各大城市进行贸易，当时他们被称作“蕃客”，其所贩运的货物主要是珠宝、香料。从那时算起，迄今已有1300多年了。迨13世纪蒙古人崛起，势力西至阿拉伯各国，又有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随着蒙古军东来。在这些被称之为“色目人”的阿拉伯、波斯人中，有大批商人，他们率多仍以贩运珠宝、香料等珍贵物产来交换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据考证发现仅在元大都建成的前后，北京就有两处专售珠宝的所谓沙拉市（“沙拉”蒙古语珊瑚珍宝之意）。一处是大都未建成之前，在原金中都城内的沙拉市（即今牛街沙栏胡同）；另一处是大都建成后在鼓楼附近的沙拉市（即今纱络胡同）。可见珠宝玉石业、回族人民、牛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到了明代，回民经营此业者仍未稍减，史书记载当时有“识宝回回”之称。有清一代，北京已有固

定的珠宝市，回回从事这一行业的仍很多。清初牛街经营玉器行有名的户很有几家。这些玉行大户为了做生意，多结识权贵，串走王公府邸，销货渠道极多。他们持有宫廷发的腰牌，可以出入宫禁，即趁上早朝前的空隙，到朝房兜售玉器（谓之“串朝房”），然后于散朝后到买主府邸成交。

待到清末及民国初期，由于外国人来华者日众，牛街的玉器行曾几度兴旺发达。现仅就记忆所及，把牛街玉行中人和他们在廊房二条所经营的商店字号加以统计：

集珍斋：改松岩（是牛街老住户）与王炳年（前青厂王）合伙经营。

义兴成：由戴起隆、沈瑞、闵少圃、沙幼芝等4人合伙经营。这4人均是牛街老住户。

铭宝斋：由王绪、尹忠和、安庆年共同经营。

兴源斋：经理冯某（一般称为冯七巴，名不详），系牛街厨子冯家或称元兴堂冯。曾住输入胡同。

澄怀阁：由马钧出资，其弟马敬儒为掌柜，实由其子侄马澄怀经营。马姓在牛街称良乡马家。

怀宝斋：由刘霞村经营。刘曾住教子胡同。

荣兴斋：经理梁友麟。其子梁德瑞、梁德兴、梁雪庄等在同业中亦颇有名。现梁家一支已迁至香港继续经营此业，由梁家第三代梁宗亢任经理。

同义斋：是由刘万义、马九巴等经营的。刘万义住牛街北口外，又称之为果刘家。马住崇文区。

润宝源：经理李少庵，牛街人称之为树村李。曾住沙栏胡同。

义聚斋：系由马子清、赵远帆、杨竹权3人合营。牛街人称马子清为鸭子马家，称赵远帆家为鱼赵家。

富德润：创办人常星垣，人称常四巴，其子常松年。曾住教子胡同。

泉润斋：经理吴姓，住麻刀胡同东口外路西。

汇宝斋：经理吴殿隆，牛街人。

瑞文斋：经理王德儒，原住牛街中间，后住法源寺后街，是牛街老住户。牛街人称之为小桌王家。

聚珍厚：经理王厚斋，又称王七巴，还曾经营一品香澡堂，在经营管理上颇具才能。其子王惠民继承经营珠宝玉石业。

义成厚：由尹长海、长俊、长明三兄弟经营。

协成号：经理刘仲泉，热心回民教育，曾兼任西北中学总务主任、校长等职。刘家是牛街老住户，祖籍南京水西门。

天瑞祥：经理周其瑞，牛街人称之为大来坊周家。其子周士英，现在美国，仍经营玉石业。

三义兴：由沙云五、沙凤歧、杨茂森等3人合伙经营。

德元斋：经理闵介臣，人称闵三巴。

永宝斋：由常子萱、常子椿兄弟共同经营。原住牛街中间，后去台湾，仍从事珠宝玉石行业。

悦华斋：经理李华堂，后由其子李大福经营。

德文斋：经理孙式武。

义宝斋：经理杨维章、刘英、邓正品。杨为牛街住户，刘及邓均住崇文区。

以上共24家，当然会有遗漏。

牛街人开设的玉器铺还有：

余宝斋：在廊房头条。经理闵信权，其子闵少权。牛街人称之为小墙闵家。今牛街派出所即闵家旧居。

义文斋：也在廊房头条。经理张润芝，牛街人称之为草张

家。

翰古山房：在宣内大街。有两家，都姓周。路西的翰古山房，还曾在中山公园内设店，经理周肇祥，其子周剑伯，住家在教子胡同。

牛街还有一种玉石商人，不设店，既不批发，更不门市，而专门奔走子大户的顾客之家。他们多拥有珍品，且富有资本，极为殷实。如赵璞华、马棠等即属于这一类型的商人。

此外，牛街还有一些玉器行的掮客，或称为跑合的。

牛街的玉器商人，还有两家在外地开店营业的。马宝岑，在南京中央商场开设义宝斋玉器店；沙霈在天津开设怡古斋，后改称怡古商行。

回民在廊房二条开设的玉器铺还有杨汉卿的同源斋（现其子杨联元、杨毅斋在香港经营），黑文彬的德义兴，王立本的玉盛公，杜兰坡的蕴宝斋，铁宝亭（人称翡翠大王、铁百万）的德源兴，李子祥的富润合，李荣亭的荣宝斋，杨姓的绪珍斋，马少宸、马有信叔侄的万聚斋，穆瑞青的宴古斋，还有王振坡兄弟在琉璃厂开的怡宝斋古玩铺。这些店铺中的店员有的也住在牛街，但其经理或掌柜均不住牛街。

牛街的玉器商人，除开店的座商外，还有摊商。如东安市场西门外，曾是珠宝玉石业摊商集中的地方，鼎盛时期玉器摊商有数十家之多。民国初期，有回民古亮臣和李雅轩在市场畅观楼内设摊，这是市场玉行设摊的开始。其后畅观楼、丹桂商场、南花园及市场西正门等处都有珠宝玉器摊商。他们经营的货物，除珠宝玉石外，还有寿山石、昌化鸡血石图章、象牙制品；后来又增加了洋古董，如老式的西洋金银珐琅钟表、八音盒、恰克图烧蓝银器以及名贵的磨料器皿和瓷器等等。这些货在廊房二条是不经

营的。货物的索价有的与成交差距很大，很有些像北京的“挂货屋子”或“老虎摊”的味道，不过他们陈列的货物是不错的。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内也有玉石摊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大量涌入北京，玉石摊商曾盛极一时，仅上述两家饭店内的摊商，就由两三家增至七八家，如牛街的闪文廉、大有庄白忠等户，都是那时有名的也是殷实的摊商。

据统计，北京解放前夕，全市有回民玉石商业户150多家，牛街的几占全市总数的3/4，约110多家。从这一比例来说，玉石行业是牛街人的主要行业之一，经营者是牛街回民中比较富裕的人家。

## 货物来源和进货渠道

同业之间“窜货”。所谓窜货，是本行业之间一种交易方式，其中多是由于某一种货物在甲手中卖不出理想的价钱，就把货物放出去，转到乙手，也许利市十倍。同业之间窜货不需现款，价钱讲妥后，即可由买方拿走货物，售出后再结清货款。也有的不等出售即付款，但都不在市场上兑现；这种情况有时也称作“搂货”，即商议好价钱，并不算成交，而是由乙方去代卖，卖不出去仍将货交原主，并不付钱。而且不管货物价格多么昂贵，价值连城的货，也可以毫无抵押的“搂”来，卖后结算。这靠的是同行间的信用。做这种生意全靠“路子”（即销售的途径），路子都是彼此保密的，不管两者间关系有多好，互不通风。市场交易中还采取“拉手”法，彼此把手褪入袖口内，摸指头以暗码议价，其方法与估衣、骡马等行的情形大体相同。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属“暗码投标”的方式，谁出的价高卖给谁。但是买方有时输了眼力，使买价过高出售时造成了亏损，这时买卖双方还可以通

过协商削减进货价。这在同业中是常有的事，对这种情况行话称之为“砸浆”。

上面所说的窜货，既是玉器行中的一种交易方式，也可以说是买方进货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货物尚有以下来源：

新产品。由采购石料经过开料、加工琢磨等一系列工序，到最后制成器件。在玉器中新货是少数，主要是旧货。旧货年代久远，文物价值、欣赏价值高，而旧货主要来源于没落了的豪门大户。由于这种旧物的易手，在社会上辗转流传，成为珠宝玉石业的主要货物来源。还有把收进来的大件器物改成小件或首饰，加工镶嵌，虽是新货，所用原料仍是旧的。至于收旧物有以下几种渠道：1.门市收购，或派人到外面采办。2.来自当铺。旧时北京的当铺按例于每年春季要清理一次逾期不赎的质物，以收回资金，行话称之为“封当”。当铺把要处理的物品分类编号造册，连同请帖分别送到有交往的估衣、珠宝玉石、古玩等有关行业的商店中去，并定期投标。一般在处理质物的前10天，当铺要把准备处理的物品陈列出来，以供客户看货。3.来自旧货铺（或称旧货屋子）和打鼓的。这些地方收来的珠宝玉石，都转售给玉器铺。

## 经营范围和销售渠道

珠宝玉石业从所经营的货物及其原料来看，包括：珠，就是珍珠，过去都是海水、淡水中的蚌贝内自然生成的。后来才有人工培养的珠子，称“养珠”。宝，是一个大类，主要指红、蓝宝石和“猫儿眼”，还有钻石。玉石主要指翡翠和白玉。还有玛瑙、琥珀、青金、水晶等。

这么多的原料品种，制出的成品其范围主要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陈设（摆设的器物），如炉、瓶、筒、盒、洗、璧、人物、动

物、插牌等等，行话叫做“件头”；一类是饰物，如搬指、戒指、钳子、耳坠、镯子、别针、胸花（挂花）、佩玉、别子、帽顶、帽花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实用器物，如鼻烟壶、镶嵌宝石的刀具、烟嘴和翎管等。饰物的式样有中国汉、满、蒙、藏、回等民族喜爱的，也有外国人习惯的式样。

还有所谓杂项，如珊瑚制品，象牙制品，用贝壳、玉石、宝石、珊瑚等镶嵌在紫檀、红木或漆器上的螺钿制品、雕漆制品等。

珠宝玉石业也有兼营古玩旧瓷的。玉器铺兼营杂项的，包括高档红木、紫檀家具、螺钿、雕漆、镶嵌银器等，以廊房二条的瑞文斋和打磨厂的润宝成较有名。

珠宝玉石行业，以销售对象来分，有本庄、洋庄的区别。所谓本庄，系指其销售对象（称“用主”）以中国人为主。洋庄则以外国人为主要销售对象，有的专搞出口生意。本庄内还有蒙古庄，其销售对象为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客商。经营蒙古庄者多会说蒙古语，并有较大的资本，是玉行中的重要行次。

## 玉器加工和前店后厂

珠宝玉石的加工，有玉石作坊，大的作坊有几十人，小的则只一两个人，他们以制做玉器摆件为主，大件如鼎、炉、茶具、花鸟、人物，小件如戒指饰物等。作坊或个人单干户，绝大多数为来料加工，即玉器商人买进原料后，量材设计，然后交玉器作坊加工，也有极少数工匠自做自销的，即所谓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早年牛街有个寿面刘，是身怀高艺的玉器大师，以制做烟壶闻名。烟壶两耳所做的兽头，也称“兽面”，人们对这位大师就以“寿面刘”呼之。“寿面”者，乃兽面之雅化。刘有弟子18人，也都成为玉器名匠。寿面刘居住的胡同后来被叫做寿刘胡同

（今牛街中间东侧）。玉器铺开前店后厂先例的牛街人，是富润德的常文庆。他原是清代武举，后弃武从商，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骑骆驼去新疆和阗采购玉石原料，运回北京加工，自产自销。他制做的玉石制品，摆脱了以饰物为主的作法，而是与日常生活发生了联系，生产玉石玩具、玉石灯罩、玉石麻将牌等。他的产品远销国外，成批出口，这种经营方式是别具一格的。牛街人后起的如荣兴斋的梁锄梅兄弟、永宝斋的常子萱、常子椿兄弟，他们都以前店后厂的方式，经营仿古旧玉和翠玉加工并兼营珠宝。

玉石作坊全靠技术高超的工匠。高超的艺人，还具有设计的天才，他们上凳能做活，下凳又是设计师，能根据原料的形状、颜色等设计出绝代珍品。旧时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数百人之多，在回民中有李庆林在炭儿胡同开设瑞兴斋玉器作坊，自制自销。在炭儿胡同开设济兴成的高济川及其子高立斌、高忠等都是李的传人，有名工匠杜少甫也是李的传人。据说德源兴的铁宝亭手下有两位高手工匠。一次铁买进一块玉料，绝大部分是白色，只有一点翠绿色。工匠把它设计成一棵大白菜，上面站着一只绿蝈蝈。妙合自然，栩栩如生，这一作品成稀世珍品。

作坊完成一件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事，大的器件，往往需时几年，成本极高，非资本雄厚者不易办到。

## 玉行的同业公会组织

玉器行远在清代初期即有同业公会组织。据记载，玉行公会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始名长春会馆，会址在琉璃厂小沙土园。为玉行酬神议事之所。庚子年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公会房舍被毁。后有润古斋玉器铺倡捐巨款，进行修理，渐复旧观。

宣统二年改名玉器行商会，回族会员约占1/3。1936年因选举事发生矛盾，缘北京市珠宝玉石业公会理事会的选举，曾规定了回民理事席位的比例应占1/3，但选举揭晓后，全部理事几为汉民所占有，因而引起回族会员的强烈不满。全体回族会员当即退出会坊，遂另行组织了回民的珠宝玉石业公会，会址设在廊房二条，马少宸任第一任会长。至1940年改松岩为会长，1945年永宝斋的常子萱为理事长。1949年义聚斋的马子清为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恒林祥玉器铺杨进贤为公会主任委员。原玉器业公会则由李树椿任会长，1949年理事长为杜锡乡，1949年后负责人为聚宝源李祝三。1951年在市工商联筹委会建议之下，两玉器业公会合并，称珠宝玉石业公会，有会员46户。不久玉器业公会又与古玩业公会合并，改名为历史艺术文物业公会。再以后即并入外贸业，称外贸文物业，直到公私合营。

## 北京珠宝玉石业的今昔概述

明代北京珠宝玉石业的营业情况，已不可考。清代，在前门外开辟珠宝市，成为当时北京较大的玉石集散地。至民国初，廊房二条修起了石渣路，各商号均采用大玻璃门窗。玉器铺几十家，屋宇毗连，窗明几净，琳琅满目，珠光宝气。外国人称之为“珠宝街”。

珠宝街的顾客，不外是些达官贵人、富贾巨商，后来又涌入大量外来顾客——洋人。一个时期英美洋庄大盛，至1936年东洋庄又兴起，日本客商曾大购珠宝，当时一个玉罍（音lěi，古时盛酒的器具）可卖到银洋24000元，其价值之高可以想见。

北京的珠宝玉石业还有一个特殊市场，就是东琉璃厂的火神庙（今宣武区文化馆址）。每逢春节，自正月初一到十五上元灯

节，随着厂甸庙会举办，火神庙成为玉石业的临时集市。廊房二条的多数玉器铺，和崇外青山居的一部分摊商，都到火神庙设摊售货。摊子是很讲究的，上放两三个玻璃匣子（称为罩子），内衬缎子，里面放上玉石翡翠的饰物。在罩子的后面是一个玲珑的多宝格，摆放“件头”。一般是下午才热闹，届时灯光耀眼，琳琅满目。店员、经理都衣冠楚楚地迎候着客人。这里能做成生意的并不多，与其说是一次展销，不如说是各家炫耀实力的展览，并借此了解同行的货物情况。但是最好的珍品是不在这里展出的。有的商号，没有什么值得陈列的，也要撑撑门面，甚至不惜借货展出，或请托熟主顾在“庙上”做一笔假交易，以制造生意兴隆的假象。每天收摊后，各家要把货放入木箱抬回本号去，以策安全。火神庙两侧的房里出售旧字画，多由琉璃厂许多小字号展销。七七事变以后，火神庙的庙会，无论玉石、文玩、字画等货色都愈来愈差了。以后庙会就停止了。

日伪统治时期，玉器行业不振，玉器铺有的已改业，廊房二条曾一度变成为买卖黄金、银元的黑市交易市场。待日寇投降，国民党重来北京，同时美国人也大量涌入，这时玉行的生意又略呈回苏。

应该说，在旧社会回民所从事的行业中，珠宝玉石业是最富裕的，其中不少人也是积极参与回民的社会活动，为兴办民族教育和其它活动，捐输了不少财力。正由于是比较富裕的行业，旧社会牛街回民，托人情、找门路送孩子到玉器铺去学徒，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富裕起来。但除少数人外，往往事与愿违。玉器行的商品，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货物价值很高，而且这个行业不是经常有生意可做，往往一年未必成交几起，要积压大量资金。所以没有殷实的资本是无法发迹起来的。玉器行都比较讲排场，

虽然从业店员不需要人多，但开支很大，等不上合适的买主，只好把货物廉价转卖给同行，特别是在过去动荡的年代，随熟识顾主的发迹与倒台，店铺也极不稳定。到日伪统治时期，普遍营业萧条，不少店主已培养自己的子弟上中学、大学，另谋职业。珠宝玉石业也已不是回民所羡慕的行业了。北京解放前夕，许多较大的珠宝玉石业店铺，纷纷歇业。有的外迁至香港、台湾和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珠宝玉器业曾一度呈现萧条。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玉器业纳入特种工艺公司，同时还成立了东城、崇文、前门等三个管理处，开展国外销路，使国内较少销路的玉器，出口创汇，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仅在归入特种工艺品经营一年之后，就赢利百万元之多。1960年，东城、崇文又成立了首饰公司，前门管理处改称文物商店。

珠宝玉石业在新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指引下，珠宝玉石作为特种工艺行业，已有的国营加工厂更加发展，不少堪称国宝的大型制品被创作出来，为祖国的文化增添了异彩，也为国家创汇做出了很大贡献。牛街也组织了集体所有制的玉器加工厂，为特艺公司加工，也颇具规模。最近宣武区外贸公司还成立了民族玉器厂，以恢复这个有特色的行业。仿制品也很有名声。回民王姓老人，解放后参加了工艺美术工厂，收徒传艺，把以前从不传人的仿旧瓷的绝艺留传下来，使制做出的高水平的制品，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新中国珠宝玉石业的振兴，为四个现代化积累了资金，回民从业者为此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七、香　料　业

香料业也是回民的传统行业之一，它的历史渊源与珠宝业是一样的。《回族史论集》刊载庄为玑、庄景辉两同志文章《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叙述甚详。中国古代香料很少，称为“古者无香”，汉代后妃住处用花椒和泥涂壁，用以温暖和取其香气，称为“椒房”。花椒是香料，当然不只是这一种，但可以想见香料不多。中国香料过去主要依靠进口，以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地为主。庄文记述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古船上有香料4700余斤，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等多种，而蒲寿庚（穆斯林，阿拉伯蕃客）就是宋末经营香料业的巨富。宋《太平寰宇记》就记载洒衣蔷薇水，《诸蕃志》说“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大食就是我国过去对阿拉伯的称谓。《诸蕃志》刊载当时进口香料有29种之多，我们过去常听到的乳香、安息香、苏合香、丁香、栀子香、没药等都出自大食或波斯（古代我国称之为安息国）。

自唐至清，辗转相承回民经营香料业者很多。北京牛街的大户，在清朝至民国初年还有皂荚（角）黄家，原有几个大商店，到了民国20年(1931年)左右，只剩下朝阳门吉市口的馥兴斋一家，经营沉香、芸香、檀香、乳香、攒香(由樟脑、冰片等合成)，燃香用的炭饼，和自制的肥皂。很早以前，人们使用猪油加碱合成的胰子球，回民忌用。就由香料业出售用牛油、皂荚制作的清真胰子球。“皂荚黄家”的称谓就来源于此。继清真胰子球之后，又有几家专制作清真肥皂的。馥兴斋还把香料羼入大香(烧香用的)做成棒香，也叫安息香。但是回民经营的香店抵不住非回民经营的

大香料店的竞争，而且货源不继，销售对象日少，很多香料逐渐由中药业经营，馥兴斋也终于倒闭了。

代之而起的有妙香阁，是回民杨毓光经营的，以香水香（棒香或线香）兴旺了一阵，到了解放后合并于香厂。回民从事这个行业已成为历史陈迹。

## 八、毛巾工业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北京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牛街礼拜寺的王浩然阿訇是创办人，担任副会长，他注意到回民的贫穷问题，特别是看到许多妇女无所事事，又没有文化，生活困窘，有的甚至沦为乞丐，就提出了兴办工厂的主张，以扩大回民的就业门路。他以自己的威望请出穆紫光等人筹办普慈工厂（“普慈”之名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教义认为真主是普慈今世一切人的），搞织毛巾的生产，地址就在输入胡同西口内路北，由当时在回教俱进会做文书秘书工作的回民刘德源（字贤洲）负责。因为这是带有社会福利（救济）性质的企业，浩然阿訇请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每月批给紫老米99袋，以维持开办时的支出。值得提出的是，这个工厂有不少女工，男女同工，这在当时的牛街是个创举。

过去一般群众用不起毛巾，而是用塘布手巾。当时管毛巾叫“羊肚手巾”，或“洋手巾”。织毛巾在民国初年也还算是新兴的工业。这个工厂办起来，确实为回民搞机织工业生产，创造了新的开端。培养了一些掌握织毛巾技术的工人。但普慈工厂只办了两年就停办了，因没有懂技术会管理的人员，销路不畅，竞争不过大工厂；而且又发生了人命案，一个炊事员与工人打架，打死

了工人，负责人刘贤洲为此吃了官司。其后不久，这个工厂就停办了。普慈工厂虽然停办，但是播下了搞工业的种子，后来牛街回民又办起了马记（马玉祥）毛巾工厂和梁星五办的毛巾厂等。解放初期杨世桐等人也办起了毛巾工厂，后来加入生产合作社。从业工人多数是牛街回民。

综上所述，在旧社会，牛街回民应该说是体力劳动者居多，经济状况殷实富裕者较少，多数处在勉强温饱的状况，甚至是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是文化落后的原因，又是文化落后的结果。当然上述这些行业，只是举从业较多或有代表性的记述。其他如清真糕点业，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也还有个比较有名的前店后厂的清华斋（马兰亭开设。现改为宣武糕点厂清真车间）；粮店业如在广安门大街的仙保长（马祝三开），澡堂业的一品香、清华池以及一些油盐店等等，都是由回民开业。到民国以后，当产业工人的回民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以在原财政部印刷局（现国营五四一厂）工作的较多。其他像电工（也有开小电器行的）、瓦木工都有一部分人。瓦木工中牛街承包建筑盖房的包工头就有李二、马德麟、马德禄三家，各自有一批工人在他们手下干活。牛街过去还有几个棚铺如棚杨家、棚沙家，自己有杉篙、苇席，支搭临时席棚和建筑用的脚手架，后来称为架子工。由于民国以后西北中学、成达师范培养了不少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回民（有的上了大学），所以回民在中、小学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多了起来。其他任铁路、邮电、银行职员，工程技术人员，中西医生的也有一些人。解放前在政府供职的很少，一般的也多当职员和办事员。

综观牛街回民过去的经济行业，以商业和服务业为多。有的

行业带有独占的性质，尽管像牙行这样的行业没有了，但从业人员的业务知识还是有用的，有的行业有民族特色和自己的业务技术优势。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对人民有益的业务技术，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大放光彩。

# 政　治

北京回族人民的政治地位，从元朝到新中国人民政权建立，经历了很大的曲折变化。元朝是回族形成的初期。在蒙古族统治阶级夺取中国中央政权的战争中，阿拉伯、波斯、中亚细亚的穆斯林不论是主动依附合作，还是被"签发"征调东来都曾出过力，有不少人被封为权贵，参与了政权领导；官方规定各地"达鲁花赤"这个有地方实权的行政主官，只能由蒙古族和色目人充任。色目人主要指的就是上述的穆斯林（也被称为"回回"），政治地位虽低于蒙古族但还优于汉族；其中有些人在北京（大都）作官，颇有权势和财力。元朝在政策上对回回是照顾的，这是回族形成为一个民族很主要的契机。元朝军队在全国各地屯垦，回回与当地汉蒙民族通婚，对回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起了决定的作用。明朝时，回民已遍居各地，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照顾，这是由于明朝的开国元勋有不少人是回族，如常遇春、沐英、蓝玉等，他们为推翻元王朝立有战功，官居显要。燕王朱棣北来定都，带来很多南方的回族人。明末以前，回回民族的经济、文化是发展的。清朝虽有少数回回在朝廷或地方供职，但回族的地位江河日下，特别是西北、西南几省多次爆发回民起义（流传着"回不保清"的说法），遭到清政府的多次镇压。在政治、军事高压政策

下，回回民族为了保存自己，被迫提出了“争教不争国”① 的口号。宗教趋于谨守斋拜，兴旺一时的汉文宗教著述也冷了下来，汉族先进文化更受到摒拒，从此回回民族开始在经济、文化上落后，道路越走越窄。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虽只指五个民族，实是汉族与所有少数民族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进行民主革命，缔造民国。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② 正是由于中山先生和当时国民党的这样主张，极大地调动了回族人民建设民国的积极性。在当时反帝爱国思潮的影响下，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突破宗教、民族的圈子，把爱国、保国放在首位。当时也有一些人提出振兴民族，就要改良宗教；而要改良宗教必须从谋求发展经济和提高文化教育入手。这一思想影响到全国回族有识之士，在北京牛街回民中也产生了反应，具体表现就是一时学社、学会等群众团体和回民的组织风起云涌，在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旗帜下，回族一度兴旺活跃。只是后来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在民族问题上，推行了大汉族主义的统治，甚至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使回族又陷入灾难。

在旧社会里，大汉族主义者对回族人民的侮辱与歧视，以及北

---

① “争教不争国”，即争信教的自由不争政权。这个口号是回回民族在大民族主义的统治阶级压迫下，为维护生存，缓和与统治阶级的矛盾而提出来的。这个无阶级性无革命性的口号在部分回民中延续了很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群众对它进行了彻底分析，澄清了模糊认识。

② 引自白寿彝所著《中国回教小史》第九章。

京沦陷期间日伪在回族人民中间制造分裂和煽动，往往都是以宗教作题目而出现；回族人民争取平等自强的斗争也往往以伊斯兰教为公开旗帜。各种宗教组织及其活动，也无不带有政治色彩。这是回族人民政治活动的特点。

近百年来，回族中的先进分子有的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更有不少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回回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自身解放的阳关大道；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组成了兄弟友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回顾历史上北京地区，尤其是牛街一带回族人民的政治活动情况先从辛亥革命以后所组织的宗教学术团体说起。

## 回民学术团体

### 清真学社

回民创立的学术团体，在华北几省市首推天津杨仲明阿訇在光绪末年创立的“清真教育会”，虽拟就章程，但曲高和寡，未能实现。1913年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的回族学生与北京京师第一两等小学堂的同学联合组织了“清真学会”，没有成为事实。到了1917年，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的同学创立了“清真学社”。现在能够找到文字材料的有呈请立案的呈文、批示和规约，从中可以看出该社的宗旨。

1．立案呈文：呈为创设“清真学社”恳请立案

事。窃维宗教之主旨，要以道德为依归，道德之修明，则恃学术为先导。溯我清真古教，传入中国千数百年，虽信徒日众，贤哲代出，而宏博学理终未大昌。推原其故，皆由学者囿守一方，不能集思广益之所致。德明等有见于此，拟在京师牛街组织“清真学社”，以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藉联同教之感情，共勖学问之进步。虽宗教之信仰任人自由，而事业之进行悉遵法律。庶几道德因学术而愈明，学术以研究而愈进，宗教固可藉以昌明，社会国家亦胥获补益。谨拟规约十条，呈请鉴核，俯准立案，只候批示遵行。谨呈京师警察厅。

2. 京师警察厅批　第二千二百七十二号

原具呈人　张德明等

呈一件　报组织“清真学社”请备案由。据呈报组织“清真学社”，假牛街清真寺为临时事务所，缮具规约，请予备案等情。查该学社，以阐明教理，研究学术为宗旨，系属一种关于公共事务之结社，核与治安警察法，集会结社各条，尚无不合，应予照准备案。除呈报内务部并行区查照外，合亟批示该具呈人等遵照。此批。

中华民国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京师警察厅总监印。

3. 社员规约：

一、本社为清真教人所组织，专在研究学术，阐明教理，故定曰“清真学社”。

二、本社只设干部一处，不分设支部。

三、本社有下列职务：

甲、对于教务之利弊，有以文字提倡之责；但不得攻击个人私德。

乙、对于非回教人，关于本教教理教务之误解及诋侮，有以文字驳正分辨之责；但不得涉及挑衅辞意。

丙、对于同教人，及非同教人，宗教之疑问，有解释之责。

丁、对于教理教法之争持，有引据经典以调解之责。

四、本社精神，专在研究，拟定每周集议一次，遇必要时，得开临时会。其会议规则，另定之。

五、本社得以研究所得，公布于宗教界；其公布方法，另定之。

六、本社公布文件，用全社名义。

七、社员无入社费，但进行之事项，有负担经费之义务。

八、本社公布文件，一切费用，采分配法，由社员平均担之。

九、凡清真教人，年届成丁，具有研究之能力者，均得入为本社社员。

十、本社置左（列）之职员：

甲、社长一人，代表本社，综理一切。

乙、干事四人，辅助社长，分担事务。

以上资料引自白寿彝教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400页，原载《禹贡》第5卷第11期，赵振武先生《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一文。赵振武先生是居住在牛街的回族学者，名斌，

1894年生，毕业于牛街的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中学毕业后入北洋政府主办的“筹边学校”，与牛街的孙绳武、陈文举同学，后该校改称“北京政法专业学校”，赵振武先生毕业于此。孙、赵、陈等人为牛街回民最早的大专学生。呈报人张德明字仲光，也是与孙绳武、赵振武同班同学，张虽不是居住牛街的回民，但关心牛街的公益事业，其上代曾任职清朝的哈密馆，称“哈密馆张”。张仲光先生解放前曾在南京、青岛招商局和铁道系统任职，解放后在北京市民政局所属单位工作，已去世。

“清真学社”的具体活动，已不可考，但知在1921年以后因社员外出就业“南北飘散，社务乃陷停顿”。这个组织从章程看，主要是研究伊斯兰教的学术团体，尚未见有关民族活动的记载。

## 穆友社

20年代初，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牛街回族青年大中学生10余人在就读于宣武门外河南中学的李廷弼和刘屹夫的倡导下，组织了一个回族青年团体，叫“穆友社”。“穆友”意思就是穆斯林朋友。参加者有刘伯余（刘屹夫的哥哥）、杨兆钧（字涤新）、杨汝佶（字雪门）、冯景崑、闵毓翰、王希英、王梦兰、马凤歧（字兰坡）、李文斌（字浩章）和当时在牛街小学任教的王梦扬、马中澄，以及青年印刷工人韦诚光（字耀先）等。公推李廷弼（字翼安）为社长。

穆友社成立于1923年。大家议定以“砥砺言行、联络感情”为宗旨，切磋学术，交流心得，研究时务。“时务”就是振兴国家、民族的大事，当然也包括振兴回回民族的大事在内。穆友社成员每月到李廷弼家中集会一次。穆友社还办有油印刊物《穆友月刊》，自己撰稿，自己刻写蜡版，油印的份数也不多。出刊了

几期，因没有经费就停办了。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回民曾组织后援会，演剧筹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穆友社也参加了。从而也就接近了牛街的回族工人。牛街回族工人绝大部分是在牛街附近的财政部印刷局工作。前往该厂的通道枣林斜街，其东口就在牛街。回族工人文化水平低，技术很难提高，生活也清苦，迫切要求学习文化，但无学习条件。牛街老住户回族工人李德寿出面与穆友社联系，商议请该社社员利用课余时间为工人开办夜班（校），学习文化。穆友社慨然应允，并商借牛街礼拜寺前院三间平房作为教室，也得到礼拜寺理事会的同意。穆友社的社员满腔热忱，修缮空房，准备开学。并聘请了当时牛街小学校长为主任，但牛街小学校长和其他宗教界人士恐怕穆友社积极为工人办学，混进“乱党”（指中国共产党），就退回聘书，封闭教室，使即将成立的夜校顷刻流产。经此打击之后，穆友社社员也开始分裂，有人为继承办学这个宗旨，办起了中才小学。

## 追求学会

1925年，穆友社分裂以后，由刘屹夫联合一部分原穆友社的社员另行组织“追求学会”，它的宗旨是“砥砺言行，追求伊斯兰教真理，研究伊斯兰教，交流文化学习心得，锻炼身体，为本乡（即牛街）服务”。既不发行刊物，也不对外宣扬，所以追求学会在当时鲜为人知。

学会的会址就在麻刀胡同3号刘伯余、刘屹夫的家里。会员除刘氏兄弟外，尚有杨兆钧、杨汝佶、马凤歧、马明道、孙崇义、王之恩、王之荣、王之耀、张国强及李文斌等，开始没有女会员，以后吸收杨汝佶的夫人马涤华参加。学会公推刘屹夫为会

长，每月集会一次，寒、暑假期间会员群集开展活动。会员都是回族青年，文化水平较高，互相要求严格。追求学会订立了一些“戒条”：戒烟、戒酒、戒赌、戒嫖，在集会活动时不准谈恋爱、婚姻及家庭琐事。有人曾吸烟，受到规劝不吸了，个别人言行不一，趋炎附势，轻则批评，重则开除，10年中确有被开除的。

为研究伊斯兰教经典，刘屹夫、马凤歧、杨兆钧、杨汝佶等曾拜清真寺教长杨明远和伊玛目安静轩为师，学习阿拉伯文。刘屹夫还编出一篇阿拉伯字母的简易学习法，受到阿匐的称赞。不久清真书报社的马明道向追求学会赠送了一批外国出版的英文伊斯兰教书刊。刘屹夫、杨汝佶合作，翻译了《和平的宗教》、《穆罕默德传》等书，由清真书报社出版。这些书宣传了伊斯兰教文化，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当时清真书报社还出版《正道》刊物。追求学会的会员将该书报社收到国外伊斯兰教界外文报刊上有关世界穆斯林的动态译成文稿，在《正道》上发表。《正道》发行范围很广，主要是全国各地的清真寺。

追求学会研究伊斯兰教的时间不长，注意力就转到加强会员身心锻炼和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上面了。他们请牛街回民中知识渊博的孙幼铭先生来讲授文史。孙曾在北洋政府的国会工作，后任北京《晨报》编辑。孙除指导读书、批改文章外，还向会员们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讲述时局动向，使会员们开阔了视野，知识大进。

追求学会的会员为锻炼体魄，还利用假期徒步郊游，访问回民聚居村落，既增长社会见闻，又在严寒酷暑中锻炼了身心。这种励精图治的追求是很可贵的。

1930年，由于刘屹夫大学毕业后受聘于河北顺德师范学校，杨兆钧也离京他去，追求学会就停止了活动。

## 励 进 学 会

“励进学会”是在1931年2月，由西北公学初中三年级学生闵毓华、冯万才、马魁林、梁德芳、杨富魁等5人发起创立的。他们当时都是16到18岁的青年，成立学会的动机可以从他们发行的《励进》刊物看出梗概。

《励进》第二期上刊载了《敬告读者——关于励进学会》一文，上面写着：“这个小团体的产生，并不是玩嬉，也不是盲从……”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肥沃的四野，锦绣的河山，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国家，一变而为不可收拾的局面。”“再看回教，更使我们不满和痛心……牛街是北平回民集众的地方，而它在北平里是：极穷的，缺乏教育的地方。”文章说：“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觉悟，便决心组织团体，联络同志，尽我们能力所及，不顾一切的去作些事业。”因此，励进学会是以“研究学术兼为社会贡献微渺利益”为宗旨，没有会长，都是会员。成立之后又吸收了安庆澜、马正清两名会员。

励进学会的工作计划是：一、研究某一种学术或某一个问题；二、翻译一些国外有价值的东西；三、出版个刊物。以后还要进一步搞社会调查，了解社会。七个人的分工：闵毓华任总务主任兼会计，安庆澜任出版主任兼编辑，冯万才任社会调查主任兼发行，梁德芳任学术研究主任兼印刷，马正清任文牍，马魁林任庶务，杨富魁任发行。

《励进》创刊号（油印16开本，20页）中《关于创刊的几句话》里有这样几句话：要“把事实的经验和书本的知识联贯起来，互相参证，那才是求学最完善的方法。”“为社会做一点细微渺小的工作。”这也说明了励进学会和刊物的宗旨。文章还

说："中国在国际上固然落伍了，但我们的回教在这个落伍的国家里仍然是落伍的。"强调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发展教育。在当时回教、回族、回民概念混同的时候，说回教落伍(落后)，也就是说回民落后。

《励进》第二期刊行于1931年9月15日，是铅印本，文章感谢校长孙绳武出资印刷。封面上印上了"西北公学学生会主办，励进学会主编"。

此外，我们现在还找到了署名"励进学会启"的传单，标题为"国难来矣!!!同胞其速醒!!!日本出兵占据关东"，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跃然纸上。传单无年月，按其内容当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现摘抄如下：

> 读者均鉴：顷据报载：本月十九日，日本无端出兵沈阳。据我衙署，虏我长官，屠戮我无辜人民，毁灭我重要厂所，犹复北侵长春，南掠营口。关东三省，几无一片干净土矣。近更占领青岛、葫芦岛，增兵平津。噩耗传来，心神俱碎。窃以日本觊觎我国东北，已非一日，只以均势已成，公理昭张，未敢贸然实行。……始而万宝山欺凌我农民；继而朝鲜全境惨杀我华侨。彼之所以出此者，盖欲激动我官民，予彼以可乘之机。……无奈彼野心勃勃，不顾师出无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进据沈阳矣。夫海盗式之日本帝国，无足论矣。独我无辜之同胞，遭此荼毒，财产荡尽，生命不保，而宛转呻吟于日本铁蹄之下矣。呜呼痛哉！
>
> 今者日本犹自调兵遣将，占我要隘；我国军则一再退让，避免冲突；而我国民则已热血沸腾，目眦发指；大有

灭此朝食，不共戴天之慨。此情此理，足徵民族之精神未死，国家之观念犹存。……然我人于此愿献刍荛之见焉。

……必也上下一致，而以国民为后盾。……如是则宣传尚焉。……然宣传乃工作之初步，未足言成，顾励行之如何耳。

且也，近年来，外侮频仍，国人每有刺激，动于心者必发于声；迨事过境迁，乃置之九霄云外，徒见宣传，未睹实效……

此次日本强占沈阳，非同小可，甚望国人卧薪尝胆，自行警惕。盖日本唯一出路，在我中国，所谓大陆政策者，由来已久，是中日之不相侔，已甚显明。国人于此若乃徒事宣传，而无坚贞一贯之行，窃恐国家前途不堪设想矣。

国难临头，丧亡无日，同胞！同胞！其共勉之。

从这两期《励进》和这张传单可以看出当时有爱国思想的回族青年学生的抱负。当然，他们当时受国民党报刊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时在文章中个别地方出现过称共产党为“匪”、“抢掠”的字样，有时甚至提到“大伊斯兰主义”① 的话，这在当时情况下似不应苛求。这几个人，有的后来加入了国民党，有的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梁德芳在共产党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闵毓华出生于牛街一个贫寒的家庭，1936年学运中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辗转到兰州中共回民特别支部工作，任支部委员，后在

① 也称“泛伊斯兰主义”。认为只有伊斯兰教能治理世界各国，主张向全世界推行伊斯兰教，由伊斯兰教统治世界。在穆斯林中有一定影响。

银川工作，不幸在一次日寇轰炸银川时，中弹牺牲。闵毓华同志，立场坚定、作风朴素，且有工作能力，是一名优秀的回族中共党员。已被追认为烈士。

## 伊斯兰学友会

“伊斯兰学友会”于1929年发起创立。成员以在北京各大学学习的回族青年为主。是北京各回教、回族团体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创立之初是从“振兴宗教”开始的，但后来由于思想不同，一部分人提高了民族意识，改组为“中国回族青年会”，与纯以发扬宗教为己任的人分道扬镳，伊斯兰学友会也就停止了活动。现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图书资料馆珍藏的一本《伊斯兰学友会概况》中有关章节摘录于下，可以看出它的宗旨和组织状况。

### 伊斯兰学友会缘起

我伊斯兰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又为世界最进步之宗教；其在民族历史上之价值，及对世界上文化之贡献，至大且巨！凡我教民，莫不视此为最大之光荣，而思有以保存之，发扬之，光大之。惟时至今日，此伟大之宗教已处于停滞不进之状态；而尤以吾中国之教民，萎靡衰颓达于极点：教义之湮没，知识之简陋，思想之固蔽，教育之缺乏，生计之迫蹙，实为世界所罕见！教中志士，睹此危亡情况，思欲振奋以挽回颓势者，固代不乏人；然多以学识不足，昧于世界大势，只知抱残守缺，舍本逐末，遂使努力等于虚掷，收效愈不可期。其学识充足者则又鉴于教中之积习难返，不敢毅然负责，因而望望然去之，听其自生自灭者有之；深恶痛绝，自

暴自弃，不惜同化于外教者亦有之。于是本教遂每况愈下，言之殊觉痛心！同人等肄业各大学，忝为教中知识分子，既怵于真理之湮没，及教义之不扬；复感环境之日非，兢兢然恐自堕于迷途；乃益觉自己地位之危险，及责任之重大，爰本青年纯洁之志愿，奋斗之精神，而有伊斯兰学友会之组织。将尽其能力之所及，以研究教义、修译经籍，发扬伊斯兰之文化，光大伊斯兰之精神，使教内教外，对伊斯兰得到真正之认识，一洗从前之误解及轻蔑焉。至于其他诸大端，如对于教民知识如何增进，思想如何启发，教育如何普及，生活如何改善，以及一切增进教民幸福诸问题，同人等不揣谫陋，莫不留意研究之，设计之，以图贡献于本教同胞之前。非敢云夸，不过稍尽教民一分子之天责耳。

这篇“缘起”说明了当时回族知识分子希望振兴的心理。囿于当时的思想，只能从发扬伊斯兰教达到民族的自拔、自励、自强。

《伊斯兰学友会略史》中记载了伊斯兰学友会的成立经过。当时各地来京入大学学习的回族青年日益增多，彼此很愿意成立一个互相切磋琢磨的组织，苦于互不认识，一时无法组织。1929年春，成达师范由山东济南迁平，校长唐柯三① 愿将一部分校舍辟为会所，并且代募经费。他在1929年5月于东四牌楼清真寺成达师范召开座谈会，参加者有交通大学李廷弼，北京大学马永祯、王耕田，朝阳大学薛文波、张智良，中国大学韩桐彬等10余人。

① 唐柯三，名榎（音怀）字柯三，以字行。山东人，出身回族仕宦之家。在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化学，曾任职于山东省政府，后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在山东省府任内与马松亭阿訇创办了成达师范学校。

大家都认为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组织，于是各自联络熟识的回族同学，召开了一次筹备会，拟定了会名、宗旨。时隔一周，又召开了等二次筹备会，决定了成立大会的日期和总章。

1929年6月2日，伊斯兰学友会正式成立，到会30余人。筹备会报告了筹备经过、宗旨，通过了总章，并选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0月又召集全体会员大会，另行改组。参加会议的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交通大学、民国大学、辅仁大学、铁路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工业大学、政法大学、财商专门女子大学等13校的60多人。会议选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刘柏石、马永祯、王耕田 3 人(不设主席，提倡集体领导)，候补委员马述尧，干事马汝邻、丁在田。研究部正副部长黎静修、杨新民，候补王尚贤，干事赵振武、张新民。组织部部长薛文波，候补刘文裕，干事韩桐彬、张智良。宣传部部长李廷弼，候补张智良，干事陈同文、王义。监察委员马晋恒、张百川、韩桐彬。

伊斯兰学友会在最初通过的《总章》中，提出“本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研究伊斯兰教义，发扬伊斯兰精神为宗旨”。在1930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修改为“本会以研究伊斯兰教义、发扬伊斯兰文化，以期对于社会国家有所供献为宗旨”。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伊斯兰学友会成立一年之后从宗教研究向政治活动方面的转化。会员资格扩大到初中毕业以上。该会还设立了编辑委员会，由李廷弼、马汝邻、马述尧、金希文、陈永祥 5 人为编辑委员。刘屹夫原也参加了该会，于1930年辞职退出。

伊斯兰学友会在存在的两年中，组织过两次讲演，分别由唐柯三先生和山西的马骏先生担任，还有游园，欢送毕业学友等活动。

伊斯兰学友会的会员有：丁在田、丁孔书、王耕田、王寿龄、

王振远、王蔚华(女)、王炳璋、王之荣、王义、王尚贤、尹国祥、古柏年、艾宜栽、田永和、伍文贤、李廷弼、李宪章、李秉政、李荫龄、李懿修(女)、沙文清、金希文、马永祯、马述尧、马汝邻、马殿驹、马安邦、马俊、马廷璧、马晋恒、马星拱、马杜若(女)、马天骥、陈同文、陈永祥、海佩仑、海佩芸、底尊信、底钟英、张新民、张智良、张百川、费得明、贾艮、华铭、杨新民、杨国荣、赵振武、赵继武、杨敬之、刘柏石、刘文裕、刘荫梅、黎静修、薛文波、穆乐天、阎鸿弟、韩桐彬、张长健、刘屹夫。

伊斯兰学友会成立一年多以后，内部即出现了分歧。少数会员认为应研究宗教教义，发扬伊斯兰精神；多数会员则主张搞民族运动，不能局限于宗教。意见分歧最早由刘屹夫的退出而尖锐起来，以后部分学友相继脱离，另行组织团体“中国回族青年会”，明确提出了民族的旗帜。从而伊斯兰学友会就无形瓦解了。

在伊斯兰学友会任职的骨干中，执行委员会干事马汝邻是唯一的一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马汝邻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成员，后经刘靖同志介绍加入共青团，1934年转为共产党员。他主张搞民族运动，争取民族平等权利，是组成中国回族青年会的积极分子。

## 中国回族青年会

中国回族青年会从一成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出版的《回族青年》期刊的创刊号上就提出了“民族自治”的主张，在国家大事上，也以回族人民的立场发表了一些政治主张。在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它主张回回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

它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为此，他们与那种认为回回只是汉族人信奉回教，不是一个民族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中国回族青年会的成员要比伊斯兰学友会更加广泛，参加者还有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回族知识青年。

中国回族青年会于1930年在北京西单清真寺成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因大部分成员离平才停止活动，一共存在了7年。中国回族青年会虽不设在牛街，但骨干多是西北中学、成达师范两校师生，与牛街有很密切的关系。

1939年，中国回族青年会撤退到重庆的会员想恢复组织，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回回”是民族，只得改成“中国伊斯兰青年会”。1945年以后改为“中国回民青年会”。在重庆时期，回族青年会的薛文波等人，仍坚持回回是民族，与当时国民党政府中某些人把回族说成是一些生活习惯特殊的公民，有过激烈的争论。

## 回民群众组织

### 中国回教俱进会

中国回教俱进会是北京最早的一个广泛性的回族群众组织，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创办人主要是牛街礼拜寺有名的王宽（字浩然）阿訇。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以下简称“俱进会”）的动机和宗旨，可以从以王浩然阿訇授意、由陈鹭洲先生执笔写的《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中看出。

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

王　宽

余游土耳其归国后，始知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

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未几，而清真学堂以立。然每叹吾教之散漫，欲筹收束之方，而未由也。

天相中国，共和缔造，集会结社载在条文。宽乃纠合同志，创设此会，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曩昔之希冀竟能如愿以偿。岂非真主之默佑也欤！

吾会开幕，转瞬经年。际兹《通告》刊行，宽有数言。我最亲爱之穆民，其听之！回汉相处，千载有余，而乃交哄时闻，感情恶劣，殊非五族一家之道。汉、满、蒙、藏，譬犹兄弟，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总宜相亲相近，且勿疑忌疑猜。余各处演说，皆以此语反复言之。实不愿酿兄弟阋墙之祸，而妨碍闾里之安宁也。

宽犹有言者：土耳其与吾，同种之国也。该国人士对于中华物产，最为欢迎。果能中、土结约，互通商旅，将见庄严民国称霸亚洲，而雄飞世界矣。说者谓：吾子之言得毋理想之谭欤？不知事无难易，顾力行之如何耳。吾国商业方在萌芽，此时若不急图国外之贸易，他日商务殷繁而无尾闾之泄，必受绝大之影响。未雨绸缪，此其时乎！

余不能文，爰嘱陈君就余意而命笔书之。知我者当不以为河汉也。

三年一月副会长王浩然，宽谨白。

王浩然阿訇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国，游历土耳其、埃及、意大利、阿拉伯诸国。第二年回国。他在这篇序言中呼吁回民要组织起来，提倡五族共和，和睦相处；另外还建议中国和土耳其通商，以求“庄严民国称霸亚洲而雄飞世界”，这种想法

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并且身体力行，例如辛亥革命爆发，甘肃提督升允负隅顽抗，反对共和；王浩然阿訇急电甘肃五马（马步芳、马进祥、马福祥、马麟、马骐），劝他们不要盲从。并电告升允部下统率军民的提督马安良（回民），以共和为重，劝他停止进军，解了西北之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美国军队驻扎牛街一带，并住进了牛街礼拜寺。王浩然阿訇亲自到八国联军总司令部及德国大使馆，面见八国联军统帅，力陈不应干涉回民的宗教信仰，得到允许，美军撤出了礼拜寺。同时，王浩然阿訇还召集牛街回民中习武的青壮年，组织起来保护牛街一带商号、居民。1902年，经王浩然阿訇与京张铁路主管胡玉芬交涉，将铁路用地改划到三里河清真寺以东，使清真寺和寺以西的回民坟地得以保留。群众为王浩然阿訇立碑纪念。

辛亥革命共和政府成立，王浩然阿訇于1912年邀请当时的回族上层人物军警督察长马龙标、教育部次长马邻翼、侦缉处长侯松泉、消防处长杨开甲、内务部佥事杨子襄及知名人士蔡大愚、高凤林、陈鹭洲、王仲猷、马愉臣、马少泉、李庆麟等创办中国回教俱进会，推举马邻翼为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

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另一主要人物是马邻翼。马邻翼，清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湖南宝庆(现邵阳)城西外西湖村。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邵阳贺金声组织的"大汉佑民灭洋军"，任参谋长，立志反帝救国。失败后，东渡日本，在弘文学院学习师范教育，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回国，在湖南与黄兴、谭延闿等兴办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北京清政府学部任职时，与王浩然创办了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北洋政府时期任教育部首席参事（也有记载为次长）。就在这时，他被推举为俱进会会长。他与王浩然都积极拥护中山先生

领导的民主革命。马邻翼原字振吾，民国以后改为振五，就是表达他要以振兴“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为己任。

关于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工作范围可以从《中国回教俱进会章程》中看出一斑。第二章会纲第二条中规定：（甲）组织适合本教之报社，刊发日报或周报，章程另定；（乙）倡设男女小学校及艺徒学校，均照教育部定章办理；（丙）倡议男女工艺厂，并力谋生计改良之法；（丁）依会员之志愿及能力，组织法政讲习所或假期讲演社；（戊）翻译上乘经典附以说明，使教旨灿烂于世界；（己）调查同教户口及生活习惯各状态，以为一切规划之藉手；（庚）提倡俭德，凡衣、食、居，及嫁娶、丧祭、岁时宴集，概崇节俭，以期力挽浮俗；（辛）编辑白话论说，分送各处掌教，请其于礼拜聚集时，明白讲演，以期输入国家思想、世界常识；（壬）提倡回文学堂（按：指清真寺内的阿拉伯文经堂教育）内兼授汉文及其他必要之学科；（癸）劝导剪除发辫及阻止妇女缠足（此二项系回教教条内所本有）。其中如清真寺编白话论说，输入国家思想、世界常识，使当代的政治知识进入清真寺，应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中国回教俱进会的会长后来改称理事长。继马邻翼之后，王浩然任理事长，王病逝后，侯德山（松泉）任理事长。1934年理事长为常耀奎（朗斋），侯改任副理事长。参议长马邻翼，副参议长刘景山，理事杨开甲、哈汉章、孙绳武、穆文善、王继祖、王桂照、马吉第、马麟、满书绅、唐柯三、马鸿宾、马骏、马鸿逵，参议马璇、王桂曾、马玉林、马英华、王丕谟、丁德山、李恩重、孙德春、何瑞滨、安静轩、赵国桢、马荣宝、冯公肃、杨明远、哈端（应为锐）川、孙光瑞、王瑞兰、安贵。办事机构分为七个股，各设主任：交际赵玉相、文牍陈振家、会计马桂馨、

调查常文庆、庶务安镜泉、教育张德纯、编辑王静斋。

会员入会资格是：凡20岁以上的回民，有公民权，愿遵本会章程、经会员二人介绍才能入会。从入会会员的成分来看，该会主要是回族上层人士所组成，其中多数是军政警界人士，其次是阿訇，再次是商界，其中主要是珠宝玉石业、饭庄和牛羊肉行业中的资产者。教育界和职员为数很少。

中国回教俱进会成立之后，曾经参与了当时的民主政治活动。1912年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来到北京，王浩然阿訇以中国回教俱进会名义，在东珠市口织云公所召开欢迎大会，出席回民中各界名流和阿訇、群众等人不少。中山先生在会上讲了话。这当然与马邻翼会长是同盟会员和与孙、黄的旧谊有关。1917年，中山先生在广东成立军政府誓师北伐，曾致函中国回教俱进会王浩然阿訇，“令举西北实力参加革命”以为北伐之策应。王浩然阿訇遵嘱致函西北回族军政要员，并派他的学生孙绳武去广东面向中山先生汇报。

中国回教俱进会主办《穆声月报》、《穆光半月刊》，主编是陈鹭洲，还成立“清真学理译注社”。清真学理译注社设在教子胡同清真寺内，主编是伊玛目王友三，编辑是王文清（静斋）、李宗庆（云亭）、王浩然、王振海、张子文、王瑞兰等著名阿訇。主要译注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经典。

在俱进会的支持下，牛街在1931年成立了“回教正俗俭朴会”，设在牛街自治公所。它的宗旨是：“以崇（宗）教典改正礼俗，破除奢侈热风，倡导节俭美德”。在章程的名称项下说明：“本会盖以本教同仁办理婚丧等事不合经典，模仿他教，虚靡金钱，毫无实义，思矫正之，故定名‘正俗俭朴会’。”该会为委员制，设常务委员，由会员群众公推。常务委员为：王瑞兰、安

静轩、张润芝、杨兰亭、杨蕴章等11人。下设宣传股，撰写文章宣传节俭美德，刊登报刊或印发群众，负责人是杨璇圃；调查股调查婚丧等情况习俗，负责人是马振武（按：疑为赵振武）、陈申芝、马长春、马耀如等；还有习仪股，有委员16人，协助会员办理婚丧事宜。设有公约，共同遵守。这个组织在一段时期内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各省、市、县有不少支会、分会机构，虽然与总（本）部并没有严密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关系，但是本部与支会、分会间互通声气，相互响应支持，影响遍及全国。设在北平的俱进会本部到1928年“北平回民公会”成立以后，有不少活动是与北平回民公会联合进行的。

“俱进会”虽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但最后被迫解散了。1934年，中国回教俱进会奉令向北平市政府社会局重新申报备案，当时没有批准。1936年春，又一次向社会局申报，呈报冀察政务委员会，得到批准。但5月2日，北平市政府忽下令“查回教团体，中央已批准中华回教公会之组织，并发给证书在案。依照民运法令规定，同一性质之人民团体，以一个为限”，强迫停止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活动。与此同时，中央民运会要求中国回教俱进会的负责人唐柯三（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达浦生（阿訇）、王曾善（立法委员）等中国回教俱进会的负责人充当中华回教公会筹备委员，唐柯三等人以各地回民有意见为由，未受命。

中华回教公会大约在1935年成立。筹备委员会设在南京。马良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日伪统治期间，马良出任伪山东省省长，当了汉奸。

## 北平回民公会

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北伐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回族），率军驻防北平，西北的回族军人马福祥也来北平。当时牛街的孙绳武正任职北平市政府。北平回民中的上层人士认为北伐成功，民国缔造，是争取民族平等、振兴回族的大好时机。马天英、马赋良、李廷弼、张兆理、吴建勋、刘伯余、王梦扬等，在得到马松亭阿訇的赞同下，一起拜访了白崇禧，陈述为振兴伊斯兰教、回回民族，以及为民国作贡献的意见；其后在牛街小学召开过北平回教各界人士欢迎白崇禧的大会，北平市长何其巩、回族知名人士马邻翼、孙绳武等及各清真寺阿訇、乡老均出席会议。正是由于这些活动，促成了西北公学（西北中学前身）和北平回民公会的诞生。

北平回民公会是本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对内实行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成立的。这个组织虽只存在了9年，没有常设的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它却是我国最早出现以回族命名的一个群众团体。

1928年（有说1929年）在教子胡同清真寺举行了北平回民公会的成立大会。筹备这件事的是马天英、刘仲泉、吴建勋等。大会由马天英任司仪，请马邻翼为主席。马邻翼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这个组织称作“回民公会”，而不用回教的名义。回民即回族民众；提到回回后边总联上个“教”字，是不妥当的。这种把民族与宗教区别开的说法给当时与会者以深刻的印象。至今参加过这个大会的老人仍言犹在耳。北平回民公会原有《章程》和宣言，由于十年浩劫，已找不到原件。据记忆所及，该会为理事会制，设常务理事，宗旨是争取民族平等权利，兴办教育文化事业，维

护回民的合法权益。理事中主要负责人是刘仲泉，理事长是马邻翼或杨开甲，理事还有赵振武、马天英、马赋良、吴建勋、张兆理、王月波、王梦扬、李玺亭、李竹君、马澍元、冯致臣、杨景廉、李芝庭。由于没有办事机构，该会实际设在西北公学，办事人员主要是西北公学的尹伯清等职员。北平回民公会有徽章，长方形，一端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其余为绿色，上印有北平回民公会字样。这个组织一成立就以民族为旗帜，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北平回民公会的不少活动是与当时中国回教俱进会一起进行的。这两个单位共同做了下面几件事：

（一）教义广播讲演：1934年，经唐宗正与北平市广播电台主任沈宗汉商定，每隔一周的星期三下午四时广播半小时教义，由回族学者或阿訇播讲。这是利用电台公开介绍伊斯兰教的创举。

（二）举办妇女教义讲习会：自1933年开始，借用牛街西北公学礼堂，以后又借用新月女子中学教室，为牛街地区3000户回民的成年妇女讲伊斯兰教教义，由李德俊讲授。

（三）处理过几次“教案”（详见后）。

（四）妥善地处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世界史》中有关诬蔑穆罕默德内容的问题。

1936年1月，汉口回族人士致函牛街礼拜寺，并附有传单，内容系揭露商务印书馆出版、樊仲云译美国人韦尔斯著《简明世界史》中有污辱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的文字。北平《新兴报》也刊登了此事。俱进会和回民公会领导人于1月12日在西北公学召开会议。到会马邻翼、杨开甲、王瑞兰、马松亭、孙绳武、刘仲泉、尹伯清、赵振武、张润芝、金吉堂、陈鹭洲11人，决定用中国回教俱进会和北平回民公会名义联名致函商务印书馆，请其更正道歉；

并提出几条要求。由尹伯清撰稿。1月13日发函后，商务印书馆于17日复函致歉，并完全接受了所提要求。俱进会和回民公会又致函各地回民（回教）组织，通报妥善解决了这个事件，没有酿成事端。

（五）组织北平回民食品营业审查委员会。

1936年，北平有的汉族商贩，为谋取回民主顾，扩大营业收入，将自制的食品挂上回民特有的清真标志“汤瓶牌”，冒充回民食品出售。此事被回民发现后，强行摘掉汤瓶牌的牌子，引起一场纠纷。为此，中国回教俱进会、北平回民公会、教务研究会于1936年9月27日下午在西单清真寺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出席70余人。会议决议：由俱进会、回民公会和教务研究会李宗庆、王瑞兰、米清文、冶亮普、山国庆、陈鹭洲、赵璞华、刘仲泉、王梦扬、薛文波、马少云、赵瑞林等人共同组成北平回民食品营业审查委员会，参照天桥清真寺制做的汤瓶牌式样，制定北平市统一的汤瓶牌，并由北平回民公会报请公安局备案。印制调查证，由各清真寺对附近商贩进行调查，确系回民经营的商贩，发给统一制定的汤瓶牌，并决议扩大宣传。会上由王梦扬宣读拟就的宣传材料，经会议通过印发各寺。会议决定：凡发现回民私售汤瓶牌清真标记的，经查明属实通信警告，予以制止；凡回民制售不合教规要求的食品，要派员劝解。

此项工作，七七事变时无形停顿。事变后，北京回教会又继续工作，将核发标准制作的汤瓶牌改为“回教营业证明书”。

（六）创办北平回教临时难民救济会。

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之后，出兵冀东，京东、京北各县相继沦陷，人民纷纷避难来北平，其中不少是回民。当时北平各社会团体、慈善机关办了一些难民收容所，但回民恪于

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不便投宿。基于爱国热忱和同胞情谊，北平回族上层人士倡议创办回教难民救济会，5月20日发起人召集会议，通过简章，呈报市政府公安、社会两局备案。救济会设在牛街礼拜寺。主要负责人均为中国回教俱进会和北平回民公会的成员。具体办事人员除由西北公学及附小抽调职员外，还约请了各清真寺乡老。

简章拟为六条：1．本会以救济战区回教难民为宗旨；2．本会委员无定额，均为名誉职；3．本会办理处所暂定牛街礼拜寺；4．本会收容处所暂借公共处所；5．本会一切经费俱由各委员乐捐；6．战事平定后，即行解散。该会有常务委员15人，主席1人；分任总务、调查、文牍、救济、庶务、交际、丧葬、卫生、会计、宣讲等10组。经费由会员筹募。（按：会员是俱进会和回民公会会员。）

救济会有7处收容所。分别设在牛街礼拜寺、教子胡同清真寺、寿刘胡同清真寺、王老师傅胡同第二十小学、天桥礼拜寺、笤帚胡同礼拜寺、牛街西北公学。收容人数到6月初已达1272人，其中男313人、女516人、童304人、婴139人。各收容所借用清真寺厨房另立大灶，清真寺都有沐浴室，难民可沐浴。各住室由卫生组组织难民值日洒扫、消毒。牛街地区所有回民中西医生均义务巡诊，分批在医务室值班，备有药品，随时发给难民。还另设有病室，以便病人隔离静养。清真女寺收容妇孺，备有产房，由医护人员为产妇接生。收容所除供应汤菜饭食外，还备有茶水（回民均有饮茶习惯）。清真寺阿訇到收容所讲解教义，宣讲员讲时事。每日下午有小学教师来上课，教10岁以上儿童识字与算术。

收容所有一套入所、外出等制度。入所登记要审查是否为战区难民，详细记载，发给标志，凭标志出入；夜间不得外出，白

天外出访亲友或购物要登记。外出发给证明，以应途中盘诘。救济会工作人员均佩袖章，白布印有绿旗白月牙。

救济会自成立至解散几个月间，收到各方尤以牛街及北平各回民商号、居民捐来米面、蔬菜、油盐、药品、茶叶、钱款等，帮助了受难同胞度过难关。

## 日伪时期的北京回教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华北逐步沦入日伪政权的控制之中。

侵华日军进驻北平城内，占据了不少学校、寺庙。当时天桥清真寺也住进了日本兵，他们在寺内杀猪造饭，玷污了清真寺。日本军队破坏回民风俗习惯之事不断发生。这时中国回教俱进会和北平回民公会都已停止活动，回民痛感失恃，希望有人成立组织，出面关说当局，以保护自己安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受破坏。但回教会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回民的意愿，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达到分割中华民族，统治中国的目的，惯用的手法就是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远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日本黑龙会和浪人会就策划搞所谓“回教运动”。据杨敬之《日回教政策之全貌》① 一文揭露，明治末叶，日本浪人早已着眼于回教问题，其中以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及浪人会首领头山满为最著。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又与犬养毅等集议于东京，推近东浪人伊卜拉欣为监导人，“共立决心，发誓从事于回教运动”。民国时期黑龙会派出川村狂堂，浪人会派出佐元间贞到中国进行阴谋活动。这二人足迹遍历东北、华北、西北直到新疆，

① 该文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

以及沿海各省，活动于回民聚居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士之中，以日本穆斯林的名义用汉语进行所谓调查。佐元间贞化名左东山，钻进上海《回光》杂志，发表文章，鼓动回民应以取得政权为主旨，隐晦地进行煽动。左东山在七七事变后窜来北京，找过《震宗报》的主编唐易尘，鼓动他搞回教组织。川村狂堂在30年代初就来过北京。他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效。

天津失陷后，天津成立了“天津回教会”，会长是长期在天津日本医院当医生的中国回民王晓岩。王晓岩在1937年深秋来北京，在李铁拐斜街同和轩饭庄宴请北京各清真寺阿訇、乡老，提出要求成立“北京回教会”的组织，并与天津回教会一起联名保释天津沦陷后被日本人逮捕的刘冉公。刘在事变前任天津《新天津日报》社长，是京、津回族中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在同和轩的宴会上，王晓岩推举北京牛街礼拜寺阿訇王瑞兰为北京回教民众的代表，两人一起去天津面见了日本特务机关的茂川秀和，于是刘冉公获释。

王瑞兰回到北京后，日本驻屯军的嘱托① 曾任北平平民大学日语教员的小池定雄经常出入于牛街礼拜寺，筹备成立“北京回教会”。王瑞兰自知没有办行政事务的经验，邀出唐易尘与小池商洽筹备事宜。北京回教会的会长是王瑞兰，副会长杨蕴章（牛街回族老中医），理事兼秘书长唐易尘，理事长沙文清（牛街小学校长）。常务理事7人，其中兼社会部长常松椿，兼教务部长李宗庆，兼调查部长杨兰亭，兼文化部长杨文翰，兼会计部长王连钰，还有沙润泽、王适安。理事49人，其中包括有珠宝玉石业的商人、饭庄经理、阿訇等。还把该会雇用的四五名职员也都列

① 嘱托：日本官职称谓，相当于特派员之类。

为理事，向警察局呈报备案。实际包括理事长在内，好多人不仅事先自己不知道，成立之后也没有参加过活动，一切事务都是唐易尘和几个职员操办。报请备案的名单、简章据《震宗报》记载是1937年11月10日呈递，28日批准的，在此以后才又报社会局备案，但实际成立大会却已于1937年10月24日在牛街礼拜寺召开。那天北京36座清真寺的阿訇、乡老都来参加。天津的王晓岩，伪警察局、社会局的代表也来祝贺；日本驻屯军嘱托小池定雄、北京维持会的日本顾问西田畊一到会表示支持。

该会的宗旨，简章里写的是："增进回教教民福利，共谋社会之安宁，阐扬教义，提倡文化。"实际上日本军特授意除宣扬宗教外，关键的是亲日反共。它在成立以后，虽表示过要成立文化学院、译经（古兰经）委员会、日语学校等，但都没有实行。当时正值冬季，北京回教会以会长王瑞兰的名义发过一次救济赤贫回民的玉米面票和煤票，给各寺阿訇发过一次三元伪币的补助（斋费），多数阿訇都把它放在寺内公用。王瑞兰去天津时，曾向驻天津的日本支那驻屯军宪兵队要求发给证明，保障京津清真寺不受侵犯，后来领到了保护执照39张，交各清真寺悬挂。1936年，中国回教俱进会、北平回民公会曾决定给各清真食品摊店发证书，因七七事变爆发没有实现，后由北京回教会补发。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北京回教会的名义，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了大量劝降信和宣传品，寄去日本国旗，声言给予保护，企图分裂全民族抗战。

北京回教会只存在两个月，实际上从北京回教会一成立，另一个更大的日伪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就在酝酿之中了。

还有一件日伪未能实现的阴谋，现在也应揭露，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北京回教会成立以后，有人受日本人指使，出面

与教子胡同清真寺伊玛目安静轩联系，游说成立所谓五教联合会。当时遭到回民的强烈反对，安静轩遂断然拒绝。日伪阴谋未能得逞，以后再无人提到此事。

## 日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

早在东北三省沦陷后的1932年，伪满“新京”（长春）成立了“伊斯兰协会”，罗致了一批回民中的上层分子为他们效劳。1937年末，伪满的满洲陆军少将刘锦标（冠豪）以满铁（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即铁路局）嘱托的名义，随带了赵振翮、夏文元、王若愚、马良璞和刘维中等回民近10人来到北京，由日本人小池出面与王瑞兰、唐易尘商谈建立“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以下简称“回教总会”）的事情。

1938年春节过后，唐易尘带领北京回教会的职员到宣内浸水河胡同小池定雄的家中进行具体的筹建活动。小池作了成立该会的报告。主要负责者原为喜多诚一，后来就是从天津调来的茂川秀和。茂川秀和在日本投降后被列为侵华战犯判处死刑。在浸水河“办公”的还有日本人三谷亨。可见这个宗教团体完全是由日本驻屯军的特务机关控制而成立的。所谓筹备工作只是填发了给北京36座清真寺阿訇、乡老的请柬，以及委员长和委员的聘书。委员长为王瑞兰，委员有李宗庆、米焕章、谢晋卿等几位阿訇，还有在政界作过事的赵国桢（字文府，王瑞兰逝世后继任委员长）和老中医杨蕴章、西北中学校长刘仲泉、第一宾馆经理穆砚农等多人。其后，办公地址就迁到广安门大街100号原工商陈列所旧址。

1938年2月7日“回教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成立大会。会场悬挂五色旗与绿底白色星月的伊斯兰教旗帜。日本军佐喜多

诚一、茂川秀和、小池定雄到会，伪政权的王克敏、汤尔和、朱琛、余晋龢也派代表出席。刘锦标以“回教总会”咨议的身分致开幕词，宣布他们已内定好的委员长、委员名单。会后还在电台演讲“回教总会”的成立经过与意义。当天，“回教总会”在北京散发传单，北京各报作了该会成立的报道。

刘锦标的开幕词及演讲阐明了“回教总会”的宗旨：“本会对外主张中、日、满三国紧密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绝对拥护新政府，发扬亚洲文化，维护固有之宗教；对内连络本教教胞，提倡教育，设法解救本教教胞之痛苦为宗旨。”反共卖国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回教总会”机构，貌似庞大，除有华北回教联合总部外，还有西北、华中、华南、西南……几个联合总部。其实就只有一个华北联合总部，和回教总会设在一起。后来又有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在伪蒙疆自治政府辖区内，下设大同、张家口、包头、归绥（日伪称厚和市）四个区本部。

如上所述，“回教总会”虽名为宗教团体，实是日本军特务机关控制的外围群众组织。刘锦标完全秉承日本人的意旨办事，事无巨细均由日本顾问签字才能办理。先后有小池定雄、三谷亨、高垣信造、三田了一担任日本顾问。

主持日常事务的是总务部长唐易尘（后为李鼎忱）。下设文书课、会计课（课长为日本人长谷川，后为桥口）、教育课、救济课。后来华北总部另成立“经济斡旋所”，贷款给回民小商贩，盘剥重利。还成立了“调查部”，部长是赵振翮，下设调查课和刊物课。调查课调查清真寺的寺产与回民人口、经济等情况。刊物课出版会刊《回教》，开始为十六开本，后改为四开单张，每一期。一版主要是抄转伪《新民报》的政闻；二三版是宣传

宗教教义；四版刊登宗教新闻、回教人士与清真寺的访问调查资料。该会后来还有个宣化部，部长是金吉堂。

华北总部下面陆续成立了几个区本部。1938年2月26日成立了天津区本部，刘孟扬任委员长。北京区本部于3月7日成立，委员长张青云，日本顾问为铃木隆宪（后为藤田义一）。会址设在法源寺后街谢公祠内。北京区本部会务人员只有三、五人。4月30日济南区本部成立，委员长为伪山东省长马良之于马知辛。5月11日河南区本部在新乡成立。10月20日太原区本部成立。

在华北总部以及各区本部成立的基础上，1938年5月北京牛街地区又建立起一个名叫“回教青年团”的准军事组织，名义上称“养成回教青年指导员”，实际是为“防共反共”培训回民武装和警特的军训组织。该会以“为青年介绍职业”为诱饵，欺骗一些回族青年，由各区本部选送入团。教官除由伪满来的王若愚担任外，主要是日本军人津吉孝雄，和七七事变后曾有很短一段时间派到私立西北中学教日语的高桥吉生。赵振翮讲政治课，唐易尘讲伊斯兰教课。该团每班训练三至六个月，团员穿草绿色军服，戴日本式的“战斗帽”，津吉和王若愚全副日式武装。回教青年团共办了三期。第一期9名学员，训练后1人留在该团工作，2人留在回教总会调查课，其余6人当了日本宪兵队的“宪补”①。第二期20余人，毕业后多数分配到铁路局当乘警。第三期30多人，掺入日本青年4人，监视中国学员。中国学员不平，于是发生了殴打日本工头的事件。有一天在该团门外，广安门内大街修马路的工人遭日本工头责打，该团团员一拥而上，痛打日本工头。日本教官喝住训斥，团员们佯称不知道工头是日本人，都被打了嘴巴，为首的金鸿贵被开除。这一期的学员大部分都没

① 日本宪兵队中有少量中国人，称为“宪补”。

有介绍职业。于是第四期招不到学员，最后只得停办。

日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在它的任期内作了以下这些事情。

一、把西北中学改名为西北学院，实际仍是中学，并办起了实践女子中学（详见教育部分）。

二、组织回教总会委员去日本访问。1938年5月，日本顾问小池定雄组织以回教总会委员参加的“中国回教友好访日团”访问日本。团长是刘锦标，团员有王瑞兰、李宗庆、王连钰3个阿訇，总务部长唐易尘、调查部长赵振翮、西北中学校长刘仲泉。5月2日从天津乘船至日本神户，9日抵东京，28日回到北京。此行的目的是参观东京新建的东京清真寺和“大东亚回教圈展览”，以宣扬所谓“日回亲善”。

三、组织中国回教朝觐团去麦加朝觐。成员有唐易尘、刘仲泉、马良璞和两名阿訇（包头的张英、阿拉善旗的苏瑞祥），共5人。1938年12月19日经东北到上海，再乘意大利邮船前往红海，最后到达麦加伊斯兰教圣地。据刘仲泉说，临行前日伪回教总会顾问高垣信造曾与他们交代，出行后要告诉别人，华北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显然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朝觐团到达上海时，报纸已披露了消息，国民党政府得知，立即电派在埃及留学的留埃学生团前往沙特阿拉伯，监视朝觐团的活动。学生团以原成达师范教师庞士谦阿訇为首，约10人，先期到达麦加。庞士谦阿訇与刘仲泉是多年故交，与唐易尘也熟识；学生中多数是原北京成达师范和上海伊斯兰师范的学生，其中庞士谦等人住家都在北京牛街地区。两方面的人见面后，互相说明来意，刘、唐并述说了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双方共同商定以中国全体回民的名义

一起活动，所带礼品也以共同的名义馈送给沙特国王；外出活动由学生团任阿拉伯文翻译，并以国民政府的国旗作为标志。双方在一起活动，关系很融洽。当然回到北京以后，唐易尘所写的《麦加巡礼记》没有谈这些和国民政府留埃学生团合作的情况；日伪方面也没有想到派出朝觐团反而造成一次向外界透露华北沦陷后真实情况的机会。估计日伪后来也知道了朝觐团在沙特的情况，所以，以后每年一次的朝觐就再也没有派人去。

四、派回教青年团学员去日本留学。1940年，回教总会派几名回教青年团学员，由该会职员来文起率领去日本留学。准备到日本后先学日语，然后入日本警官学校，说明其目的是为了培养效忠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警人材。但到日本只学了一年日语，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辍学回来了。

五、为日本帝国主义征集劳工。约在1941年，回教总会的日本顾问提出要各清真寺出面动员回族青年去东北“勤劳奉仕”（日本语意为义务劳动），并许以“优厚待遇”。唐易尘得知此消息后，即和刘仲泉商量，刘指出这是变相抓劳工去东北送命，决不能同意。如主办此事，将无颜见回民父老，要永留骂名。刘、唐二人议妥后，分头告知其他委员。在回教总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一致以回民生活清苦，拖家带口，无力外出，穆斯林外出饮食不便等理由推托过去。此事几经讨论，无人响应，不了了之。

日伪回教总会虽然进行了上述活动，但效果甚微，牛街回族群众仍然用各种方式进行爱国活动。如“回教总会”第一任委员长王瑞兰就曾为河北新城回民抗日救国会作过掩护。据当时新城回民抗日救国会中的杨子健同志回忆，他们为了能公开出入北京，派张玉林阿訇来北京牛街礼拜寺与王瑞兰联系，要求王发给他们

回教总会分会的证明，王瑞兰发给了他们证章和身分证。使回民抗日救国会人员来京免受敌伪盘查，自由出入于冀中、北京之间进行抗日活动。牛街麻刀胡同的刘屹夫同志，是中共地下党员，牛街人未必知道他是党员，但有不少人知道他是革命者。北京沦陷期间，他多次来京工作就住在麻刀胡同家中，邻里无一人告密。牛街回民有去重庆或解放区的，随便编造借口，无人告密，家属也没有受到迫害。当时各清真寺要向“回教总会”写情况报告，但只写礼拜人数多少，实际上是应付“官面儿”的官样文章。

“回教总会”成立后企图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成立什么“回回国”，分裂我中华。据参加“中国回教友好访日团”的刘仲泉讲，东京有个自称是穆斯林的日本人若林半①，个别与刘说，日本准备将来帮助成立回回国，让刘为此出力。刘答复他说，我们回回都是中国人，没有单独成立国家（政权）的欲望，只求信仰受到尊重，并拿出“争教不争国”的理由说：“中国就是我们的国家，如果日本真心帮助我们，就帮助我们（回回）解决穷与愚的困难，多给西北中学一些财力帮助，把学校办好，使更多的子弟上学，将来谋生也不成问题。”1942年日伪回教总会撤了刘的回教总会委员和西北中学校长之职。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伪回教总会随之瓦解。

## 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市分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骨干杨敬之（回族）回到北平。他当时的职务是热河田粮处处长，由于热河是解放区，他这个“处”就设在北平。杨敬之在七七事变前曾在北平，是中国回族

① 若林半：是继日本田中逸平赴麦加与在南洋伊斯兰教进行活动的浪人会员。著有<回教世界与日本>一书。

青年会的成员。七七事变后在重庆入过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以后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专员。杨敬之到北平后，联合了牛街回民廊房二条永宝斋玉器铺的经理常子椿和自称为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鸦片贩谢植伦（回族）两个资本家，接管了日伪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华北联合总部。这时重庆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已“复员”到南京，改名为中国回教协会。常子椿、杨敬之等拉了一些回族各界人士为理事，在日伪回教总会的旧址广安门大街100号成立了“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市分会”。常子椿为理事长，马崇武为总干事，此外尚有监事若干人（都是兼职，不驻会工作）和几个职员。

在南京的“回协”理事长是白崇禧，北平分会成立后曾欢迎招待过一次来平的白崇禧，还欢迎过一次李宗仁夫妇。

回协北平分会举办过信用合作社，地址在王府井大街，即原来日伪回教总联合会所属经济斡旋所所在地。由当时在日本正金银行的回族人常铸九任总经理，马崇武和原在银行界工作的赵某任副经理，日常业务由马崇武负责。这个合作社收取了回族群众1578户3127名社员股金，计值当时伪法币2700余万元。他们用这笔钱作筹码经营银行存放款业务，甚至倒卖黄金和外汇。回协分会还设有“回民小本借贷处”，对回民聚居区小本经营商贩整借零还，还筹办了天坛农场。农场后来因办理不善而停办；小本借贷也由于帐目不清，回收很慢，周转不灵，逐渐停滞，并没有给小本经营的回民群众带来什么福利。据内部人言，信用合作社总经理常铸九勾结谢植伦、谢康夫抽调资金购买黄金，存入正金银行，然后进行倒买倒卖。这样信用合作社由于资金空虚，造成挤兑，存户纷纷争相提款，到北京解放前夕，该社已濒临崩溃。解放后，由回民工作委员会领导，经社员代表会选举了杨益三、杨

永祥、陈明列、平博斋、艾宜栽、杜冠武等成立“清理回协信用合作社委员会”，接管时，只剩下一个烂摊子。清理的结果，查出房产七所（140间），象牙人、玉瓶等23件，出售后得价款1100万元（旧币）。后来以这笔钱开办了回民印刷厂、毛巾厂等回民生产事业。

1945年冬回协北平分会在小寺街（教子胡同清真寺后院）和右安门外办了两处粥厂，施粥救济贫苦民众。另外还在广安门大街回协北平分会内办了一个“普慈施医院”。

临近解放前，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分会就名存实亡了，理事长常子椿去了南京，后去台湾，总干事马崇武因去搞信用合作社，改由曾任日伪警察外二分署署长的回民李毓琦担任。至于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分会还可以一提的事是，理事长常子椿曾参加过参议员和“国大代表”的竞选，在牛街地区搞过一场闹剧。

1946年，国民党集团为了装点“民主”，搞了选举参议员的活动。牛街地区回民中有两人竞选。一个是常子椿，一个是改涤生，二人为拉选票，大请其客，竞争结果，改涤生当选。

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召开所谓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牛街地区由常子椿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孙绳武二人竞选。孙、常两家为了拉选票，送钱、送礼、请吃饭。一时牛街闹得乌烟瘴气。常子椿利用牛街礼拜寺为宣传站，孙则在对面搭起席棚、发表演说，历数“功德”，两家甚至大打出手。最后常子椿财力胜过孙绳武，当上了“国大代表”。孙绳武在西北地区也有选票，最终也当上了“国大代表”。

## 中国回民青年会北平市分会

这个组织不在牛街，但与牛街地区的一些人有关，其成员多

是成达师范的师生，所以在此简述。

中国回民青年会的前身是中国伊斯兰青年会，它是原“中国回族青年会”的成员，1939年成立于重庆。当时参加者据说达4000多人，不少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各地来到大后方的回族青年。该会在国民政府政令所及地区设有分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伊斯兰青年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更名为中国回民青年会。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回民，争取回民利益，融洽民族感情，共负建国任务。”当时主要成员有薛文波、马汝邻、闪克行（闪克）、马述尧、谢澄波和王耕田等人。

1947年12月，中国回民青年会北平市分会在北京西单清真寺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者有成达师范的部分回族师生，以及少数社会上的回族青年百余人。薛文波在会上说明了该会宗旨以及建立分会的意义。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一个名叫吴贯一的人在会上狂呼“回民青年要武装起来，向共军进攻……”，招致与会人员的不满。大会推举薛文波为理事长，马金鹏、马耀、唐震宇、李文善、张德吾、王右宇、黑东风、马国玺等为理事。会后还给蒋介石和当时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发了致敬电。

分会成立后，于1948年5月间，与当时的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市分会等组织成立了“中国回民援助阿拉伯圣战大同盟”，声援阿拉伯国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薛文波在他主办的《北平小报》上开辟有《回民青年》专栏，宣传北平市分会的情况。大约是1947、1948年间，分会还在西单教育部街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礼堂举行过一次穆罕默德圣纪报告会，请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安宾尧（回族）和北平市聋哑学校校长金汝逊（女，回族）作了演讲。

## 中国回民援助阿拉伯圣战大同盟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19世纪末叶兴起的。由于英国的支持，犹太人大批迁回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1947年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这项决议使不及阿拉伯人口1/3的犹太人占据了1.4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富饶地区，而阿拉伯人却只分得1.1万平方公里互不相连的贫瘠土地。阿拉伯人断然拒绝了这项决议。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成立。次日晨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即对以色列宣战，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回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关系，对阿拉伯人民是非常同情的，当时中国回民青年会北平市分会、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市分会、《月华》报社、回民各行业组织和各清真寺等组成了“中国回民援助阿拉伯圣战大同盟”（又称“反犹援阿大同盟”），并决定发动全市回民集会游行，声讨犹太复国主义，支援阿拉伯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当时北平市市长何思源鉴于回民群情激愤，恐阻止游行无效，为不引起其他事端，同意改徒步为乘汽车游行。

集会那天，北平各界回民、西北中学、成达师范、燕山中学和各回民小学师生约千人以上，齐集广安门内大街西北中学东侧广场（现回民学校操场）。组织集会的几个单位的负责人和清真寺阿訇的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卵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声援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兄弟保卫自己神圣领土的斗争，号召回民群众自愿捐献款项汇总寄阿拉伯援助圣战。会上宣读了以“反犹援阿大同盟”和北平市回民群众的名义发往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五国的声援致敬电。

大会结束后，参加游行示威的回民头戴白色礼拜帽，分乘卡

车，手持口号旗帜，高呼口号，从广安门大街向东徐徐行进。汽车从菜市口北行到西单，再向东向北分路回到各自单位。国内外报纸对这一活动有所报道，有的阿拉伯国家也与大同盟发生过联系。

这次北平回民的反犹援阿活动，虽基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感情，但声讨了帝国主义，是有进步意义的。

## 歧视侮辱回族而引起的所谓“教案”

上面提到中国回教俱进会与北平回民公会处理过几次教案，这里加以详述。

从历史上看，在很长的年代里，回族都是处于大民族主义的统治下，因而歧视、压迫回民的事情是常发生的。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又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对伊斯兰教的侮辱也就是意味着对回族的侮辱。而对回族的歧视与卑视也往往是从歧视、卑视其宗教信仰表现出来。例如，清光绪年间前门外广和楼茶园（即现广和剧场）演出时装京剧《马思远开茶馆》。其中有个“背红柜子”的人（即卖猪头肉的。回民卖熟羊肉一般用不加漆的白茬木柜）头上戴了个回民老式样的礼拜帽（六角上尖的折帽），显然这是侮辱回民。当即被一个看戏的回民上台揪打。这件事轰动了全城，后来有人出来调解了了事。

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倡导“五族共和”，“回回”才以一个民族的身分出现在我国政治舞台。但从蒋介石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大权以后，推行的是大汉族主义的统治，除蒙古族和藏族予以承认外，对满族则与清王朝联在一起，满族人民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对“回回”根本就不承认是一个民族，只允许以回教或回教徒称之。到了1941年，以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

之命运》一书，明白地把回民说成是“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公民”。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又连续发生好几起歧视侮辱回民的事件。在这些事件出现以后，激起了回族群众的义愤，也有的使用了暴力手段进行反抗，在过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它的政治背景。这与解放以后，在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下，所出现的个别不愉快的现象，不能等同看待。

## 一、北新书局和《南华文艺》事件

“北新”与“南华”事件发生在华南，影响波及全国。

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一本经国民党政府审查机关批准发行的少年儿童读物《小猪八戒》。书内把穆斯林不吃猪肉，说成是因为“与唐僧取经的猪八戒”是他们的祖先。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回族群众极大的愤怒。上海市以劳动人民为主的回民自发地集合起来，义愤填膺，一举拥入了北新书局，销毁了《小猪八戒》全部存书，捣毁了一些设备。这一事件发生后，上海回教协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沪、杭、宁等地回民组成了“华南护教团”，由著名大阿訇达浦生、政界任职的马天英和知名人士伍特公为代表，到南京行政院请愿抗议。当时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的还表示同情和声援。很快全国各地回民都函电声援，致电南京政府抗议。达浦生等3位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项要求：一、要求政府重申宪法草案规定的“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条文，并认真执行；二、封闭北新书局；三、惩办该书编著人员；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全国各地的压力，恐惹出更大的动乱，接受了这四项要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华南护教案”。就在代表尚未离开南京时，南京又出现了侮辱回民的事件：

南京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南华文艺》上刊载了署名娄子匡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所谓民俗故事，大意是说，关圣帝君（关羽）成神后，游察人间，看到一所寺院匾额写着“西方圣人”（回民称穆罕默德为西方圣人），关公勃然大怒，说东方只孔子是文圣，我是武圣，哪有什么西方圣人。说罢，挥起青龙偃月刀一砍，匾额被横劈两半，悬着的下半块成了“四万王八”。这个故事显然是一些人挖空心思地中伤回民，而且得到了官方的同意。同期刊载的娄子匡的另一篇文章说，穆罕默德在经书上告诫教徒“诸肉不食”，伊斯兰教徒弄错了，以为是“猪肉不食”。这显然是造谣。因为汉文诸猪同音，而伊斯兰教经典是阿拉伯文，这两个字不会同音。特别这两篇文章同刊一期上，惟恐读者弄不明白，用心恶毒，昭然若揭。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是汪精卫，汪的亲信曾仲鸣就是《南华文艺》的主持者。

该刊发行很广，激起了各地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愤怒，各地回民包括新疆维吾尔等族人民在内，纷纷来信来电，要求中国回教俱进会和北平回民公会出面抗议。1932年9月俱进会和回民公会在中山公园水榭联合召开了北平60个寺坊教长、回民代表的紧急会议。会议由中国回教俱进会会长侯松泉主持。会上群情激昂，认为“北新”、“南华”事件在“九·一八”东北沦亡之后接连出现，显系故意挑起民族纠纷，分裂民众，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必须揭露其阴谋，要求政府严肃处理，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当即以两会理、监事及各清真寺教长、伊玛目组成“华北护教团”，专门从事这一斗争。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推举了4位代表克日赴南京抗议、请愿。这4位代表是牛街礼拜寺阿訇王瑞兰、西北公学附小主任王梦扬、

成达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刘柏石和当时任国民党骑兵某军驻天津办事处处长的马子文（回民）。护教团的核心成员则负责组织筹款和对外宣传、联络等工作。

华北护教团成立后，向北平市政府备了案，还召开了平津记者招待会，阐述事态经过，宣布护教团的要求，请新闻界给予声援；并通电全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博取同情和支持。

1932年9月的一个黄昏，5000多回民聚集在北平前门火车东站，挥舞小旗高呼："实现民族平等！""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打倒曾仲鸣！""打倒娄子匡！"欢送代表乘车南下。马松亭阿訇向群众作了简要的护教声明，宣布了将要提出的四项要求。这一举动震慑了市政当局，北平市政府竟命令北平铁路局停发了这次客车。但这更激起了回族群众的愤怒。护教团派出了李玺亭、王仲光2人前往市政府交涉，经过说理斗争代表才得以搭乘次日上午的火车南下。

火车途经天津、济南、徐州等地，当地回族群众均往车站迎送。火车到达南京后，南京回族群众到车站热烈欢迎。并将代表安排到花牌楼清真寺居住。华北护教团除召开记者招待会，参加群众集会外，还与当时尚在南京的华南护教团联合在一起，共商对策。商定由华北护教团出面，华南护教团在南京进行各方面联系，作为后盾。

四代表次日即到行政院交涉。当时汪精卫正在德国，三次交涉分别由秘书长褚民谊、政务处长彭学沛接谈，代表们陈述了国内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特别是回族的现况，及在国家民族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在日寇强占我东北的国难情况下，这种污辱宗教信徒、挑拨民族关系的严重性；阐述了华北护教团代表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所提的四项要求。这四项要求是：一、要求南

京国民政府重申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法律条文，并通令各级行政机构认真执行；二、封闭《南华文艺》杂志社，并由主办人曾仲鸣在报纸公开向全国穆斯林道歉；三、惩办作者娄子匡；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数次交涉，最后国民政府终于同意了四项要求。《南华文艺》即日封闭停刊，主持者曾仲鸣公开在报纸上向全国穆斯林道歉。娄子匡以污辱宗教信仰、制造民族事端罪名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事件取得圆满结果后，南京的回民和新疆少数民族为此开了庆祝会。华北护教团的代表还应邀到上海和杭州访问，受到当地回族和维吾尔族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杭州代表们得知娄子匡还没有处理，立刻向法院提出要求，法院将娄子匡逮捕入狱。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代表们把胜利的消息告知北平，北平又辗转通知全国各地回族群众，俱进会和回民公会收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10月，代表们返回北平，护教团负责人侯松泉、安静轩、刘仲泉等及回族群众万余人头戴白色礼拜帽，到车站欢迎，并用汽车载送代表回到牛街礼拜寺。

为了欢庆这个胜利，牛街召开了庆祝大会。会场设在西北公学大操场。柬请了天津、保定及河北各县的回民代表以及旅居平、津的维吾尔族代表参加。大会由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和西北公学校长孙绳武主持，马松亭阿訇诵读《古兰经》首章并祈祷，唐柯三报告了教案发生和处理简要经过，表彰了代表据理力争的精神；王瑞兰阿訇扼要报告南下经过，王梦扬报告三次交涉过程和娄子匡的处理经过以及各地欢迎情况。大会在欢腾的气氛中结束。

## 二、《世界日报》和《公民报》事件

在上述“北新”、“南华”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1933年10月，

北平的《世界日报》和《公民报》在同一天刊载出标题内容完全相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奇异的风俗》，内容大体是说，西北新疆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奇异的风俗。如毛拉（维吾尔语即阿訇）享有初夜权；人死后用白布裹着尸体，扔到坑内，仰面向上则无罪可进天堂，俯面向下则有罪要入地狱等等。文字说的是维吾尔等民族，但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来说同样是侮辱。

报纸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天桥礼拜寺和设在该寺的伊斯兰教刊物《震宗报》（主编唐易尘）联名发出通知，召集北平各清真寺、坊回民在天桥清真寺集会，到会800余人，绝大部分是笃信宗教的劳动群众，也有热心宗教的知识分子薛文波、王梦扬、金吉堂、唐宗正等。王梦扬援引1932年国民党政府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侮辱的通令，提议用和平方式向北平市政府进行交涉。但到会回族群众早已沐浴，这种沐浴实际是作好为宗教牺牲的准备，伊斯兰教规定为捍卫宗教面牺牲者可升入天堂。王梦扬讲完话后，有人站起来喊："事到如今，我们还能够跟他们讲理吗？我们就是打呀！"全场一拥而起，夺门而出，愤怒的人流直奔国会街《公民报》社，王、薛、金、唐4人先进入报社，发现该报早已得到消息，全体职工均已离社。群众一气之下，捣毁了报社。王、薛、金、唐4人说服群众，《公民报》已被砸毁，《世界日报》可按法律手续去办，动员大家回去。但群众正在狂热的劲头上，不听劝告，直奔西长安街西口的《世界日报》社。《世界日报》社的职工也已离社，大门上锁，门前有10余名武装警察守卫。愤怒的群众向警察喊话："我们是拚命来的，你们每月几块钱的饷银，划不来卖命啊！"警察躲到人群之中。几个力气大的回族壮汉，用力扭断了大门的铁锁，踢开大门，群众一拥而入，

把三层楼的设备、机器全部捣毁，铅字洒落了满街。事完后，王梦扬把队伍领到西单牌楼清真寺，并通知各寺、坊次日到牛街礼拜寺开会，群众散去。王、薛、金、唐等人把事情经过电话告知牛街礼拜寺和北平回民公会，并分头草拟《告民众书》、《请愿书》、《大会通知》等。北平回民公会派尹伯清、沙芳五等人前来协助。这时内二区警察署已派来一名警长、两名武装警察邀请俱进会负责人到警署议事，实际是变相拘捕。当即由王梦扬、金吉堂、唐宗正3人前往。

王、金、唐到达警署，书写了当天经过。后又被押送到正阳门警察总署。当时候审的还有回族老人马福禄。马是追到《公民报》社后大队已经离去，正在门口徘徊观望时被捕的。4人在警署分别经讯问后，又被押送中级法院。推事问话后，提出赔偿两报损失的问题，王梦扬慷慨陈词："两报应赔偿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名誉损失，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民有3000万①，每人1元，还得3000万元。"审讯后取铺保释放。这时北平市的回民店铺已决定，如次日不释放王、金、唐等人即罢市。

在代表被传讯后，中国回教俱进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在牛街礼拜寺举行回族群众大会，集体去冀察政务委员会请愿，并连夜赶制了袖章和标语小旗。次日9时，出席牛街礼拜寺大会的回族群众约5000余人。回民公会负责人之一孙绳武报告了事件发生经过，王梦扬报告被传讯经过。会议当场宣布结队示威请愿。有人啮指写了血书："誓为护教运动牺牲到底"。大队从牛街出发，沿途高呼口号，不少回族商店职工放弃营业加入到行列中来。

当请愿队伍到达大栅栏时，当时任北平市侦缉队队长的回族

① 这是过去吹嘘的提法。实际解放前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总计不超过1000万人。到1979年统计也才1300多万人。

人马玉林受市长委托转达了市政府的意见，要求队伍中止游行，并保证圆满答复回民提出的各项条件。领队人商议后将队伍拉到天安门前开会，连同围观者将近万人。会上薛文波提出四项要求：1．北平市政府重申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命令；2．封闭《世界日报》及《公民报》社；3．惩办编辑负责人员；4．不得再传讯代表，报社损失不予赔偿。以上要求由马玉林转告市长。队伍转入中山公园休息，至天晚即解散。约定次日再到牛街礼拜寺等候答复。

次日，到牛街礼拜寺者有3000多人。北平市长秦德纯请出以小《实报》社长管翼贤为首的北平新闻记者公会的9名代表来牛街调停。双方商妥：1．市政府重申保教令；2．《公民报》损失严重，已不能复刊，《世界日报》勒令停刊三日，复刊时要在报端公开向全体回民（穆斯林）郑重道歉；3．《世界日报》文艺版主编左笑鸿撤职；4．两报损失不予赔偿，四代表也不再传讯，市政府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管翼贤等人电话向市政府汇报，征得同意后转告到会群众，会场报以热烈掌声。

为了庆祝胜利，维持并改善汉、回民众间的传统和睦关系中国回教俱进会与北平回民公会决定召开回、汉联欢大会，会场设在牛街西北公学教室楼前。大会按伊斯兰教习惯，预制油馕[1]分给群众食用。大会主席团有王瑞兰、孙绳武、马松亭、安静轩、李宗庆、冶亮普等人。出席各界代表及回族群众数千人，还有冀察政委会代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社会局局长雷嗣尚，新闻记者公会的管翼贤、金达志等人。大会由孙绳武主持。市长秦德纯讲了话，对回民表示慰问，希望会后各族市民和睦相处。管翼贤代

① 油馕（也写作油香）：回民食品。是油煎的面饼主食。一般喜庆节日食用，丧事也用以待客。

表新闻界致歉，保证新闻界要主持公道，争取增进民族间团结。马松亭阿訇致闭幕词，对市政府解决事端的决定和新闻界热心调解表示感谢。所谓《世界日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关于这样由于侮辱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而引起争端的事件，后来还有几起。如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曾发生过一次砸《北平新报》事件，牛街回民也有不少人参加，但当时中国回教俱进会和北平回民公会已解散，目前没有详细的资料来说明。

## 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

### “三青团回教直属区队”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一些在中小学工作的西北中学校友在牛街的西北中学召开了一次校友会。会上，孙政（原西北中学校长孙绳武的侄子，西北中学毕业后考入辅仁大学）约请了几位当时任小学校长的同学以及辅仁大学的同学王政等发起组织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扬言可以自己填表，倒填参加组织时间，使自己摇身一变，变成“地下工作者”。这正迎合了一般人耻于居在沦陷区，被人视为“伪职员”、“伪教员”的自卑心理，居然有40多人参加，起名叫“三民主义青年团回教直属区队”，孙政任区队长，大家在绒线胡同三青团第六区团部宣了誓，领了团证和臂章，还去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听过一次陈诚的讲话。但这个组织没有被三青团平津支团部批准，认为不能以宗教命名三青团的组织，命令解散。其后除个别人经人介绍重新参加三青团或国民党外，大多数人就与三青团不再发生什么关系。

“三青团回教直属区队”是个短命的组织，很快瓦解冰消了。

## 国民党第十一区党部

牛街有个国民党第十一区党部，是由赵希成和孙政搞起来的。他们把西北一附小主任、糖房胡同小学校长等拉入国民党，拼凑了这个区党部，在西北一附小内办公。他们发展的国民党员大部分是牛街附近回民中的中、小学教职员，在回族群众中没有什么活动。在孙绳武竞选“国大代表”时，这个国民党区党部积极活动了一阵，后来不见有什么活动。

在牛街回民中也有个别人参加过日伪或国民党军警宪特，不一一列举。

## 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

牛街什么时候开始有共产党员的活动，已无从查考。只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来京的回族共产党员丁铁石、丁明臣堂兄弟2人就住在牛街。其后丁熙也、赵兰田两位地下共产党员也在牛街活动，与牛街回族群众建立了联系。1931年到七七事变期间，据知道私立西北中学师生中，就有秘密的共产党员与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西北中学教师马汝邻(原在甘肃省政协，1989年病逝)、陈永祥（后名程千里，现在体育学院，已离休）是党员。学生中参加民先队的有闵毓华、冯万才、梁德芳、马全喜、李超然（李超）、许焕国（徐晃）、满贵辰等人。西北中学的民先队员隶属于东北大学组织内，由闵毓华负责，校内满贵辰是组长，牛街群众中由陈永祥联系。民先队曾发动同学慰劳抗日军队进行募捐。还成立了北京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做了些宣传工作。

牛街的民先队员曾发动回族群众参与了“广安门事件”。1937年7月26日，日军占领了廊房，并由丰台派一个中队分乘卡车进犯广安门，遭到我军的坚决阻击。家住牛街、广安门一带的民先队员奋起助战。此时载有日军的两辆卡车窜入广安门内，民先队员发动了牛街大批回民及广安门附近居民，持宰牛刀、棍棒、铁锹等为武器，包围了日军的汽车。车上日军四五十人，近在咫尺，枪已难起作用。敌军急忙跳下汽车，往高粱地里钻，群众高喊“缴枪不杀”，日军被迫放下武器。后来29军司令部派人把日军带走，交给了日本驻华领事馆。日本驻屯军称此事为“广安门事件”，还向我政府提出了抗议。另据牛街回民王金魁老人回忆，北京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在七七事变后仍有活动。最先在沙栏胡同李少庵住宅西院内集会，后在周家胡同马善亭阿訇住宅（丁家胡同）后院集会，对外以学习伊斯兰教经典为名，实则宣传抗日保护回教，由刘玉山、穆世荣、王金魁3人负责联系，参加者多是回民小商贩。后被当局得知，由外四区区长马兰亭（回民）出面阻止，活动随即停止。

1937年，河北新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回教抗战救国动员会，不断有人来北京活动。1942年新城回民杨子健同志来京，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下，由马光斗同志在牛街建立起中共的回民支部。书记王若平，党员有任君、杨子健、马觐；后来发展了马洪增、马宝亭、马鸿超入党。此时冀中十分区的党员戴增旺回到牛街，丁铁石发展萧德福入党后也编在这个支部；以后又发展了王文启、王文光、沈家利、柴善昌、张桂珍（女）入党。杨子健和戴增旺在吴家桥三条联系了赵姓回民，组织了大车队为解放区运送煤油、报纸、西药等物品。杨子健同志还联系各清真寺和一些回民商号，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并设法使商号为解放区购买物资。广安门内

大街大昌恒煤油庄经理刘法曾，是教子胡同清真寺的乡老，为解放区购买物资做过不少工作。萧德福同志为解放区来平工作的同志安排隐蔽住处、介绍职业、物色证件、购买物资，做了大量的工作。

牛街地区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组织，与上述组织没有横向的联系，属城工部平民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会）领导。最早的党员是刘屹夫。刘屹夫又于日本投降前陆续发展了马书林、杨汝佶、马涤华（女）、王英彪、刘玄华、金绍光、金凤兰(女)入党（均为回民）。1945年建立起支部，由平委会直属，也叫回民支部。这个支部后来发展到22名党员（不全是回民，也不全是牛街人），主要做些情报工作。刘屹夫同志1945年10月去解放区，马书林同志继任支部书记，改由武光同志领导。工作重点移到北城，在牛街地区很少活动。

此外，牛街地区还有冯启文同志（回族）是党员。他是牛街西北中学初中学生，1945年入党，但主要在朝阳区活动。北京解放后调来宣武区，曾任区政府文教科长、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1984年病逝。

牛街回族学生马长龄（彭年），1946年在新华中学加入“民青”，1948年在西北中学学习时入党，曾发展丁启文（回族）等同学加入“民青”。

牛街回民李进德（俗称李四巴），是广安菜市场工人，抗日战争期间，经丁铁石、刘屹夫同志争取他到解放区，曾任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后仍在北京以卖菜为职业，与地下党有联系。

# 宗　　教（清真寺）

根据史料记载和历史学家认定，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应从阿拉伯遣使来到长安的唐朝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算起。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此以前，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中曾有过伊斯兰教徒，因为中国与阿拉伯通商往来，早于穆罕默德开始传教。那么在公元630年左右，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已经普遍皈依的情况下，有穆斯林来华是可能的，但人数不会很多，也未达皇帝“圣听”。伊斯兰教真正在中国传播开来，肯定是要在651年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

清真寺的修建要后于穆斯林聚居。只有在有了一定数量的穆斯林，有了礼拜聚会的需要，才能出现礼拜寺。从沿海传入伊斯兰教较早的泉州、广州、杭州来看，最早的清真寺是福建泉州清净寺（也叫麒麟寺、圣友寺），传说是唐玄宗时所建（712—756年），但据碑文记载实是宋朝大中祥符二、三年（1009—1010年）所建；广州怀圣寺（又名光塔寺）始建传说不一，光塔上原有金鸡以导航船，想当为海上往来频繁的宋代所建；杭州的真教寺（又名凤凰寺），始建于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或说延祐（1314—1321年）年间阿老丁所建。西安化觉巷的化觉寺（清修寺）内有书为唐“天宝元年敕建清真寺”碑（天宝元年为公元742年），但据考证系后人伪造；有宋米芾（1051—1107年）所书“道法参天地”碑，

建寺当在公元1107年以前。至于扬州的仙鹤寺为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5年)建。南京的净觉寺(三山街礼拜寺)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9年)。上海松江真教寺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有记载为蒙古人纳速拉丁所建,寺内有元代郡守达鲁花赤(地方总辖长官)故冢。青海西宁的东关大寺和新疆喀什的艾提卡尔礼拜寺分别建于明洪武(1368—1399年)和明景泰年间(1450—1457年)。北京东四牌楼和锦什坊街的清真寺也都是明代建的。

以上情况说明,这些礼拜寺在沿海最早的是泉州清净寺,内地的是西安化觉寺,两者都传为唐朝所建,但现可证实的,都是建于公元1000年以后的宋朝。据中外史书记载,这两个地方在唐宋年间确有大量的穆斯林(大食人、波斯人)。沿海几个口岸和内地唐时陕西、宋时河南都有人定居下来。据《宋史·大食传》、《宋会要辑稿》等记载,自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大食国曾遣使49次来中国,商人往来当会更多。但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他们中有人到过北京。值得注意的是辽。《辽史·属国军志》中列有"波斯"、"大食"、"阿萨兰回鹘",这些所谓"属国",实际是与辽有交往关系的友好国家。这里所指的大食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但并不是阿拉伯。光绪二十七年李慎儒所著《辽史地理志考》卷五《西辽地考》注这个地方汉时称大宛国,晋时并于康居国,唐德宗贞元以后臣于大食,五代以后或称大石,也称回回。说明《辽史》的大食实指的是新疆曾隶属于阿拉伯的一个小国地方政权。至于《辽史》中记载的阿萨兰回鹘,是臣于西辽的地方政权,当时已经信仰伊斯兰教。由以上资料判断,辽是从西域陆路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往来的,因为辽的版图西至新疆。当时辽的首府在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往来不必经过北京(南京析

津府），纵使当时析津府有过穆斯林来往，也还没有找到曾在这里定居形成聚居区的史证。而在元朝时，有大量穆斯林定居大都，这是有文字证明的。

北京在辽保大二年(1121年)十二月由辽转为金政权。90多年后，到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陷金中都，从此北京处于蒙古军队统治下，后又经历了45年，到1260年忽必烈才来到燕京。在这40多年中，蒙古军已灭回回国（即花剌子模国，今苏联中亚基发一带。公元700年臣属阿拉伯，版图至波斯、阿富汗一带。1218—1220年被蒙古军所灭），并远征到报达（巴格达）。这使大量穆斯林随蒙古军来到北京，有了史实根据。而只有这时，蒙古军进入中都，金宫廷大火之后，牛街附近成为中都子城遗址，才有可能居住大量的穆斯林。

牛街地区的清真寺最古老最著名的是牛街礼拜寺，其次是清朝建立的教子胡同清真寺（永寿寺）。寿刘胡同的清真女寺是民国后建立的。下面一一加以介绍。

## 一、牛街礼拜寺

在北京旧城区的西南隅，自广安门向东和右安门向北的直角交点上就是牛街北口。一进牛街北口就看见了标志着回族聚居区特点的礼拜寺望月楼宝顶。牛街礼拜寺是北京的也是全国古老的礼拜寺之一。1979年 8 月21日被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寺内建筑及文物

牛街礼拜寺位于输入胡同西口以南，春风胡同以北的牛街中间，坐东朝西。寺的建筑群是逐渐增添的，现在的规模格局形成

于康熙年间。寺的外观是中国宫殿式的，体现了中国建筑手法，但内部装修又结合了阿拉伯式建筑风格，符合伊斯兰教活动需要。全寺占地面积总计为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布局对称严谨，构思精巧，砖木结构凝重肃穆，泥金采画富丽堂皇。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祖国宝贵的文物古迹。

牛街马路西侧正对着礼拜寺有一大影壁，汉白玉底座，灰色大方砖镶面。长40米、高5米、厚1.4米。上端起脊中有凤冠莲花砖饰，名为风冠只是图案模拟并没有凤，因为伊斯兰教禁用动物形象。汉白玉底座浮雕有棋枰和钟，但都无人物，所谓“有棋无人下，有钟无人敲”。这与寺内屋脊及飞檐上的鸱吻、兽头等都以形近似，但为“云头”等图案制成一样（这种装饰在历代整修时，有的已补为普通式样，现仅留存一部分）。影壁砖饰中心正对望月楼宝顶，与大殿等建筑中心是礼拜寺建筑群的中轴线。

寺的正面有五个门。正门在望月楼下，只在开斋节（费吐尔节）、古尔邦节（宰牲节）才开启。左右有两个掖门，掖门外侧还有两个小些的便门。平时只有南便门（现已改为铁门）开启。正门与两个便门在一条直线上，两个掖门凹进，院墙形成八字形，掖门前两块空地拱卫着望月楼。望月楼前是一座木制三间牌坊，朱漆彩画，朱漆木栅常关。正门与牌坊相距咫尺，用八字砖墙衔接。正门到牌坊前有汉白玉桥形石栏。牌坊原有木刻抱柱对联，词为“欲溯大原举足莫从他路去，思归至道收心须入此门来”，此联早已毁坏。牌坊上悬有匾额“达天俊路”，与望月楼上高悬的“敕赐礼拜寺”匾额均为皇帝御笔，“扫青”蓝地金字，雕花金边。“文革”中这两块匾被毁。1979年整修礼拜寺时，敕赐匾改为“牛街礼拜寺”，“达天俊路”仍用原词，均为牛

街回民刘东声所书，照原样仿制。所谓“达天俊路”意为“通往天堂俊美的道路”，这与原来的抱柱对联是呼应的，也是《古兰经》首章的基本涵意。

望月楼高10米，为六角形亭式楼阁，双层飞檐，亭顶覆以上黄下绿的琉璃瓦，孔雀绿色的斜脊六角攒尖，上有金黄色琉璃陶宝顶。望月楼上有明间，周围有窗，绕以走廊。每年伊斯兰教历①八月二十九日登楼寻望新月。九月初一见月定为月始，开始封斋一个月；九月二十九日寻月，十月初一见月，斋月终了。现在已按历法精确计算以定月始。

第一道院落有北房三间，原用为经文小学，现为穆斯林建设北京牛街基金会办公室；南房三间，原来东西有门，接通南便门进入南院到达沐浴室，现东西山墙拆除，便门改为铁门后，可通过南房进汽车直达院内。另设两间小南房为传达室。前院窄长，南北掖门内各有砖影壁一座，望月楼下左右各有亭子间一座，原为停放亡人进行殡礼冲洗之所②。正门相对为大殿的窑殿，有一道青砖墙相隔，南北各有朱漆大门，其间松柏夹道。东门外则有走廊与大殿相连。

从南便门向东有坐南朝北一栋沐浴室。房为民国十年（1921年）扩建，现西部为女浴室，向北开门；男浴室向东开门，上有砖刻榜额“涤虑处”，为回族知名人士马维清书。“涤虑”二字道出伊斯兰教沐浴不仅净身，且兼清除杂念，涤净心灵。

第二层院落正西为礼拜殿，是寺的中心。大殿原有抱厦（现

① 伊斯兰教历，也称为希吉拉历。希吉拉为阿拉伯文，意为“迁徙”。因以622年穆罕默德率信徒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为伊斯兰教历元年，故称希吉拉历。是纯以月的圆缺为一月，全年354日，设有闰日。

② 穆斯林死后，在土葬殡礼之前要先由专职人员或亲属给沐浴，称“洗埋体”。现已改为在回民殡葬所或家中进行。

已装阁扇），大殿有五楹、三进、七层，共42间，总面积600平方米，可容千人礼拜。殿内20根明柱组成21道拱门，拱门仿阿拉伯式上尖弧形落地，拱门门券有堆粉贴金的《古兰经》第48、55、67、78和79共五章全部经文和赞主（安拉）赞圣（穆罕默德）阿拉伯文词句。其中的阿拉伯古代艺术书体“库法体”，更为罕见，受到国内外伊斯兰教学者的重视。天花板饰以半米见方的方板，每块彩绘花卉、博古图案并有精书阿拉伯文赞词和安拉尊名。明柱也是朱漆堆粉贴金的花卉图案。殿内西北为七层梯阶的楠木宣讲台（阿文称为“敏拜尔”），为聚礼（每星期五）、会礼（开斋、古尔邦两节日）宣讲教义使用。本地板上铺设白毡条和凉席（冬天为绿色毛毯）。大殿最里面是一座六角形攒尖顶的亭式建筑，全部为木结构，穹窿藻井，俗称窑殿，为伊玛目领拜的地方。藻井和正西方墙上的“米哈拉布”（窑壁）木雕，有书写精致的阿拉伯文浮雕，窑内侧梁上有六幅彩色“博古”画。曾经有人认为画与木结构的藻井为宋、辽时代作品。值得提出的是，虽年代久远，包括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而这个窑殿丝毫未动。两侧镂空木雕窗棂为阿拉伯文艺术体构成的庄严匀称的图案，文字内容译为“赐予人类幸福的真主”（有一扇原为“赐予人类恩典的真主”，在“文革”中被毁，后按仅存的一扇仿制，两扇文字相同）。

大殿抱厦外原有明代烧制的琉璃匾一方，浮雕黄地黑字阿拉伯文“太思迷”①，配以浮雕的蓝绿花边，这样大的琉璃匾很是

① 太思迷为阿拉伯文译音，或译为“太思迷叶”，意为“称谓”。这一段阿文译意为“奉普慈今世，特（独）慈后世真主安拉的尊名”，是感恩祈祷时的惯用语。在《古兰经》中也是首句。

罕见。汉文匾额为"天方古教"，抱柱对联为"主张是、纲维是，须求无始根源，鼓荡焉、煦妪焉，尽属有形功用"。大殿正门"率由旧章"匾额为康熙十七子所书；"清真古教"匾额为清庆亲王奕劻子1902年所书。抱柱对联为"自唐以降三十皇朋清真清净，正教遵行五时朝拜裕国裕民"。上述匾额、对联除"清真古教"匾额现仍悬挂在大殿正门外，其余均毁于"文革"动乱之中。

殿内正面悬有阿拉伯文匾，一为"太思迷"，另一匾文译意为"真主实不湮没行善者的代价"；西墙上挂有四块木制阿拉伯文圆牌，译意分别为"真主实喜爱敬慎者"，"真主实喜爱忏悔者"，"真主实喜爱穆民"，"真主实喜爱托靠主者"，白地黑字，书法亦苍劲有力。还有一些阿拉伯文小匾额，分列大殿两侧横梁上。

从建筑结构上看，大殿是逐步扩建的。窑殿与第一排房间是一次。大殿中央部分是一次，最东边的和抱厦又是一次。殿顶也是起三道脊，衔接部分有围墙半弧影壁，各自分水，是特殊的建筑规格。最近一次整修，已全部铺以"锡背"，保证永无漏雨之虞。

大殿正东有邦克楼（"邦克"为波斯语，意为"召唤"，阿文则称"艾赞"），又称宣礼楼，用以在楼上高声念祈祷词（接近引吭高歌，声闻很远），召唤穆斯林来礼拜。楼为歇山重檐亭式阁楼，原有横匾"真寂灵虚"①，抱柱对联是"化人化物长化化，生天生地更生生"，均已在"文革"中被毁。

邦克楼前的月台上有日晷，南北各有碑亭一座，遥遥相对。

① "寂"是"寂"的古代异体字，读音与寂同。"真寂"意为真正独一无二的，至灵（全能、全知）至虚是不能以形象、方位比拟等来表达的，这是《古兰经》中对真主的阐述。

两亭的四面横楣上有阿拉伯文艺术体“清真言”①。亭内石碑高2.1米，加上额及碑座高4米，宽95厘米，厚30厘米。南碑上额“敕赐礼拜寺记”，两面分别刻以汉文和波斯文；北碑上额书“万古流芳”，旁刻“敕赐礼拜寺重修碑记”汉文。两碑一为明代弘治九年(1496年)建立，一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建立。因风蚀严重，有的则系人为破坏，碑文支离剥落，缺损难辨。

月台高于地面约一米。月台南北各有五间大瓦房，为南北讲堂。北讲堂原有匾“善庆堂”，南曰“阐一堂”。北讲堂为伊玛目住室和会客、讲经之处，南讲堂为海里凡（学员）学习及寺内办公处所。在南讲堂走廊东墙也有一块“敕赐礼拜寺记”石碑，明朝万历癸卯年(1613年)建立。碑文除记述伊斯兰教缘起，清真寺源流外，还记述了明朝自宣德以来，经正统、成化、万历等期间修复殿宇，奉“圣旨”赐名曰“礼拜寺”，以奉主酬德，报国祈福之意。碑阴镌刻的时间，署名人物头衔都清晰，但寺内三位掌教等人姓名均被凿毁。据传系因世袭掌教内部矛盾造成。

在邦克楼北侧，有一座“教领王友三、浩然两君保全回众存殁述德”碑，是光绪二十九年(1893年)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琪撰文并书。记述王友三、王浩然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保护牛街一带民众和京张路事。据传此碑石原为“古制联班”碑改镌。到光绪年间牛街礼拜寺改为独班，联班碑即废。邦克楼东有明五暗二七间大瓦房。俗称“七间房”，系明正统七年(1442年)增建，五间为集会、讲经之所，暗间贮藏经书、物品。清光绪末年东墙又接出五间成为两进大厅（最东的五间，后改为牛街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教室，现为宣武区民族小学教室）。大厅南北墙

① 清真言是阿语译意。因为这一段阿文经典（意译为“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伊斯兰教（我国亦称“清真教”）基本信仰，所以也称“清真言”。

上原有圆形经文图案，惜已毁于“文革”之中。现七间房已辟为接待室，并陈列寺存文物与经书。其余还有一些平房用为办公宿舍等。

在寺内东南角小院有两座筛海坟。坟为青砖矮冢，据阿拉伯文墓碑记载，两位筛海已在两株古柏下长眠700多年。

碑文现有两种译法。一为牛街回族学者赵斌先生（字振武）所译，译文曾刊载《月华》第八卷第五期。现抄录如下：

西碑阿文九行字，文曰：

宇宙是最高主权者。是为曾在尘世努力于善道者之墓，为遵行主命以希乐园者之乐园，为竭其毕生之力以从事于主道者之归宿处。宗教之光明，伽色尼人，名穆罕默德之子阿哈默德·布尔塔尼，彼实适于此慈祥之日而逝世，阿拉伯之五月五日聚礼二，为迁都之六百七十九年。愿仁慈之主准其善功而宥其过错。（据白寿彝教授换算，穆罕默德迁都之679年为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八月，公元1280年。）

东碑阿文六行字，文曰：

凡生物尝死。是为总集诸贵之伊玛目之墓，布哈拉人，法官尔马顿迪尼之子阿里，愿创造者施恩者之慈祥及于宗教之有力宣传者，其人即报善信者，实适弃此尘世于六百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聚礼一。（日期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十二月，公元1238年。晚于上碑死者三年另四个月。）

另一个译文系1986年经北京大学马金鹏教授用语体文意译

（赵振武先生译文为文言直译）。西碑大意是："一切权力归于最高无上的君王（马教授注，系指真主安拉）。这是那位在尘世中幸与善行相辅而行者，是那位遵从安拉命令为谋取天堂中品级而行善者的莹园。……是在宗教和国家之间从事其宗教事务者之墓。他是卑尔塔马尼族人，是额鲁人氏，名叫穆罕默德·本·艾哈默德。这位极其慷慨者的逝世，时在回历六百七十九年五月五日聚礼二夜晚。"马金鹏教授注明："额鲁"是麦地那圣城附近一个地名，聚礼二为星期一；删节号表示的是碑文这里的几个字难通未译，碑文最末一行也未译。

东碑的意译为："每人是不免一死的（马教授注这句引自《古兰经》）。这是各种场合中的明珠、高贵的伊玛目阿里之坟墓。他是布哈拉人氏，法官阿马顿丁的儿子阿里，以格瓦门丁闻名于世。此皆由于仁慈而创造的安拉的恩慈而才高贵。他一向宣传和躬行善事。安拉结束他在尘世中的享受，时在六百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聚礼一。"马金鹏教授注明："阿马顿丁"意为"宗教的柱石"，"格瓦门丁"意为"宗教的支柱"，聚礼一为星期日。（按阿马顿丁可按意译为宗教柱石，从行文看也可译为名字，如努尔可译为光辉也有人用以为名。）以上译文引自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姜纬堂同志著文。文中阿马顿丁的儿子之后原为逗点，引文移于阿里之后，阿拉伯人名习惯冠以父亲之名。

这两个石碑碑文为阿拉伯古文，比较难译。赵振武先生阿、汉语皆通，曾是成达师范教师；马金鹏教授留学埃及多年，在大学教授阿拉伯文，他们都是精通阿文的回族学者，译文除对艾哈默德是哪里人有较大的差异外，其余大致相同。从过去对两碑碑文内容的叙述来看，除清乾隆时的《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俗称"白匾"，原匾已毁，现首都图书馆有抄本）说

筛海是阿勒卜人，近于阿拉伯译音外，其他恐都是根据赵振武先生译文。伽色尼是今阿富汗之加兹尼，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按当时情况筛海是有可能来华的，至今中国伊斯兰教的用语，有不少波斯文①，宗教活动的程式也与阿富汗近似。马金鹏教授在埃及多年，熟悉阿拉伯历史地理，译为额鲁（阿拉伯）人，也有根据。碑文如我国古文字没有标点句读，阿文字母上有音标符号，年代久远碑文风化拓片不精都会造成译文差异，只能有待于阿文专家之鉴别。布哈拉即今苏联中亚布哈拉，我国史书曾译为“安息”，或“不花剌”。

寺内保存的文物除上述已提及的外，还有以下几种：

圣旨牌：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为处理诬告回民谋反而颁发的一块圣旨牌，木制。内容现抄录如下（原文为竖写，无标点）：

## 圣　旨

康熙三十三年六月

圣谕

朕评汉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门修仙成佛，诱真归邪，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已往不咎，再违犯者斩。汉诸臣官分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并无食

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于回也。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

① 阿富汗官方用语之一是波斯文。

朕恩有爱道之意也。钦此钦遵。

传说这道圣旨的来历这样的：康熙皇帝接到南城巡城御史李某的密奏：牛街回教徒"夜聚明散，图谋造反"。遂与大学士军机大臣牛熙和王熙研究。牛住家在下斜街，王住菜市口绳匠胡同，牛、王都说家与牛街不远，没有听到此事。玄烨携二大臣微服私访，因正值斋月，见晚间确有很多人到灯火辉煌的礼拜寺礼拜（斋月晚间礼"太拉威哈"① 时间较长），但并无他举。遂下了上述圣旨，并赐半副銮驾以示恩恤，安抚回民。

据现已发现的《冈志》沈凤仪抄本，《灾异》一节中，记载了康熙三十三年牛街礼拜寺的宗教师赛义德马腾云（按赛义德意为伊斯兰教之圣裔，也是阿文名字）"通敌案"。该文叙述此事甚详。大致是：厄鲁特蒙古② 准葛尔部首领噶尔丹反清，派二人冒充"红帽回" ③ 潜入京师打探。因系同教，东城人马惠泉接待其中一人，礼拜寺赛义德马腾云也曾招待吃过饭。后其中一人被捕，供出赛义德。理藩院差人包围了礼拜寺，逮捕了宗教师马腾云和掌教尹良相。兵马司将牛街回民按户造册，派兵封锁牛街地区，不准居民出入。理藩院上奏或尽杀牛街回民，或遣出京城。康熙帝批驳了奏折，"上曰：……京城回民亦朕之赤子也……只严缉奸细，毋株连好人"。后奸细被杀，马腾云获释，马惠泉等有关人发配3000里，其余人等无干。各清真寺均开经"答谢"（诵《古兰经》以感真主恩赐）。此事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在时间和内

① "太拉威哈"为阿语音译。斋月晚上增加的礼拜称"太拉威哈"。

② 厄鲁特蒙古原在俄国叶尼塞河上游，后南迁到西蒙古，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③ "红帽回"指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少数民族，由于习惯戴红色平顶圆帽（如埃及、土耳其人所戴），清朝时称"红帽回"。现已少见。

容上均与礼拜寺的圣旨牌相符。由于惊扰了回民，降旨安抚也是可能的。

珍贵经卷和文本：

一部阿拉伯、波斯两种文字对照的《古兰经》（三十本）。是300多年前一位中国阿訇精心书成的，分别用黑红两色书写两种文字，字体遒劲，内容准确，装裱精湛。伊朗一位教授看后誉为“无价之宝”。

两部木刻再版印刷的《古兰经》（名“宝命真经”）。是回历1313年（公元1894年）云南祺阳马启元、蓉城马晋锜等14户25人，分卷承印合成的。这是根据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义领导人杜文秀总统兵马大元帅，于回历1279年（公元1862年）刻本«宝命真经»原版再刊的。原版是著名经堂教育家马联元(1841—1895年,云南玉溪人)在杜文秀支持下，由马的门生著名阿文书写家、教育家田家培用3年时间手书完成的。它是中国第一部木刻本的《古兰经》。原版现仍存于云南昆明南城清真寺中。承印的25人均有署名，有敬刊、敬镌、熏沐敬刊等字样。

还有一些手抄本、印刷本的各类阿、波文经籍，中国历代《古兰经»汉译本，外国友人赠送的英、法等文对照译本«古兰经»。

此外，寺内原存有明崇祯三年（1530年）的“札付”（一种公文）一件。1980年哈伦著《漫谈清真寺》一文载：“从北京牛街礼拜寺保存下来的一份晚明时期的札付史料看，当时争夺三掌教职位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证之该寺明弘治年碑被击毁事实①，益信掌教职位的争夺是从未间断过的。”这个“札付”是教民许林等呈给当时明朝中央政府礼部的，内容是保举王永寿、白继祖、白汝瑾三人为牛街礼拜寺的三掌教。阿拉伯语这三掌教为伊玛目

① 此述有误。牛街礼拜寺中有一明万历年碑，只是三掌教的姓名被凿毁。

（大掌教）、海推布（二掌教）、穆安金（三掌教）。在“札付”中按汉族佛教习惯，称大掌教为住持。由于大掌教伊玛目是总揽清真寺大权的，明朝时还须报礼部备案。从“札付”内容看，伊玛目在当时有冠带，也就是有朝廷官服。该“札付”早已遗失。

陶、瓷、铜、铁器皿：

有明宣德（1430年左右）铸造的小型铜香炉，明代蓝字鱼地瓷香插，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许碧、张国钦制造的黑字黄地坛状琉璃陶香炉。这些铜瓷陶制品均有阿拉伯文，陶香炉在经文之上有浮雕的“敕赐礼拜寺”字样，是为牛街礼拜寺专门烧制的。

月台上有两座大香炉，一为宝鼎式的铁铸香炉。高2.7米，铸有阿文赞词和“大清嘉庆三年秋月吉日建造”（公元1798年）。另一座为双耳铜香炉，高50厘米，直径54厘米，炉口铸有“道光丁未年有恒堂铸造重一百五十五斤”字样（道光丁未为公元1847年）。寺内还保存一口大铜锅，铜锅直径内口130厘米，外口152厘米，深70厘米。锅沿上铸有“大清康熙壬午年敕赐”和“大清乾隆己未年重修”字样。如此则原铸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重修为乾隆四年（1739年），康熙敕赐晚于圣旨牌8年，距今285年，以重修计也已有248年。此锅为礼拜寺作“圣纪”时熬肉粥使用。“文革”期间被牛街回民藏于邦克楼内，堆以杂物，未遭破坏。现已移到院中砌台作文物陈列。

关于牛街礼拜寺，曾有《牛街礼拜寺记略歌》口传心授流传至今，文字俚俗近于口语，有似“竹枝词”，歌曰：

清真古教有亘恒①，　达天俊路渡群生；
克己复礼先净体②，　五时朝拜念真经。

---

① 亘恒（也有记为“根恒”）指历史久远。
② 指沐浴要先于礼拜。

登楼看月目观西①，　南出北入是古规②；
脊兽青松缀自然，　四道天罗赛河渠③。
玉石栏杆右出头④，　珍珠卷帘水倒流⑤；
钟不求声棋无抚，　年迈老叟喜不忧⑥。
一出五门一道墙⑦，　一道清泉分两旁⑧；
一对石碑铭千古，　一双宝库厅内藏⑨。
月台之上三座亭⑩，　明三暗五到十层⑪；
殿左殿右十八柏⑫，　南北讲堂观对厅。
万岁牌顶圣旨悬⑬，　两边相配半驾銮⑭；
寺里寺外八眼井⑮，　八道红门不用闩⑯。

歌词内容是万历以后编传的，因为有一座碑是万历四十一年才有的。

## 始建年代与历次修葺

关于牛街礼拜寺始建年代，未能定论，前几章已多次涉及。

---

① 望月楼上观新月是向西望。
② 新月显现是西偏南的方向，所以说是南出。
③ 由于大殿是起三道脊，衔接处中间有墙，因此形成四道泻雨水的天沟。
④ 礼拜寺牌坊因与街并不平行，方位略有斜角，北近南远，因此石栏右出头略长。
⑤ 进寺是向东，但进殿要向西，如卷帘倒流。
⑥ 说明过去到礼拜寺礼拜的以老人居多，同时也有石雕无动物形象，喜之系尊教义之意，但这句主要是陪衬以押韵脚。
⑦ 正面有五个朱门，对面是大影壁。
⑧ 大殿前原有两眼水井，系出一源，现已枯竭填平。
⑨ 七间房两侧暗间为库房藏室。
⑩ 即两碑亭和邦克楼。
⑪ 大殿从抱厦起是三间，两旁各出一间为暗五，进深十间。
⑫ 寺内古柏参天，原有十八株。
⑬ 指康熙圣谕。
⑭ 半副銮驾亦为康熙时物，包括黄龙锦旗两面，金杆一对，"皇恩国庆"红牌一对等（早已散失）。
⑮ 过去寺内外有井共八眼，现均已枯竭填平。
⑯ 是指有八座大门，均在寺门。

现存两说：

1．宋、辽说：

牛街一直传说礼拜寺始建于北宋至道二年。近几年来提出至道二年北京地区政权属辽而不是宋，因此改为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十四年，故称始建于宋、辽。过去我国叙述纪年的习惯是按中央政权的年代，而不用地方政权年号。称宋、称辽二者总都是公元996年。

北宋至道二年说法的文字根据，是《古教西来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首都图书馆存。以下简称《总序略》）。《总序略》何时何人撰写尚未发现线索。只知重修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增补重修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总序略》载："宋太宗至道二年，有筛海革哇默定者，西域卜喇台人氏，入觐中国，……三子：长曰筛海赛德鲁定……次曰筛海那速鲁定……又次曰筛海撒阿都定……二君（指那速鲁定和撒阿都定）性近幽处，不干仕进，上赐官爵，坚辞弗受。是以授为清真寺掌教留居东土。二君具有先见之明，知燕京为兴隆之地，可以开万世帝王之鸿业，遂请颁敕建寺……那速鲁定君奉敕建寺于南郊……即吾牛街寺也。"《总序略》原文"至道二年"前冠以"真宗"实系"太宗"之误。今人持宋、辽说者无不本此。

2．元初说：

此说始自赵振武先生。振武先生发表于《月华》第八卷的《憩斋笔记》云："昔年以为牛街礼拜寺肇始于元，且恨无元碑以为证。近拓该寺东南跨院之两筛海坟墓碑而译之，始知寺盖建自有元之先。"但他又认为两筛海之死（1280—1283年）早于元忽必烈入燕都，"是寺之建自宋代或更以前，已无疑义矣。"这个说法就没有根据了。这是由于赵先生述及忽必烈入燕都（北京）

的时间有误，蒙古军破金中都是在1215年，到忽必烈入北京的1260年（不是1280年）中间还有40多年。

今持此说的见于1983年刘盛林发表于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17辑的《牛街礼拜寺始建年代考》，该文主要是按地望分析而立论，认为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元初至元年间（1264年左右）。这从时间、地理、环境上看都是比较符合的。

此外尚有认为牛街礼拜寺是建于明朝的说法。根据主要是认为筛海坟不一定原在寺内，寺内存留下来的没有元碑只有明碑。但即使筛海坟原来不在寺内，也是无法否定确有其人的。他在生前一定要与清真寺发生联系，而牛街礼拜寺是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能与他发生联系的清真寺，从时间上看，只有牛街礼拜寺。所以这个观点也是解释不通的。

据记载，明朝宣德二年（1427年）翻修扩建了礼拜寺，正统七年（1442年）增建七间房，成化十年（1474年）都指挥詹升题请名号，奉敕赐名礼拜寺。同时赐名的还有东四牌楼的清真寺，锦什坊街的普寿寺，安定门二条的法明寺（现已改建为东城大二条小学）。弘治九年（1496年）扩建了大殿(现中间部分)，接两侧围廊，新建了两座碑亭。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镌刻“敕赐礼拜寺记”碑（在南讲堂走廊东端）。清朝康熙十五年（1676年）进行了较大修缮，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再次修葺，并把大殿接出了三间抱厦。民国十年（1921年）修缮时翻修了南北讲堂，增设大殿前南北穿廊，扩建了沐浴室。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于1955年拨款对礼拜寺进行了全面修缮；1979至1980年全部彻底整修并重新油饰彩绘。凡贴金者使用真金箔达五十多两，殿宇装饰金碧辉煌，光彩夺目。

目前每逢“主麻”（星期五）聚礼时，在牛街礼拜寺的穆斯

林达六七百人。开斋节、古尔邦节会礼，国内外穆斯林作礼拜的有3000人左右。每年接待外地来京的穆斯林和参观者数千人，国际友人约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达千人以上。许多外宾留下了赞美的语言和热情洋溢的题词。巴基斯坦的一位贵宾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并且保留了这样完美的文化的礼拜寺……我谨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全体穆斯林，特别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中国穆斯林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平等政策……。"苏丹一位贵宾说："牛街礼拜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世界穆斯林都知道这座古寺。"

## 二、教子胡同清真寺

教子胡同在牛街东，与牛街平行。教子胡同清真寺虽比牛街礼拜寺晚建400多年，建筑、采饰均不及该寺，但过去人们把它与该寺相提并论，称牛街礼拜寺为西寺，称教子胡同清真寺为东寺。

教子胡同清真寺的建立，有着特殊原因。《冈志》沈凤仪抄本记载："明崇祯年间，因寺（指牛街礼拜寺）改独班，有杨、李二姓誓不从独班，捐赀创建（东寺），仍聚连班之众。后西寺复改连班，此寺遂废。康熙八九年间独班渐盛，张、阎等姓复营建之，为独班新寺。（康熙）五十年，改封翁奏请得敕赐永寿寺。"从这段记载得知，东寺的建立是由于教民发生矛盾造成的产物。始建于明，后废之。康熙年间复建成，后得敕赐永寿寺之名。

由于上述原因，东寺的规模力求超过西寺；大殿是49间（当时西寺只有30多间，现在也只有42间），抱厦10间（西寺为6间），窑殿4间（西寺为1间），顶部为瓮形以折射回音加大阿訇诵经音量。南北讲堂各五大间，前院还有五间（略小）。大殿建于与月

台同一水平的殿座之上，房屋高大宽敞。此寺坐西朝东。

东寺也有三间牌坊（“三间八柱”。中间两柱有前后斜柱支撑），重檐下有清人张度所书“理贯天人”隶书扫青匾额，原有实心木栅，早于20年代拆除。正门及两掖门均起门楼如宫廷门式样，下为石砌圆形旋门，蓝色琉璃瓦脊，朱漆大门有乳头门钉，而且台阶高一米以上，状甚巍峨，两旁八字墙上有砖雕，都与西寺不同。左右掖门内有汉白玉座影壁，壁前北有剑石，南有石盆。前院北房原为经文小学，匾文白底蓝字“蒙以养正”；南房为沐浴室，匾为“日新其德”，均语出《易经》。南北房内侧都有二层小楼，为办公及宿舍。院有正对大门为垂花门。左右各有一亭，左（北）为收取“则克梯”①、“费吐尔”乜帖②时使用。小匾书为“义举”，抱柱对联为“但把泉刀襄美举，果然金石著芳名”。右（南）亭内有酱黄色虎皮花岗石一块，黑色石一块，均长2米左右，高厚50厘米见方，用以停放“埋体”。亭额匾书为“梦醒”，抱柱联为“当初谁解生如寄，到此方知死是归”。里院垂花门内有太湖石，青砖甬路直达月台。月台高过一米，较西寺大得多。大殿除最外面的柱门是深红色油漆以外，大殿内所有柱、梁、柁、檩均为素木，不加油饰。大柱一人难以合抱，柱和大柁都是黄柏木，大柱皆是一根独木，因无油漆裸露在目并无拼镶。宣讲用的“敏拜尔”是楠木制成。传说因财力支拙未能油饰，但反而更加肃穆。抱厦内有三块大匾，一为“清真古教”（现

① “则克梯”为阿语译音，宗教税之意。税率规定为除生活费用以外财产的1/40。

② 费吐尔乜帖，即开斋节的奉献施舍（奉献给清真寺或施舍给穷人）。定额为一人一天的生活费（经典上说合二斤四两小麦的价值），因此也称“开斋捐”。“费吐尔”为阿语“开斋”的译音。“乜帖”是阿语音意合译，音译“尼叶”，意为“决心”、“举意”、“心愿”，指穆斯林在举行礼拜、宰牲、施舍、朝觐、封斋等仪式前，从心里或口头表达的意愿。中国有些地区的穆斯林多转用以指因各种原因决意施舍或捐赠财物，称为“纳乜帖”、“散乜帖”等。

在牛街寺），一为“清真无二”，一为“天方正道”。抱柱对联：“念兹在，释兹在，名言兹在；朝于斯，夕于斯，聚族于斯。”三块大匾为御笔或亲王手书。已不记其详。其余匾额对联均为清末安铭（镜泉）老先生所撰，由家住牛街的翰林李钟豫（毓如）所书。南北讲堂的窗棂，1937年马松亭阿訇在此时改为玻璃窗。北讲堂后有三间平房为海里凡宿舍，另有厨房一间。南讲堂西有三大间平房，是大典日熬肉粥的厨房，民元后曾作清真两等学堂教室。后院很大，民国时期由中国回教俱进会、回民公会在此开过粥厂，救济贫苦群众（那三间房仍为厨房）。南讲堂有一度还作为回民集会、喜庆宴客之用。后院靠南墙的中段起一座高台，登台有形似城墙马道，以为望月和宣礼之用。

教子胡同清真寺过去只是在寺门上有“敕建永寿清真寺”字样，回族群众仍皆呼之东寺。

东寺在1958年空出，由民政部门领导，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改为福利工厂。主要安排伊斯兰教宗教职业人员及家属和回族群众就业。十年浩劫期间宣武区革委会将该厂改为生产无线电元件，又改为生产手表壳。后交市民政局民政工业公司领导，寺产由房管局管理。“文革”后期，手表壳厂为扩建厂房，向宣武区房管局办理了国家征用手续，将这座清朝建筑彻底拆除。后经宣武区人民政府出面与民政局交涉，在市人民政府支持下，大殿后院的一部分被退还给牛街回族群众，在小寺街开门，改为牛街回民殡葬服务所。

## 三、寿刘胡同清真女寺

在阿拉伯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专为妇女礼拜设立的清真女寺还没有听说过。妇女一般都是在自己家里礼拜，清真寺内也没

有女沐浴室。妇女如果到清真寺去礼拜，一般是在礼拜殿（堂）的后方一侧，用白布幔帐隔起来，空间相通，听得到伊玛目领拜时的诵经和念“太克必雷”①。也有的清真寺在殿的后方有楼（如电影院的楼上一样），妇女在楼上礼拜，楼下看不到。

北京最早的一座清真女寺，就在牛街地区的寿刘胡同。寿刘胡同可北通麻刀胡同，南达输入胡同，东至教子胡同，西到牛街。该寺就处于四个通道的交汇处。

该寺原址为一块空地大院。后在平地盖起了磨砖对缝平房，房屋之间均有走廊相通。正门坐北朝南，现门道已改为南房一间，东墙另开门。院内有南北房各四间，西房五大间为大殿。在北房后院还有四间北房，原为沐浴室；原有跨院已作民宅。

现在首都图书馆存有《清真女寺首创碑记》原稿一件，但名为碑记实际并未刻碑。

该件原由牛街乡老刘仲泉拟稿并保存。现抄录原文如下，从中可知建寺始末：

## 清真女寺首创碑记

北京之有女清真寺也，在牛街教子胡同中间寿刘胡同首创建立。缘牛街乡老闵公德仁号信权，鉴于牛街聚居的教胞，皆经营小商，住室狭小，男人有两寺沐浴礼拜，一般妇女沐浴感觉困难。闵老遂约请北京回民群众协商，大家均愿襄此善举。马志清乡老有在寿刘胡同空地一块、并一眼，自愿虔诚捐献寺方。在众乡老赞助之下，购料施工。后因经费不济，中途停顿。于民国十一

① 伊玛目高声念“真主至大”，礼拜者随着抬手入拜和鞠躬、跪叩。此称念“太克必雷”。

年复又召集各郡阿訇、乡老筹款，经各郡群众努力支持，完成此创建女寺之义举。“安拉要为人不得知也”。有此清真女寺，回民妇女教门日有进展。特将建寺始末记载，以为流传，或勒石留念。

勒石拟稿刘仲泉

据考需有补述者，该寺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再次集资，除北京各回民聚居地区，也就是上文中所说各郡（也有称各坊的）乡老捐赠外，闵信权本人捐资较多，另外当时任职西北的马福祥亦有捐款，马福祥并书写“清真女寺”四字刻石嵌于该寺东墙，至今犹存。按马福祥所书的寺名石刻题为民国十四年春。那么竣工使用应在该年（1925年）前后。女阿訇为黑奉一。

在寿刘胡同清真女寺之后，北京还陆续建造了四处女寺，据记载分别在阜外三里河、崇外雷家胡同、朝外观音寺街和德外西村。规模都小于寿刘胡同清真女寺，有的存在时间很短。其他省市回民聚居区也有少量清真女寺。

寿刘胡同清真女寺在1958年改为回民幼儿园，“文革”期间改属毛纺厂，后落实政策又回到牛街回民手中，仍为牛街回民幼儿园，主要收托回族儿童。

## 四、著名的阿訇

据现在乡老们记忆，牛街礼拜寺自清朝同治以来到目前，先后有以下知名阿訇主持教务：王崇明、洪宝兴、刘启、王浩然、高兴、达浦生、李八爷（此为俗称，原名不详）、王振益（友三）、李宗庆（云亭）、杨建铭、王瑞兰、王振海、王连钰、张谦、管华庭、金德海、杨德亮（明远）、安士伟、陈广元、闻省

三、石昆宾、王连仲。在牛街礼拜寺当过海里凡，后来成为有名的大阿訇的有马松亭、马德宝（善亭）、何其宽、蔡吉庆等几位。上述的洪宝兴、王振益、达浦生、李宗庆、杨德亮、王连钰、王连仲、石昆宾等阿訇也是在这里学习、卒业（挂幛授阿訇职位）的。

就回忆所及有以下几位阿訇先后在教子胡同清真寺主持教务：马松亭、马德宝、王静斋、安静轩、王瑞兰、马梅斋、张瀛仙（两任）、于少斋、杨德亮（曾三任）、杨觐元、萧德珍、赵锦堂、王连仲、管华庭等。赵锦堂和金德海、梁延玉等阿訇也曾是东寺的海里凡。

列于《冈志》的还有：安宁宇（常仙学阿訇门徒）、王永寿（王崇明之父），为牛街寺掌教（伊玛目）；白世祥、尹良相、吴国卿、马君锡、杨二师、张公越、杨伯琳、金履真、米敬公等人，当系康熙时代的阿訇。

至于过去牛街西寺，教子胡同东寺所传伊斯兰教教义，虽总的都属逊尼派中哈乃斐学派，但在守旧与新行，尊习俗与尊经典（如前述连班、独班之争，看新月定斋还是按历法计算定斋）或在某些宗教礼仪的细节上时有争论。乡老也各守一坊，两寺近在咫尺，分为西寺、东寺乡老，有分有合。解放以后，在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下，这类争论已无，出现了宗教内部的大团结。

# 教　育

元明两代是回族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曾有过不少饱学之士，但从清朝以后，文化就低落了。这有很多原因。清朝西北、西南不断爆发反抗清政府的回民起义，清政府采取了镇压政策。回族人民为了维系民族的生存，竭力强化宗教信仰，重宗教经典的灌输，摒弃汉族文化的学习；从事农商以示不争官位与政权。这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清朝后期生产凋敝，回民生计更加困难，城市回民以从事牛羊肉业及小商贩者居多，当时学校尚未兴起，多数回民无力求学，文化水平很低。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此外，为维护宗教信仰而不肯让子弟学习汉族文化，认为学了汉人的文化，外出官府任职，就会背弃宗教，丢了“根本”，回族内部曾有过“官到四品就反教”的说法。这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时日一长，代代相传，回族文化就落后了。

由于以上原因，长期以来北京的回民教育事业几等于零。回民聚居地区一般都有清真寺，儿童进入学龄，到清真寺入“小学儿”。这种“小学”是进行宗教教育的，回民称为“经堂教育”；从阿拉伯文字母学起，俗称学“艾里甫、别、帖”（阿文前三个字母，犹同说英语之A、B、C），学会拼音，讲些教义和学习一些“堵阿”（泛指礼拜等宗教活动需念的祈祷词、《古兰经》章节等）。清真寺内有设“中学”和“大学”的，也都是宗教教育。

多数少年学完“小学”，也就谋求职业，学徒或帮助父兄做小商贩生意。少数人有了职业以后，仍入“中学”学些经典。因此，“中学”多晚上授课，有业余的性质，而继续上“大学”的则很少，只有以宗教为职业的海里凡才上“大学”。这些经堂教育都是不教汉文的，念了“中学”和“大学”的在社会活动中仍是文盲。牛街过去有不少人根本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有小名儿（乳名）。待年龄增长，晚辈则在其乳名上加尊称。例如牛街一位卖水果姓王的老人，乳名“小旺儿”，人们称他“小旺儿伯”（牛街回民读伯为bāi），更年轻一点的就叫他“小旺儿巴巴”（即爷爷）。有不少阿訇也不识汉文，书写记事，创造了一种用阿拉伯字母羼杂着波斯文和汉语拼出的文字，称为“小二锦”。这是回民独有的文字，甚至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著释，也有采用这种“小二锦”的。现在牛街礼拜寺以及外地的清真寺，还有这种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它的拼法已无人使用，仍有待于研究。

牛街地区近百年来最早的官学只有勉善堂（又称勉善官学）。这个清朝学部设立的官塾，实是义学性质。先生为山西应举未中的陈巨川。勉善堂先设在牛街南口内西大胡同路北，宣统时迁到沙栏胡同路南圣安寺后院。有四五十名学生。从启蒙到“四书”开讲。牛街回民中的孙幼铭、刘仲泉和现仍健在的马敬儒等老先生都在这里上过学。名为义学也仍要交“束修”，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的。刘仲泉先生学习不错，因家境不好，每日替老师教启蒙的学生，受到免费待遇，但也没有学完“四书”就去学徒了。老师陈巨川是汉族，民国以后这个官塾改为半日学校，陈老也早已离去。

清朝末年伍迪文（名郁堂）老先生在教子胡同设了一个私塾。伍迪文是南京人，回族，汉文经史造诣很深，牛街回民尊称之为

“伍大巴”。据传伍因来京考试不中，即定居牛街，只有夫妻二人。伍笃信伊斯兰教，开馆授徒，但学者寥寥，为维持生活，伍迪文的妻子还卖煮芸豆度日，生活很清苦。另外还有两位专馆授课的回族老师，一位是在下斜街居住的古亮臣先生（牛街俗称斜街古家），一位是安铭先生。古老师在家设私塾家馆，学生很少；安铭老师则不仅开设私塾，还办起了学校。安铭字镜泉，父兄均为教子胡同清真寺的伊玛目。他汉文学识渊博，曾与唐柯三两人自己出资在教子胡同内簪儿胡同（即现法源寺后街）口租赁民房办起过一所小学，但因经费不足，不久停办，虽是昙花一现，但具有首创的意义。办私塾的还有回民黑绍龢先生，但已晚于牛街小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一时舆论哗然。有志之士痛感国势羸弱，纷起图强，广设学堂以开民智，但回民子弟能入学者仍属凤毛麟角。因为学校多是官办的，入学手续繁琐，费用过重。据尹伯清《王浩然阿訇传略》记载，王阿訇深感这样的学堂“事琐费繁，且学生多豪右子弟，贫民每裹足（不前），兼之风气所囿，回民儿童肄业者尤鲜。”王认为“要解决回民教育问题，只有回民自己去办学。”当时他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见解，认为回民要想得到发展，必须解决“贫与愚”的问题，也就是要办工厂改善经济状况，同时要办学校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而首要的要使广大回族劳动人民的子弟能够上学。这个思想得到很多回族有识之士的赞同，影响深远，后人不断为此而努力。

记述北京回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老前辈王宽。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北京牛街人。《中国穆斯林》杂志1982年第二期刊载黄庭辉《伊斯兰学者王宽》一文，称“在近

代中国回族文化运动中，有一位热心教育、主张改革、追求进步的教育家，这就是王宽。”王宽阿訇在1906年借去阿拉伯麦加朝觐之便，顺道访问了亚非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当时随行的有王阿訇的弟子马善亭。在土耳其受到国王的接见。土耳其国王哈米德谈到中国穆斯林也应通晓中国文字、文化，更促使王浩然坚定改善经堂教育与兴办学校的志向。在1907年回国后，即商得伊玛目王友三阿訇的支持。友三阿訇在牛街回民中威望很高，均尊称为“一巴巴”(排行第一)。于是王浩然阿訇在牛街礼拜寺内设立了回教师范学堂，除教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外，增授汉文文史课程，对相沿已久的经堂教育进行了改革。这个学校虽因师资和经费种种困难，办学时间不长就停办了，但十几年后，王浩然阿訇的两位弟子马松亭和达浦生分别在济南和上海办起了学校（成达师范学校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都是阿汉兼授、宗教与师范教育并重的。可以说办起这两个学校，是对浩然阿訇壮志的继续贯彻。

## 一、小　学

### 牛街小学

1908年，也就是王浩然阿訇在朝觐游历回国后的第二年就办起了牛街小学的前身——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

王浩然阿訇各方呼吁奔走，联合了在京的回族知名人士马邻翼和牛街的乡绅孙芝山、冯余轩、马少蘅、古亮臣、马瑞川诸人，在牛街礼拜寺的后院利用七间大厅，用木板隔为两部，东部为高、初两班教室，西部仍为寺内接待之用，并新建校舍南北房各五间和临街南瓦房七间，呈准京师督学局立案，于是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诞生了。

学校的计划、教学安排、教材选定等，主要是马邻翼老先生筹划的。邻翼先生是回族知名的学者、教育家，当时任清政府学部主事。经推举马邻翼为两等小学堂监督；孙芝山、冯余轩、马少蘅、古亮臣、安镜泉、马瑞川、马少轩、王永茂等人为董事，堂长（校长）由王浩然担任。教员多为饱学之士，如南京王仲坚、六合达禹书、通县米有山、宝庆马任之（慎三）、山东温老师都是在京回民受过较高教育者，并聘涿县张文为半日班教员。

两等小学堂是七年一贯制的小学：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初小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格致（自然科学知识）、体育、图画、手工、音乐等；高小还有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等。每周加授阿拉伯文五节课。为方便回民子弟参加聚礼（主麻），星期五下午放假半天，这成为各回民中、小学的惯例，一直沿袭到解放后的50年代。这样的新式学校得到了回族群众的信赖与支持，使回民家庭乐于送子弟入学。

清真第一两等小学的创立，启迪了回民的思想，打开了回民自己办学的道路。春风所被，北京几个回民聚居区先后创造条件，办起了清真小学堂的分校。计有西郊三里河村的“二小”，崇文门外花市大街的“三小”，毗邻牛街的教子胡同的“四小”，北郊马甸的“五小”。这些学校都设在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原有的房屋，稍加修葺，因陋就简。五所小学班次不等，总计每月经费需800多元。这些民办的学校经费来源，只能仰赖各处回族群众的捐赠。这种捐赠是伊斯兰教施舍性质的，多少不拘，不可能按时、按量收入，造成经费支出上很大的困难。当时曾有人提议，羊行主要由回民经营，包括买卖活羊与羊肉业，回民从业人多，是回民经济收入的大宗，如能“按只抽厘”（税外附加），则学校经费可以保证，羊行亦无大损。但这个倡议遭到了羊行从

业者的反对。正在洽商未决之时，清朝崇文门税务司（税关）乘机先发，遂增羊税。羊行不敢反对“崇关”。学校转而向“崇关”申请补助。结果最后“崇关”只批给每月40两纹银了事，学校困难仍无法解决。当时社会上正在流行彩票，为了筹集经费，学校呈准外城巡警厅，由学校发行有奖彩票。彩票每张铜元30枚，每期发售1000张，每月摇奖一次，提出总收入的10%作为一、二、三等奖，余款作为学校经费，收入尚可维持。但时间不长，官府禁发彩票，学校经费又陷于困难之中。有时为及时发出教职员工资，浩然老阿訇尝典出房产当质衣服得款以解燃眉之急，这种热心回民教育事业的精神，深为后人崇敬，一直传为佳话。学校建立后，回族群众曾联名制匾一块，题为“敬教劝学”，并志王浩然创办学堂之经过，由书法家王垿书写，悬于校内，以彰其德。

清末政局动荡，百业凋敝，学校筹款日益困难；学校监督马邻翼又由学部派出任甘肃学使离京，削弱了学校的支持力量。四个分校因无经费来源，已先后停办。在宣统三年清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候，由于经费困难，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正在此时，京师学务局扩充学校，派人与王浩然阿訇洽谈，拟接收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改为公立。王与各董事商议，都赞同以能继续培养人才为目标。经与学务局交涉，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今后学校校长均须由回民担任，教员不限民族；二、每周加授的阿拉伯文课不变；三、星期五下午放假半天，以便学生参加聚礼。学务局完全同意，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遂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9月15日正式改为官办，并按序列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三十一两等国民小学校，以后在1918年（一说为1922年）教育局令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二十小学校，1928年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二十小学校，七七事变后改名为牛街小学。

小学改为公立后的第一位校长是回民王桂照。王字月川，曾在大学读书，出身北京回族诗书世家，因世居什刹海北岸的南官坊口，牛街回民习惯称为“官坊口王”。王月川延聘的师资如杨璇圃、杨仲宣、王逸轩（以上为回民）、潘用直、王澍、孙汝楫、卢恩瀚、莫兰绪、谢家澍等都是有学识的好教员。学生除清真第一两等小学的四班学生外，又新增招了第五班，共170人左右。1912年9月1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当时正值民国初建，学校音乐教员谢家澍教全校学生唱起中华民国国歌，歌颂了废除封建王朝创建民国的变革。当时为该校学生的王梦扬先生近日谈起仍印象深刻，他回忆当时的国歌歌词是：“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是引用《尚书》的词句反复歌唱的。

1914年王月川校长因参加县长考试而去职，由卢恩瀚老师继任校长。卢校长不是回民，因学识宏富，熟悉当地情况，牛街礼拜寺的董事会并未持异议。卢校长就任后，增聘名师，扩充招生名额，并依时尚订校训为“勤俭诚敬”。在开学纪念日全校学生唱了由国文课张老师作词，谢家澍老师作曲的三十一小学校歌。歌词据回忆为：“国家设教企同仁，谁云畛域分？化被天方群子弟，满堂风雨深。三载韶光如转瞬，一周又发轫，猗欤休哉纪念日，黄花晚节近。他年陶冶成英俊，卅一小学声闻振。”这个歌歌颂了国家对回民的小学一视同仁。“天方”是过去称呼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通用名词，这里说的天方群子弟就是回民。卢校长任职经年，1916年另有他就，校长换了莫兰绪老师。

莫校长河北元氏县人，汉族，学识尚佳，但脾气急躁。该校校址本是牛街礼拜寺的寺产，礼拜寺厨房不敷应用，翻建时稍加扩大，伸入了学校角落的一块空地，并通知了学校。莫校长大

怒，声言侵占了学校后院，责令停工。由此造成对立，牛街礼拜寺告到了督学局，以原达成的三条协议之一“校长必须用回民”的理由要求撤换莫兰绪。督学局以原牛街小学教师、当时任三圣观小学校长的杨璇圃先生与莫校长对调。时在1921年。

杨璇圃校长到任后，增聘了牛街回民尹伯清、马仲澄等先生为教员，增建了西厅南北教室各三间，校园东部建房六间，以代替原教员宿舍和预备室所租用的民房。学校增到 8 个班，学生280人左右。杨校长于1927年暑假辞职离校。学务局派李寿鹏继任，李校长系汉族，有违校长须为回族的前约，任职半年，由牛街王瑞兰阿訇等出面交涉，并推荐当时在训政学院肄业的原校长王月川继任，得到学务局批准，1928年春王月川到校，此时该校已改称第二十小学。

王月川任职年余，1929年春因就任清丰县县长而离任。师范大学学员回民马志道被派任校长，为时不长，又离去，该校教师沙文清继任。沙文清为良乡回民，师范学校毕业，学以致用，精力充沛。该校从1912年改为公立以来，19年间换了七任校长，特别是近期不到两年换了三位校长，学校很难稳定。沙校长到校，厉行整顿，善于团结，使学校又出现了兴旺景象，而沙校长也得到师生和地方回族人士的拥护。

沙文清校长从1930年直到1949年暑假，在校近20年，这时期国难当头，教育事业备极艰辛。沦陷时期，学校统一以地点命名，第二十小学改名为牛街小学。日降后，物价飞涨，文教事业更难维持，沙校长多方周旋，勉为应付，使学校得以继续。1946到1948年间，学校曾改名为北平第十一区第十五保第一国民小学校，1949年解放后恢复了牛街小学的校名。

北京解放后，沙文清校长离职，市教育局派吴耀岭（回民）

任校长，后吴耀岭调教育局任视导员，校长先后由金佩贤、何玉生、刘桂珍（女）继任。“文革”后李君善、张树勋任校长。现有12个教学班，学生381人，其中回民占62%；教职工42人，其中回民19人。“文革”中宣武师范停办，宣师附小校址在牛街（原回民学院附小），改名为牛街二小，牛街小学改名为牛街一小。1987年牛街小学改名为牛街民族小学。

## 中才小学

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改为公立以后，学校未能大量增班，而风气已开，要求入学学生日益增多，该校远不能满足回民儿童入学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牛街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酝酿着另办小学。1928年牛街地区的回族知识青年，正在组成中国伊斯兰学友会，其中刘伯余、李廷弼、王梦扬、刘屹夫和杨涤新等人决定克服一切困难自己办学。

他们没有开办经费，刘伯余腾出麻刀胡同自己住宅的三间南房，作为一个复式班的教室；几个人还从自己家中搬来条桌、长条凳，凑到几十个学生可以围桌就读。教具都是自己做的。筹备就绪，校名问题商于过去的老师杨仲宣老先生。杨老以《孟子》“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即能守中道的人才能教养没掌握中道的人，有才的人才能培养没有才学的人）命名为“中才小学校”。公推刘伯余为校长，王梦扬、杨涤新二人辞去了原来的职务，在中才任教员，李廷弼、刘屹夫二人仍在大学学习，襄办一切，未在校任课。一经招生，几天就招来了男女生30余名，分四个年级复式教学。学费每人每日两个铜元（两大枚，四十文）。以此微薄的收入维持办公和补助教师伙食，教员是没有工资的。甚至第一个冬天，是教师从自己家里拿来煤炭生火取暖。

伯余校长等3人艰苦创业，坚守“不论如何困苦，三年内绝不离职他就”的诺言。他们为回族自身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教学认真成绩卓著，得到了牛街地区回族知名人士的好评。得到安镜泉、马西园两位老先生和玉器业商人马子清等人的支持，马西园老先生把珍藏多年日本制造的风琴借给学校，开展音乐教学。1929年暑假山东济南成达师范的创办人马松亭阿訇来京，到校与刘等晤谈，他积极支持并约请热心教育的人士成立董事会。邀请了安镜泉、马西园、马子清及牛街寺王瑞兰阿訇、教子胡同清真寺伊玛目安静轩、珠宝玉石业的常星垣、张润芝、赵璞华、刘仲泉、赵远帆及孙芝山等乡老及部分学生家长开筹备会。会上王梦扬老师报告办学动机、成立经过，刘伯余校长报告教学计划，马松亭阿訇呼吁大家给予学校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安镜泉老先生对5位青年办学和艰苦创业精神倍加表扬。当时公推王瑞兰、安静轩为正副董事长，上述诸位及创办人为董事，还决定请回族京剧演员义演以资募捐并借以宣传。

在各校董的努力下，学校筹集到一笔资金，置备了课桌椅，学生增加，又腾出东厢房两间作为一个教室。

1929年10月珠宝业商人赵璞华的爱女淑贤婚后将及一年即因病夭折，赵璞华先生将女儿的全部妆奁首饰捐赠中才小学以为资助。学校购置了书橱、桌椅，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及教学参考书与学生读物。1930年初建立起在当时小学算是颇具规模的一座图书馆。也是当时尚属落后的牛街出现的第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命名为“淑贤图书馆”，在图书馆门首悬有牌匾。

在马子清董事的动员下，回族京剧演员的义演于开明剧院（今珠市口影院）演出。参加演出的有马连良、雪艳琴、侯喜

瑞、马春樵、马连昆、蒋少奎等回族著名演员。得款购置了三个教室的课桌椅。刘校长又腾出西厢房两间，他自己只剩北房自住。学校并借教子胡同清真寺的阿文小学房子作一个教室，至此学校共有四个教室，分设六个年级。

1930年学校延聘了教师马凤岐、李文斌，特别是有了女教师杨淑蕙、达震坤，都是回民，还聘了梁德亮为图书管理员和事务员。

为筹集经费，刘伯余与杨滌新两先生曾去山东向当时任青岛特别市市长的马福祥等募捐，也得到一些收入。但没有固定收入和足够的基金，只靠零星募集和极低微的学费是无法维持的，董事们也是心余力绌。

1931年私立西北公学小学第一部（后改为西北中学第一附属小学，简称西北一小）已颇具规模，经济方面较“中才”也有些基础。经商议两校合并：中才小学保留原董事会；教职员全部转入西北一小，待遇提高与公立小学相等；全部教学设备无偿转给西北一小。西北公学任刘伯余为一小主任。西北公学还将王浩然阿訇时已停办的清真第一两等小学的几个分校陆续恢复起来，连同一小，分称一、二、三、四、五附属小学（顺序有变更）。

## 振育小学和短期小学

差不多就在西北一小与中才小学合并的同时，牛街迤西的糖房胡同，诞生了由驼行同业公会主办的“振育小学校”。驼行同业公会是资方的组织，在糖房胡同丁川店的西口（此处现已改建楼房，为牛街办事处的回民文化站）。振育小学就设在这里，校长由驼行同业公会会长冯治臣兼任，教员中有些就是西北公学的毕业生。这是驼行的子弟小学，免收学杂费，家境贫寒的

学生还由学校供给书籍和制服等。振育小学是从1922年驼行公会办的半日学校发展起来的。该校在1934年呈准备案，原拟到1936年暑假即可完成四二制小学，但随着生产的发展，运输条件改善，驼行营业日趋萧条，学校也就办不下去了，1936年改为丁家胡同短期小学。短小办了两班，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该校又改为简易小学。1945年成为糖房胡同小学，50年代并入回民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1936年北平市各回民聚居区里，出现了一批短期小学。这种短期小学的出现，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推行扫盲义务教育的结果。它实现了回民争取兴办民族教育的愿望，又为以后大量的以"穆"（穆斯林）字命名的小学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早在1933年北平出现了《世界日报》案（详见政治部分）之后，回族上层人士孙绳武、马松亭等先生曾向市政府建议，请求政府设法协助回民普及教育。这一建议得到了当时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赞同。经过多次磋商，决定在城郊各回民聚居区内设立短期小学40处。"短小"是启蒙扫盲性质的学校，每期只有6个月。

1936年5月4日，当时主管此项工作的北平市社会局第三科①作了具体部署。由西北中学及成达师范两校保送短小教师20名，送"义务教育训练班"受训，期满后先试办短小20处。这一决定的次日，两校就拟妥名单，由西北中学教务主任杨新民和成达师范教务主任艾宜裁两先生偕同受训学员至北平市社会义务教育委员会办理受训手续。并决定成立北平市回民义务教育协进会，推举孙绳武、马松亭、杨新民、艾宜裁、常子萱、刘仲泉、薛文波、王梦扬、赵振武、马澍元、李玺亭、王瑞兰、白晓楼等13人为委员。协进会的具体职责是协助推行义务教育，劝导学龄

① 当时北平市没有教育局。

儿童入学；对回民较多的地区，得向各处清真寺或其它适宜场所借用校舍。公推杨新民、艾宜栽、王梦扬为常务委员，办理日常工作。经决定第一批短期小学有22处，计有：牛街礼拜寺、丁家胡同、老君地、小寺街、教子胡同（以上牛街地区就有5处）、天桥清真寺、崇外手帕胡同、雷家胡同、东城禄米仓、齐化门（朝阳门）中街、安定门内二条、德胜门外关厢、马甸、黑寺、西直门外、阜成门外三里河、海甸、清河、安河桥、树村、东直门外二里庄、南郊红门等处。1936年5月14日师资受训期满，各按指定地点积极筹备，实际成立21处，暑假后开学。

在牛街地区短小当教师的侯崇忠（礼拜寺）、孙穆（丁家胡同）、甄玉祥（老君地）、达倩霞（女，小寺街）、李鸿清（教子胡同），对牛街回民儿童的启蒙教育作出了贡献。短小教师待遇微薄，条件困难，是有荜路蓝缕之功的。这些学校虽然为时很短，七七事变后都已停办，但不少“短小”发展成为全日制小学，如老君地短小，用的是牛街礼拜寺的寺产房屋院落，短小停办后变成老君地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一再扩充，盖了楼房，现已发展成为北京市第181中学。仍有不少回民子弟入学；丁家胡同短小成为糖房胡同小学，更多的则变成后来的“穆”字回民小学。

30年代到40年代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回民聚居区先后成立了不少回民自办的小学，可以说从办学意图到创办方法，课程设置，基本上是学习王浩然阿訇创办的倩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多数是在清真寺内，或寺属的房产内办起来的。崇文区花市的穆德小学始建于1909年，几经更名与迁移，1937年以后命名为“穆德”，这是第一个以“穆”字命名的学校。“穆”字即指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之名，也有“穆斯林”、“穆民”之意。从日本投降到解放以前这个时期内，以“穆”字命名的学

校除“穆德”外，有天桥清真寺南院福长街的“穆成”，通县城内的“穆光”，张家湾的“穆民”，西红门的“穆达”，牛肉湾（后迁绒线胡同）的“穆林”，清河的“穆明”，豆芽菜胡同的“穆慈”，东直门南小街的“穆新”，牛街礼拜寺的“穆化”，锦什坊街的“穆华”，德外的“穆强”，筢帚胡同的“穆荣”，王府井大街的“穆安”，蓝靛厂的“穆英”，禄米仓的“穆辉”，安内大二条的“穆耀”，铁辘轳把的“穆兴”，朝外南中街的“穆慎”，共19所。此外还有西直门的伊斯兰小学，阜外育生小学，赵登禹路的伊斯兰小学，昌平西贯市伊斯兰小学，崇文下唐刀胡同大华小学，米市胡同清真寺内的育文小学，和前外豆腐巷正德小学等也都是回民办的私立小学，先后26所，不少是从“短小”发展起来的。这些小学的学生主要是回族儿童，也有汉族学生。解放后各校陆续改为市立或并入市立小学。

此外在30年代后期，当时的北平市教育局还在劳动人民较多、生活贫困的地方设立民众学校。一般只有两个班，上午为儿童启蒙班，下午则吸收一些年龄较大的失学少年与妇女。牛街地区有第三民众学校，开始设在寿刘胡同，后迁至穆家胡同，在较长的时间里均由冯启文和马崇义主持。民众学校不收学杂费，还发放书籍文具，在当时这样的学校实在是太少了。

## 二、中　学

王浩然老前辈倡导办学，成为全国回民教育事业的先驱。春风遐迩，各地回族有识之士无不以创办学校振兴民族为念。据1936年的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回民中小学约有五六百所之多。其中中学、师范就相继出现十余所，据资料不完全统计有：

| 校　　名 | 创办年代 | 所 在 地 | 创 办 人 |
|---|---|---|---|
| 蒙回中学 | 1920 | 宁夏 | 马 福 祥 |
| 成达师范学校 | 1925 | 济南 | 马松亭 唐柯三 |
| 崇实中学 | 1925 | 山西晋城 | 马 君 图 |
| 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 | 1928 | 上海 | 哈 德 成 |
| 伊斯兰师范学校 | 1928 | 四川万县 | 李 仁 山 |
| 西北中学 | 1928 | 北平 | 孙 绳 武 |
| 明德中学 | 1929 | 云南 | |
| 偕庆中学 | 1931 | 湖南宝庆 | 马 邻 翼 |
| 穆兴中学 | 1931 | 杭州 | 孙 吉 士 |
| 第一中阿学校 | 1934 | 宁夏 | 马 鸿 逵 |
| 新月女子中学 | 1935 | 北平 | 杨新民 陈永祥 等 |

这些中学都设在回民聚居区，其组织、课程都与普通中学一样遵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只是对回民子弟入学有所照顾，而且增加了一些伊斯兰教教义课程，每周二至四节不等。师范学校则宗教内容更多一些，因为培养的是所谓“经汉双通”的师资，既懂得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可以当伊斯兰教的教长（阿訇），也可以兼做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汉文教师。

## 西 北 中 学

### 从清真中学到西北公学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了全国，牛街和在北京的回族人士的孙

绳武、马邻翼、孙幼铭、常星垣、王月川、闵信权、侯松泉等人共议，广大回民子女上小学经济能力已很勉强，能升入中学的极少，为解决“贫愚”，必须创造条件自办中学，使青年得以深造。学校定名为北平清真中学，拟了简章。考虑请拨牛街中间路西原清朝“南营守备署衙门”旧址为校址。早在1925年，孙绳武之父孙芝山老先生等就曾联名向主管该产的陆军部申请，准备用此址办一女校，未获批准。1928年孙绳武正在北平市政府任参事，这时以办学拨址事就商于北平市市长何其巩，得到支持。何其巩批准，将牛街30号（旧门牌）市政府管辖的这个旧址，场地房屋均拨给清真中学。这里地共四亩，原有房18间，房屋已剥损倾颓，院内荒草没胫。稍事修葺，招收了第一班学生50名，于1928年9月勉强开学上课。当时孙绳武因公南下，由孙幼铭代理校长，1929年孙绳武回京，1月补行了开学典礼。

清真中学的发起人是孙绳武、马天英和当时任牛街小学校长的王月川等人。此时回族人士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及白崇禧等国民党政府军政上层人物均在北平。该校以白崇禧为董事长，马福祥、马邻翼为副董事长，闵信权、侯松泉、孙幼铭、常星垣、王月川、孙绳武为常务董事。并推举杨仲仙、闵信权、赵璞华为保管基金委员，刘仲泉、王厚斋、王葆青3人为经济捐款委员，这6人或是有财产有经济实力，或是社会交往宽广、热心公益的商界人士，遇有开支困难可以号召捐款，挪借救急。

清真中学的诞生，对牛街地区来说是第一个回民自办的中等学校，也是全国较早的回民中学。1926年河南人定希程先生曾在北京鼓楼南辛寺胡同（白米斜街）办过一个清真中学，只有两班学生，开办两年就停办了。该校虽有创始之功，但未能继续下来。

清真中学阶段，从1928年到1931年共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

段时间里，从无到有，学校发展迅速。经费来源首靠回族群众的捐赠。创办之初的捐款，如马福祥及北京回民中较富有者，多是一次认捐，也有个别的按月捐赠，如董事马骏任职山西省政府，每月捐助100元，捐赠了一段时间，官职变迁也就停止了。在何其巩任北平市长期间，学校曾申请在本市牛羊税项下每月拨款补助学校，得到批准。北平特别市政府1929年1月公文批准“按照补助私立中学办法，每月补助洋五百元，拨由教育局转发。”而且说：“该校以后如更扩充，再当酌核办理……”但只领了五个月共2500元，市长更调，补助也就停止了。中断了5年之后，到1934年8月袁良任市长时，经过呈报吁请继续成案，才改批由社会局每月补助200元。真正赖以维持经费的是靠“一文捐”。这在过去私立学校筹款中是独一无二的。由本市回民各行业从业者，包括小商贩在内，自己认捐，起点是每日一大枚（一个铜元），这对小商贩来说，也是可以担负的。认捐的户数确实不少。有些人是按月认捐，数目虽然不大，但比每日一文为多。对每日捐一两个铜元的，需要有专人每日去取，这些人是半义务性质的，十分辛苦。负责这项工作的有马敏卿、杨益三、白巴3人。取来铜元隔几日换成银元给教职工发放薪俸，往往一个月的薪俸，要分几次才能发足。经费不足时，为照顾为回民教育事业工作的汉族教师，尽先发给薪金，回族教师的薪金就更加零碎和不定期了。

经费尽管如此困难，学校并未停止发展，1929年募集捐款购进毗邻房产20间，创办了清真中学附属第一小学，招生80名，有了一、二两个年级。教室不够，暂借校长糖房胡同26号私房。在牛街礼拜寺设立了民众补习班，专收成年失学者上学。到1929年8月，清真中学教务主任张竹溪、训育主任陈克宽相继辞职，由

蔡诗可、童执中分别继任。但蔡只有一个月就离职。此时师范大学毕业的杨新民正在京郊中法大学办的西山中学任教，经当时牛街小学校长马志道推荐，学校求贤若渴，立即前往聘请，新民先生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原职，投身回民教育事业，担任了清真中学的教务主任。新民先生苦心筹划，为学校延聘不少优秀教师来教课。据1934年《北平西北公学校史述要》陈述，杨对“学校行政，厉加整顿，课程训练，皆尚严格，学生精神为之不变，学校设备，亦具规模，课外活动之提倡，宿舍自习之监导，亦与日俱进，是以未及半载，成绩渐有可观。”使毫无基础的学校走上正确轨道。其后新民先生兼代训育，集教育、教学工作领导于一身，至1930年2月张道生任训育主任。杨、张2人是师大同学，互相配合，使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日臻完善。

从1929年起至1932年，马鸿逵捐款6000元，学校买进南邻房舍，并呈请批准把守备胡同的西端划入校园。1931年，将原守备官廨北邻的民房全部拆除，新建通风采光符合教室要求的南北房18间，辟为6个教室，东西各两间为办公及教员预备室，连同西侧一四合院，由附小使用；在此迤西拆除旧房，新建中学两层教学楼一座。在拆除原有民房的地基上，刨平垫土，建成运动场。学校于1929年2月聘刘仲泉为事务主任，总理庶务。刘为珠宝玉石业商人，开有商号，在学校兼职直至1942年，十几年克尽义务，大量时间用于学校，始终在校不拿薪资。该校在没有固定经费来源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不断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广大回族群众精神、物质的匡襄赞助；也与学校领导人员，奔走呼吁多方筹募、惨淡经营的苦心分不开；当时在校的回汉教职员以菲薄待遇，竭尽才智提高学生质量，都有一个共同为回民教育事业献身的牺牲精神，这是永远值得纪念与尊敬的。

1929年学校承赵璞华先生以其父赵文涛老先生的名义，捐赠当时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万有文库》一部；次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又捐赠书券300元，学校购进了参考图书，连同几年来各界捐赠的图书，初步建起了图书馆。同年公布了优秀生免费与给奖学金办法，学生认真读书，刻苦自励，风靡校园。

1931年国民党政府对教会学校进行整顿，收回办学权，主要是针对外国教会的。清真中学不是伊斯兰教组织所办，虽未遭禁止，但以“清真”的宗教名字命名学校要申请补助显然是难以批准的。同时以宗教的名字命名，尽管师生中都有汉民，但容易使人误认学校排外，存有戒心。鉴于以上两点，“清真中学”的名字有改换的必要（当时也还不可能以民族来命名），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提倡开发西北，巩固边陲，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又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聚居的地方，以回族来说，大量人口在西北，因而提出学校以“西北”命名的意向。中学既成还希望办成大学，增设专科，爰“中国公学”、“南洋公学”的先例，学校更名为“西北公学”，中学称为西北公学中学部，增设师范班，附小成为小学第一部。办学的理由是为“造就边地人才”。并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给予定期补助每月1200元。此事于1931年3月经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令财政部自1月起每月照拨1200元。此时校董事长已换成马福祥（后由其子马鸿逵接替），并托邵力子、叶楚伧等先生从中关照，才得以一个中学的补助问题列入“国务会议”讨论。其后大部分董事则已非原创办人，基本上是当时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了陕、甘、宁、青四省的省主席，有邵力子、何其巩、叶楚伧、顾祝同、陈立夫、褚民谊、朱绍良、白崇禧、马邻翼、郑洪年、马麟、马鸿宾、马骏、张学铭、唐柯三、侯松泉、马吉弟、王曾善、孙绳武等，只有王

瑞兰一人是阿訇。当然这些官员与学校并没有多大关系，除侯松泉等三两个回民外都没有来过学校；无非是孙绳武校长的旧雨新交，或通过关系游说使其挂名，借以当个牌子提高学校及自身地位，和为将来往西北各省输送毕业生打开出路。

从当时的校歌可以看出学校的意图。歌词是语文教师任化远撰写，音乐教师荣在林谱曲。歌词是："我西北大地茫茫万里无疆，山河势壮禹甸号雍凉，虎视龙兴历周秦汉唐，统御诸夏声威震远荒，中世递降士民风教渐被天方，贤豪出没英雄腾骧，念先民之伟绩，悠然神往，唯我学校，作育多士跻跻跄跄，式展新猷载启其光，踵武前轨，永奠我家邦。"

## 从西北公学到西北中学

1931年西北公学的牌子挂出去了，政府也给了每月1200元的补助。这笔钱由孙绳武在南京政府财政部领取，然后分批汇给学校。这时期学校发展迅速，学生质量提高。到1934年第一班高中和第四班初中学生毕业，恰逢北平市举办中等学校毕业生会考。为了参与会考，在北京赶办立案手续，但公学无法与其他中学并列，遂名西北中学，参加了会考。初中只有3人成绩较差留级，高中名列全市第八名。会考期间时值盛暑，全体临场学生一律穿着制服，严肃的校风和优秀的成绩，使仅有6年历史的少数民族学校赢得社会赞扬，外地来校入学者更多。

清真中学附属第一小学原是由杨新民先生兼主任的，1931年改称西北公学小学第一部，与中才小学合并后由原中才校长刘伯余先生任主任。一年以后刘离职他就，由王梦扬任主任。小学逐步增为双轨，开始称甲、乙班，因甲、乙有优、次的涵义，自1936年的五年级起往下按忠孝、仁勇、信义、和诚、勤俭、廉洁

作为五个年级的名称，每班一个字以示区别。以后新生又排出贤德、正明、清静、智永、慧颖五个年级。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成了单轨，班的“字”也就取消了。1931年暑假，将1909年继牛街两等小学堂之后，在崇文门手帕胡同清真寺办起的清真小学接管过来，成为西北公学小学第二部（简称西北二小）。由安华堂先生为主任，穆乐天先生为指导（穆后调到中学工作）。同年7月崔仁斋① 在三里河清真寺办的清真小学改名西北公学小学第三部（西北三小），由崔为主任，马步云为指导。

1933年西北公学董事会以增添回文专科和补助贫寒子弟广招西北边疆学生完全公费为由，申请把补助费增到2400元。这项申请经由邵力子、褚民谊等斡旋，加上蒙藏委员会的支持，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核定、行政院上报，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当年7月起支。由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在11月18日函达。这里所说的回文专科，实际并没有办，所谓回文专科原是指阿拉伯文专科，该校只是在1933年由艾卜敦拉② 在高中部分学生中教授过土耳其文。就在这个时候，回族群众看到西北中学蒸蒸日上，产生了进一步培养高级人才的愿望，而且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呼声兴起，培养回族人士去贯彻政府政令正顺应了形势。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都有了，于是在学校门口挂起了“西北大学筹备处”的大牌子，还聘请了蔡元培等名流为筹备委员。但是实际筹备工作并没有做，只是制造了一些空气。

1934年薛文波先生在德外马甸溪村办起了小学，称西北公学小学第四部（西北四小）。南郊西红门办起了小学第五部（西北

---

① 崔仁斋为三里河清真寺伊玛目（掌教）。

② 艾卜敦拉：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徒。据说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联流落到中国的。已是老年，在北京孤身一人。住西北中学教土耳其文，后病逝。

五小）。拟议中还有东郊的小学第六部，但没有办成。后来在大兴县的薛家营（现大兴庞各庄乡薛营大队）由西北中学校友杨耀宽办了小学第六部。这些学校办学条件更是艰苦，因陋就简，多者办到了三、四个班。西北中学每月只能补助60至80元，仍须靠当地回民捐助。七七事变后，西北中学经费来源断绝，无法补助附小，除一小外，五个附小都停办了。

1931到1936年可以说是西北中学的鼎盛时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学生活动十分活跃。高中办了几个刊物，如励进学会办的《励进》，西北中学学生自治会办的《西北》校刊，教师薛文波主编的《回族青年》等。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直到七七事变，西北中学学生都参与了不少活动。如为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的军队募捐；在本校民先队员的组织动员下，不少高中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前夕，校内外师生及校友组织了抗日后援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西北中学在课程上与一般中学基本相同，只是仍沿袭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的作法，星期五下午放假半日。每周有两节精神指导课，内容为伊斯兰教教义，汉族学生可不参加，也不进行考试。当时庞士谦阿訇、赵振武先生、马自成阿訇、马善亭阿訇都曾任教。学校当时实际是民族气氛多于宗教气氛，爱国进步活动多于国民党的党团活动。马汝邻、陈永祥、闵毓华等进步师生，在回族青年中传播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西北中学高中三个班、初中三个班，西北一小十二个班，共有学生800多人。1936年时西北中学准备把中学办成双轨，又呈请批准增加补助费，由2400元改为4800元，已经得到批准，但是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

双轨制的中学和批准增加的补助费都成为泡影。

北平沦陷后，西北中学内住上了日军。校长孙绳武是国民党官员，接到了让他参加北京维持会的聘书，他避进东交民巷华安饭店。孙把刘仲泉找去，说他不能干伪维持会的事，也不能留在北平，必须赶紧离开。孙提出两件事：第一是用西北中学名义，由刘仲泉私人开设的协成号玉器铺担保，向敦泰永银号借钱，作为他去南京的路费，另外留点钱维持学校燃眉之急，以观政局变化；第二委托刘仲泉出面担任校长，维持学校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为原则。刘接受了这两件事。

学校进驻的日军撤走后，刘仲泉先生主持学校如期开了学。但经费已无来源，几经奔走，伪北京市政府承认了1934年市长袁良任内批准的每月200元的补助，继续拨给。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教职员不断向校长索取欠薪，校长只能苦口劝说大家共渡时艰，东摘西借不定期的发点“工资”维持最低生活。学校被迫停止了师范班，但课程从未间断。此时杨新民已离职他就，教务主任由任化远（泽普）老师担任，仍兼高中国文、文字学和国故概要课。任先生在课堂上不畏敌人耳目，大胆宣传爱国主义。尽管当时北京已沦入敌人魔掌，当徐州沦陷时，任老师在课堂上带领大家起立默哀，学生们肃然泪下。沦陷期间，任老师始终不讲伪教育总署编印的国文课本，面是给高中学生逐篇讲《古文释义》。七七事变后，学校训育主任薛文波离校去南京，又到武汉参加了以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王曾善为首的近东访问团。训育主任一度由体育教员王与民（回民）担任，后来由音乐教员荣在林担任，他们也只是一般地维持学校秩序与学生校内纪律面已。

附小只剩下西北一小。其余几个附小原来就是松散的关系，此时有的已停办，有的另谋出路，与西北中学脱了钩。西北一小

如期开了学，原附小主任王梦扬先生于1937年7月1日随顾颉刚先生的西北考查团去了西北，后来陆续有几个人担任主任。此时小学经费困窘，学生家长也交不起学费，只得由学生每天交一个铜元（一大枚）作为学杂费(名为“维持费”)，集中起来分给老师使用。冬季无钱买煤，由有条件的学生每人带块木柴、十来个煤球生火。

伪北京市政府成立后，1937年10月北京回教会也成立了，刘仲泉虽被列入理事名单，但并未到会，学校与该会也没有关系。不久，小学派来一个日本教官，名叫高桥吉生，住在学校。年末，西北中学经费困窘，已到无法维持的地步。此时，日伪正在筹备成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伪回教会通过唐易尘找到刘仲泉，让刘出任伪回教总联合会的委员，答应给学校以补助；学校不属回教会管辖，仍为市教育局领导下的民办私立学校，由校长负责一切。1938年初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成立，刘仲泉当上了委员，伪回教总联合会每月拨给西北中学伪联合准备银行钞票1000元。不久伪回教总联合会经日本特务机关授意，把西北中学改名西北学院，刘仲泉任院长。西北学院实为空名，仍是普通中学和一个附小。西北学院的牌子只挂了一段时间，又改为西北中学。

七七事变后，西北中学教师金鼎铭先生也去了后方。1938年在兼西北中学董事长的白崇禧和校长孙绳武、董事唐柯三及金鼎铭等人共同谋划下，决定在成都和兰州再办西北中学，以“内迁”之名继续领取国民政府每月4800元的补助。成都挂的牌子是北平西北公学附属成都西北中学，开始校长仍为孙绳武，由金鼎铭先生代理，以后才改由金任校长。学校是金鼎铭先生经手创办的，以北平的“正统”而存在。但实际上只有一个从北平西北中学来的美术教师邱演武。学校从开创到扩充，在抗战后方的艰苦

条件下，延聘师资，办得卓有成绩。日本投降后，校长金鼎铭离蓉返平，成都西北中学继续开办，与北京西北中学没有隶属关系。今天成都西北中学已成为成都重点学校，颇有声誉。该校至今仍承认建校始自北京西北中学的1928年。由于成都市回民不多，在校学生已多数是汉族同学。1938年在兰州也办起了一个西北中学，叫西北公学附属兰州西北中学。第一任校长是马述尧先生，第二任是孙绳武的侄子孙敏。该校现已改为兰州一般中学。

1938年暑假，北京西北中学毕业了高初中各一班学生。刘仲泉校长向伪回联会日本顾问高垣声明去上海做生意，遂把本届毕业生合影放在茶叶筒里，装满茶叶带去上海，在租界与孙绳武会面。孙同意刘领取伪回联会补助，要刘坚持不使学校落入外人之手；还提出他在后方手下无人，可动员几人去重庆找他。

孙绳武到重庆后，派金鼎铭回北京约几个西北中学校友去后方工作。金为了安全，住在天津租界与北京联系。经商议西北中学当时任一附小主任的杨长瑞和教员冯万才、马正清、杨希枚等4人可以成行。由金鼎铭转给4人路费，杨长瑞等离平赴沪转道去重庆。他们走后，日本人把刘仲泉找到“回联会”，问这几个人的去向，刘搪塞过去，事情不了了之，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受到迫害。但原拟继续成行的李玲善等人就没有走成。杨长瑞走后由李玲善担任了一个学期的附小主任。为了掩人耳目，便于走脱，李到暑假就辞去了主任，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然后与尹伯清老先生一起去了重庆。其后还有西北校友马成文和杨长瑞的爱人附小教员李慧芸，离京去了兰州。

这时西北中学的教师有：创办初期到校的任化远、杨新民（语文），梁传诗（生物），张朝璠、弓叔和（数学），张致恭（历史），荣在林（音乐），事变后新聘的毕平（语文），张惺

可（生物），刘锡宾（化学），白达南（地理），李苦禅（美术）等，大多是北京比较有名的教师。但是待遇菲薄，生活日蹙，加上敌伪统治之下，师生苦闷，教学质量已大不如前。学校为维持学生数目以收取学费，录取水平日下，汉民的比重也逐渐增高。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褚民谊出长伪行政院。1941年，刘仲泉去南京，找褚民谊呈报申请恢复七七事变前每月4800元的补助，因为1933年和1936年两次批准给西北中学补助都是褚民谊经手。褚同意。刘回到北京后，伪回联会任命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新民接任校长。刘同时还被免去了“回联会”的委员之职。西北中学过去欠债的利息停付了，债权人状告了铺保、刘仲泉私人开设的协成号玉器铺。刘只得卖掉了玉器铺，破产替西北中学还了债。这是1942年暑假的事。

1942年校长杨新民把七七事变后办起的实践女中迁到牛街30号西北中学，改称西北女中，西北中学男生则迁到广安门内大街100号与伪回联会合用一座楼房。

广安门大街100号这座楼房是清代末年的商品陈列所，主楼是一座口字形两层楼房，房屋高大互相连通，是与动物园畅观楼同时期、同样式的砖木结构建筑。楼前嵌有张謇先生书写的“商品陈列所”的刻石。楼前庭园宽阔，树水蓊郁，迎门水池上有白衣大士手持净水瓶，接通自来水，一股清流自瓶口流入池内，环境清雅肃穆。楼东是一片广场。北洋政府时期此处名国货陈列所，属实业部；北伐以后用为训政学院；“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来北平，用这里作为部分校址，东部辟为体育场，曾作为华北运动会的田径比赛场地，是当时北平大运动场之一。东大迁往陕西后，这里旷置，电影《夜半歌声》就是在这个楼里拍摄的。1935年因西北中学需要扩充，而且此地邻近牛街，北京回

族人士曾多方活动，请求拨给西北中学使用。孙绳武校长从南京已取得实业部部长吴鼎昌的批准，正在准备迁校，忽从东北同乡中传来消息，由东北同乡办的竞存中学得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某人的批准，准备迁入。此时西北中学紧急出动抢夺这个校址，发现竞存中学已经派人在看守房屋，西北师生奋然冲入，一场混战，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南京实业部发出急电，责令双方撤出，谁也没有得到校舍。七七事变后，这里成了伪回教总联合会，1942年日本节节败退，已无暇顾及发挥“回联会”的作用，“回联会”只能守摊子，空出了部分房屋，杨新民先生就抓住这个机会，把学校迁到了这里。于是西北中学从六班扩充到十个班。牛街30号旧址的小学又扩充到双轨共十二个班，女中部初中三个班。当时的经费来源要维持这么多班的学校仍是十分困难的。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回平“接收”，孙绳武先派他的侄子孙敏（第一班毕业的校友）接管了学校，免去了杨新民校长的职务。由于经费来源枯竭，学校又陷入停顿状态。孙敏向银行“折息”借款，学校勉强渡过了1945年。1946年孙绳武回平亲自主持学校。他也同样困难，债台高筑，只得把牛街30号原作为宿舍的南头平房卖掉还债。后来学校由金鼎铭先生任校长，四个月后，冯万才先生出面任校务主任。维持了四个月，仍由金鼎铭校长主持校务，这样苦撑局面维持了两年，直到北平解放。女校则在1947年因经费无着，已停办。

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校内虽有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组织成员，但校内没有反动党团的组织。1948年，学生中有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当时的学生邹炳文、董国刚等就是共产党员或“民青”成员，回族学生中的宛耀宾、陈德珍等民青成员解放后转为团员，很快入了党。民盟盟员、总务主任兼语文教员管

家骅和人民教育联盟的回族语文教员李文善在中共北平市委城工部、学委领导下，做过不少工作，解放后均入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当时西北中学的库存现金只有几元钱。开学后以学杂费收入仅维持了两个月。人民政府早已掌握学校情况，很快批准学校的申请，由市政府按月拨款补助，复经金鼎铭校长申请将私立西北中学交给人民政府。由回民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名称未变，仍由金鼎铭先生任校长。这比北京市接管一般私立中学要早得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这座由回族群众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历尽千辛万苦风雨飘摇的回民学校，才算走上了新生、发展的康庄大道。

## 女子中学

回族女青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贫苦家庭的女孩，自没有上学的可能；中等以上乃至富裕的家庭囿于宗教与锢蔽的风气，也不让女孩子到外边求学。牛街地区最早受教育的回族女青年有李桂芝、王蔚华（毕业于女师大），杨淑蕙（毕业于师大平校女子师范班），李慧芸、杨淑敏（毕业于北方中学师范科），安景贤（毕业于尚义师范），刘佩贞（毕业于北方中学），她们都担任多年小学教师。还有两三人受业于家庭，虽有文化，但婚后并未服务于社会。

西北中学成立后，只招男生，虽看到回族女子上学较男生尤为艰难，认为“添设女中，洵为今后不可或缓之图”，“冀以职业教育慰其殷望”，但孙绳武等人又以“监护之难周”为由顾虑重重。当时曾力主男女兼收或创办女中的主要是杨新民先生。1935年杨新民联合陈永祥（志澄）、赵振武、马松亭、王梦扬共

5位发起，在牛街地区办起了回民第一个女中，名为“新月女子中学校”。“新月”的名字是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的（伊斯兰教的旗帜就是绿地白色一弯新月）。酝酿过程中得到西北中学不少教职员的支持。校长孙绳武应允把西北一小分校租赁的小寺街2号民房让给“新月”做校址，把分校的一班课桌椅和办公用具、教具也借给女中。草创之后1935年9月2日新月女子中学开学了。有女生40名，回族女生占70%。该校除一般中学课程外，回族学生加授一节阿文，另有伊斯兰教常识课，回汉学生都是自由选修。

学校成立了董事会，聘请马福祥的夫人马汝邺女士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绳武、马邻翼、唐柯三、沙明远、王曾善、艾宜栽、赵璞华、梁友麟、刘仲泉、黑仲言、薛文波及5位创办人。校长由杨新民先生担任。黑仲言先生自告奋勇，义务担任总务工作。教师除一部分是回族青年会会员，或杨校长的同学友好外，基本上是西北中学的教师兼任。学校是没有工资待遇的。当时正值下令不准再增中学，经杨校长向他的老同学、社会局长雷嗣尚关说，以民族特殊的理由，批准了立案。

学校办起来了，但经费无着，租赁的校舍，承房东梁友麟董事减半收租，减少了开支。1936年马汝邺董事长来京，看了学校后捐赠2000元作为基金，议定只允许每月取息20元维持行政费用开支；董事马邻翼从回民教育基金会拨给新月女中河南华新纱厂股票50000元，数目虽然不少，但从未分过红利，那么能指望的仅是每学期一个学生收4元的杂费（不收学费）。

由于教师都是有经验的教师，又是自愿为回民教育事业服务、有教学热情，也保证了教学质量；学生很不容易才得到学习的机会，学习积极性高，学习成绩较好。但由于经费困难，又逢

七七事变，办学骨干相继离京，所以学校不到两年只办了两班就停办了。

新月女中虽只是昙花一现，但打开了回族女子升学的道路，对牛街锢蔽的风习冲击很大。它是回民教育事业上一个有意义的创举。

在新月女中停办两年后，1939年9月，伪回教总联合会主办了实践女子中学校，校址设在该会的北京区本部所在地、法源寺后街谢公祠内。这个学校把新月女中的学生招回一部分，编入了二三年级，以后续招一年级新生。学校仿照日本家政职业学校办学，有缝纫、刺绣、编织等课程。经费由伪回联会负担。

实践女中校长杨新民，教务主任阮裔芬（女），训育主任弓睿（女），事务员是“回联会”职员王连山兼任。但当时杨校长仍在师范大学教育系任讲师，实践女中实际办学的是阮裔芬先生。

该校在1944年改为西北女中，办了5年，毕业了4班学生，约130人。除少数升学外，大部分做了家庭妇女。解放以后，有的到小学、幼儿园任教，有的做了工商企业的职工，也有的做了基层工作干部。

## 三、回民学院

### 诞生

1949年北平解放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春天。

北平解放后，北京市在原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建立起民族工作机构，由马玉槐（回族）同志领导组

成回民工作队，到1949年6月就正式成立了直属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北京市回民工作委员会。当北平解放后各回民学校负责人纷纷要求人民政府给予帮助时，刘仁同志向马玉槐同志指示："这是回民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经费有困难，可以同教育局商量，改为公立，人员不动，一定要让回民去管学校。"①

说到回民学院的诞生，先介绍一下北京的另外两个回民学校——成达师范学校和燕山中学。这两个学校都是解放前回民自办的。解放后，成达师范和西北中学合并成立了回民学院，燕山中学停办以后回族学生也转到了回民学院。

成达师范由唐柯三和马松亭创办，以培养"经汉兼通"的伊斯兰教阿訇为目的。唐任校长，马主持校务，1925年成立于济南。1929年马松亭转任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阿訇，该校迁平，即设在清真寺内，专收回民，分师范班和研究班。迁平后增加了汉文和文化课。七七事变后于1938年成达师范迁桂林，改为国立，后又迁重庆青木关。改为国立后，学生主要仍是回民，但课程除略有一些伊斯兰教常识外，已与普通中师一样，取消了培养阿訇的任务。校长先是谢澄波，后是薛文波。1946年迁回北平，解放前夕校址在什刹海后海摄政王府旧址，仍有师范和简师，都是男生。成达师范原属国民政府教育部领导，解放后师生多次选派代表请求人民政府接管。回民工作委员会报经市教育局批准，于1949年4月6日由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柳湜签署，任命马玉槐为校长，杨新民为副校长，正式接管了成达师范。

燕山中学成立于1948年。当时的青海省长马步芳（字于香）出资，名为"子香教育基金"。经薛文波之手创办起该校。地点

① 引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缅怀刘仁同志》。

在德外黑寺的喇嘛庙里，只有几间殿堂充作教室。虽称是为回民办的，但回族学生很少，只有三班初中，勉强维持到1950年。

私立西北中学虽在1949年3月已接受政府补助，成为半公立性质，但政府尚未接管。1949年5月5日，北京市回民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回民文化教育座谈会”。北京市的回族学者、中小学校长、各清真寺教长及学生代表40多人参加。会上西北中学校长金鼎铭和该校校友会代表杨富魁再次呼吁请求政府接管，提出这所回族群众办起的学校应交还给人民，并希望与已接管的成达师范合并成立回民学院。这一请求得到与会人士一致拥护，并在回民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成立回民学院的呼声越来越高。回民工作委员会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当时任市委书记的刘仁同志认为这是符合民族政策的，党和政府应支持少数民族办好教育事业。经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即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前身）批准，将西北、成达两校合并，成立国立回民学院。由华北高教会任命马玉槐为院长，并从华北军区调来曾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过的李恕（回族）任副院长。学院任命杨新民为师范部主任，金鼎铭为中学部主任，以便于分别在两个原校址进行具体领导。在广安门大街100号组成统一领导的院部，任命了院长办公室秘书吴一平，教导主任李玲善、副主任金伏云，总务主任管家骅。原成师附小改为回民学院第一附小（在马甸），由原成达师范负责移交工作的马耀任主任，马后调到院部教导处，一附小主任由曾任中才小学校长的刘伯余担任，刘病逝后，由王德忠继任；原西北一小改为回民学院第二附小，由杨长瑞任主任。后杨离职他就，由“成师”毕业生王自强继任。在师范、中学迁到一起后，师范部、中学部的建制撤销，由两位部主任与两位教导主任组成教导委员会。到1950年初撤销教导委员会，工作仍由教导处负责。

回民学院从成立到1958年体制下放前，一直是由中央教育部领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指导，只是在教学业务上与北京市教育局发生关系。具体主管的是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和中央民委文教（三）司。在待遇上回民学院与中央民族学院是一样的。

## 繁　荣

批准成立回民学院后，为使师范、中学两部合在一起，即与中央卫生部商议，将“成师”使用的什刹海校址与卫生部所属原陆军医院广安门大街100号院内的部分用房对换，得到卫生部的同意。这时，开始对校舍进行紧张的修葺。把被称为危楼的口字楼全部修整加固，隔断成教室，清理垃圾山，整修院墙，平垫操场，这些工作都是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完成的。新校舍修好后，学校绿漆铁木花饰的大门旁挂上了回族群众盼望已久的“国立回民学院”校牌。牛街附近乃至其他区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有人伫立在学校大门外看着这块校牌，久久不去。

建校之初，学校就确定了“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民主建校”的原则。当时正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但回民学院的经费却受到优先照顾。为了贯彻建校原则，院部决定动员师范全体师生从什刹海徒手搬运课桌椅和教具到广安门大街新址。这一段路程并不近，但师生们精神愉快，情绪饱满，搬运的队伍排成长龙，有条不紊地穿过大街小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不仅节约开支用于增添教学设备，重要的是培养了师生的劳动观点和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精神，为改变旧思想树立新校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博得社会的称赞，受到中央教育部的表彰。

到9月，人事安排，各种制度的初订，教育教学的改造方案，都已完成。10月6日，全国第一个回民最高学府——回民学

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北高教会秘书长张宗麟、北京市政府代表佘涤青、市青委代表姚亦沙、全国政协少数民族代表刘格平、吴鸿宾、张冲、天宝、王国兴、金汉文、杨静仁、白寿彝、多杰才旦等暨全校师生共千余人出席了大会。许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50年3月私立燕山中学无法继续开办，经北京市教育局、民政局共同商定，该校28名回族学生编入回院中学部，汉族同学就近分入他校，不足一平板三轮车的教具、仪器，由回院接管。

回民学院从酝酿筹建到正式成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都不断报道。足见党对这所少数民族学校的关心和重视。为了改变历史造成的少数民族文化落后面貌，为了尽快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党和政府对回民学院处处给予照顾，使这所学校突飞猛进，是自回民自己办学以来几十年梦寐以求所没能达到的。接管“成达”、“西北”两校时，西北6班、成达9班，共计只有学生500余人，其中回民347人（占60%），也没有女生。回院自成立起只招收回民，并增加了女生班。在招收第一班女简师学生时，由于刚刚解放，很多群众还不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女孩子上中学仍存有顾虑，但一经动员，纷纷报名。不少小学优秀女生被录取。到1953年学校已扩充到30班，其中女生10班，学生共1389人，除按规定招收在本院工作的汉族教职工子女14人外，其他都是回民。学校经费从1951年到1953年增长了4倍。

建院初期有三年制的中级师范、四年制的简易师范和初高中。招生首先满足北京，特别是牛街地区回族青年的入学需要。1957年以前，师范、高中是面向全国招生的。在西北、河北、天津设有考区，由回院寄出考题，委托民族事务部门代考，答卷由

回院评阅录取。

解放后，对小学师资水平要求不断提高，简易师范已不符合要求，回院简师班从1951年暑假停止招生。1953年简师毕业生离校后，把简师三年级的学生分别转入师范或高中学习。

1952年师范改为双轨，而且向办专科发展，首先办起了阿拉伯文速成班（原拟议有速成班和专修班，后为保证质量均改为专修班）。招收全国各地在清真寺就学、具有高小毕业文化水平的青年学员（海里凡）和初中毕业生。这个班的目的是："培养既有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又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回族干部，以适应当前回民社会及回民工作的需要。"授课的科目为阿拉伯文（包括阿拉伯文文选、文法、翻译、书法），民族课为回民常识、民族问题，宗教课有"古兰经"、"古兰读法"、"圣训释译"等，文化课有政治常识（后包括《宪法》）、语文、史地、自然、体育、音乐等。学生完全享受公费待遇。除本院专任教师外，还聘请了阿訇马松亭、庞士谦和曾在埃及留学的金茂荃、马季高等教师授课。阿文速成班学员是由各大区民委保送的，第一期只有回族学生，第三期以后增招了新疆的维吾尔等族学员，为照顾其生活习惯，学校还建立了烤馕的专灶。这个班在1955年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根据上级指示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年8月正式成立，改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成为我国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原任课的宛耀宾、马维芝、马季高、金茂荃、张沛纶、冯有孚等教师和金鼎铭主任、杨富魁、吴彦秋等职员均调到该院工作，马玉槐、李恕两位院长也兼任了该院副院长。1958年该校校址建成后，迁出回民学院。新校址在教子胡同南口外。

1956年国家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在回民学院的基础上办起师范专科，筹办回民师范学院。中央教育

部立即召开座谈会，讨论筹办的一些原则问题。初步议定1957年暑假招生，先设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四个专科，招收200名学生。中央教育部于1956年9月具函责成北京市教育局协助筹备。回民学院抽调了管家骅、李文善、曹尔驹3位教师专职了解师大师专课程设置、教材、学时安排，教育部拨款数万元购置专科参考用书。1957年1月9日中央教育部部长办公会，讨论了民族教育司所写的《关于在回民学院筹办高等师范专科的报告》。消息传出各地纷纷来信询问招生时间、条件、手续等事宜。正在安排人选、编造预算、紧张筹备招生之际，由于纠正冒进倾向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做出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校的师资由当地自行培养解决，中央不再承担任务的决定。会后回民学院筹办师范专科的工作奉令停止。回民学院师范班在1958年随学校体制下放，分出去改为宣武师范学校。原在师范任课的教师大部分调到该校，负责师范教育的教导副主任马耀也调到该校担任了副校长，从1950年到1958年这9年间，师范毕业生除少量留在北京，安排在少数民族学校任教（包括在回民学院工作）和国家民委等民族工作单位工作外，绝大多数都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介绍到各大区民委分配具体工作。其中不少北京学生，都愉快地服从分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回民学院毕业生，以宁夏为最多。不少人扎根边疆，现已成为当地教育或其他方面的工作骨干。

由于曾作了筹办高等师范专科的准备，所以在1958年“大跃进”中，回民学院领导和教师提出了办业余大专科系的意见，立即得到宣武区委的赞同，由回民学院承办，区里组织师大附中、十四、十五、女五中等老校支援教师，成立了宣武业余大学。区委书记张旭任校长，回民学院副院长李玲善任教务长，刘东声任

办公室主任。在开学典礼上市委廖沫沙同志讲话，建议学校改名红旗大学（后称宣武红旗夜大学，现名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创办时工作人员都是回院的，校址也以回院为主，回院几位教师在该校兼课，到1960年区里安排了专职人员，脱离回院。这所业余大学虽不是民族性质的学校，但创办过程中回民学院为全区业余高等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

学校从创办到1958年实际上始终是中等学校，但在干部配备上都是高于一般中等学校的。院长马玉槐曾任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冀中回联会主任，解放后任北京市民政局长。在学院负责具体领导工作的李恕副院长原是华北军区师级干部。担任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的中层领导，都是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中学校长、主任。师资力量一直是比较强的。学校对教师生活上关心，思想也抓得紧，教育回族干部教师要主动团结汉族同志，遇有荣誉、升级，在相若的情况下尽先给予汉族同志。每个调进的汉族同志，都先由学校领导干部亲自谈话，鼓励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服务，并对在校不能设汉民食堂表示歉意。回民学院自成立以来，从没有出现过任何民族隔阂与纠纷。马、李两位院长在学校贯彻革命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校风，建立起一支团结战斗的教师职工集体。这是使学校教育教学水平迅速提高的关键。不少汉族干部教师从建校起就在回院工作，如陈鸿信、曹尔驹、李连升、李树群、杨冰如、刘曾岳、杨宝珍等同志，至今虽已退休，有的也早已调转到别的工作岗位，但一直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已故的管家驿、王庆善、任泽普、张朝璠等汉族干部教师，则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建校以后在课程上进行了改革，设置了回民常识和民族问题课。建国初期，这些课程固定排在课程表内，除由教师授课外，还

有不定期的讲座。1950年一年之间，除马玉槐、李恕两位院长亲自讲课外，还请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北京教育局局长史学家翁独健、民委领导干部王连芳等同志作专题报告，并针对学生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思想教育。这些报告使全校师生深受教育，澄清了许多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糊涂观念，使师生政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58年暑假，学校对全校回族教职员及学生集中进行了系统的民族政策教育。以后，这项工作坚持下来成为制度，每年都进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止。

学校一直注意培养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学生中建立起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和学生会。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劳动观点的教育都是通过班主任、团、队、学生会配合进行的。强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和社会实践活动。在抗美援朝的社会宣传、参军等活动中，回民学院在全区是很有影响的，参加军干校的学生有97名之多。以后历届毕业生都能服从分配，不少人奔赴边疆，为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回民学院在教学改革以及参加劳动方面都做出了出色成绩。尤其学院的体育和音乐成绩一直是好的。学校的体育代表队在50年代中期市区运动会上夺得多项冠军，在第一次全市中学运动会得总分第一名，足球与大学、体院一同名列北京甲级队。教研组长李连升是全市最早的一位体育一级教师。在石介如、彭其畹两位教师指导下，学校在器乐和声乐上都多次在市区比赛中获奖。为了适应学校的发展，学校对校舍进行了几次扩建，添置了各种教学设备。1951年修建了礼堂和24间女生宿舍、沐浴室等平房。1952年建成二层宿舍楼两栋、容500人的饭厅一座和物理、化学、生物试验室与仪器室，修改了符合回民习惯的大沐浴室、盥洗室。1953年建成三层24个教室

及附属用房的教学楼一栋。1954年建成三层女生宿舍楼一栋。修建了标准规格的运动场，包括四百米跑道、足球场、器械场地，几个篮、排球场和投掷区。添置了大量的体育器械。图书在接管时只有4000册（包括应处理的反动书刊），到1958年达到58403册，到1963年分校时已达62000多册。学校购有日本、德国、美国制造的理、化、生物等科仪器。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还制做与改装了仪器、教具。回民学院在1958年暑假后，由于学校调走了20多位教师支援宁夏，校领导马玉槐院长已在年初调宁夏任自治区副主席，李恕副院长调任北京市民政局长，不再主持学校经常工作，暑假中李树群同志也调到区教育局任局长，校级领导只剩李玲善、刘东声2人，学校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仍然继承着光荣的传统奋勇前进。

## 变　迁

1955年起中央教育部委托北京市教育局代管回民学院，但学校的发展计划、经费、领导干部任免仍由教育部决定。到1958年学校下放到区教育局，具体工作由区教育局主管。回民学院这时只剩了高初中，实际上是完全中学。一附小早已划归海淀区领导，改为马甸小学。二附小也在1958年随师范班划归宣武师范，成为宣师附小。

1959年10月6日召开了校庆十周年大会，到会领导和校友及在校师生共3000多人。还举行了成绩展览和文娱晚会，其中有校友寄来的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奖章奖状，和热情洋溢的贺信。在晚会上师生和校友演出了音乐舞蹈朗诵等节目。这次校庆活动目的是歌颂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和鼓舞师生在德智体全面发展上攀登高峰。效果显著，1960年学校高考升学率达到95%，以“成绩

进步幅度最大的学校”受到表扬。

1961年市教育局认为学校规模过大，不易领导，初中班过多，会影响高中质量，向学校提出分校的意见。经反复磋商研究，决定暂时以不分为宜。到1963年，矛盾更加突出，市教育局做出决定，全市凡40个教学班以上的学校，都要分为两校，以便于领导。这时回院已没有发展成为专科的任务与可能，改换校名以符合实际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加上1959年以后，在反右倾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情况下，迫使学校不得不考虑是否还保持“回民学院”名称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后，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是非常慎重的，由市委统战部、教育部出面，召集市教育局、民政局、宣武区委和区教育局开会商议。会议由统战部长廖沫沙主持，卞慎吾、孙国梁、谭元塑、李恕、刘东声、李玲善等出席。廖沫沙、李恕等领导同志认为，为保证完全中学的质量，分出部分初中班承担普及的任务，以解决初中学生的压力，看来分校势在必行。但回民学院在国内外均有影响，校名仍须保留回民特点，为符合实际，改名为“回民中学”，少数民族学校性质不变，作为初、高中每个年级各4个班的完全中学，今后保持24个班的规模不变，以回民为主可兼收汉族学生，汉族学生不要超过40%；分出来的初中班先叫“回民中学分校”，承担增班任务，两校各自独立，没有从属关系，过渡一年，再按号码顺序命名，由民政局做好向回民代表人士的解释工作。区委、区教育局在会后，向回院部署：回中分校的干部、教师，由回中提出建议人选，教学设备保证回中需要，富余的拨给分校，分校不足部分由教育局调拨补充。回民学院研究了分校方案，报区、市教育局批准同意。当时决定初中不分班级优差，按顺序号留一至四班，其余划归分校；任课教师随班调动，并适当调配个别教学骨干，担任分

校教研组长；回院党支部副书记白素琴（回族，女）任分校党支部书记，常琳（回族）任教导主任。教育局调来回族干部王守忠同志任分校校长。经过紧张准备，在1963年暑假后分开，回中另开校门。一年以后，分校改称第68中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回民中学受“文革”的破坏较其他中学为烈。原学校党支部书记刘东声还在大兴县四清工作团时，就被学校扣上了“‘三家村’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回校以后立即被隔离，与当时任校长的李玲善和教导副主任闪冲电（回族）同时被批斗。干部教师受审查被迫害的达一半以上，被关进“牛棚”的多时达到26人之多。李玲善校长被诬陷、围攻得精神失常，后来于1976年7月不幸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孙瑛、李文善、管家骅和教导副主任来文起等同志相继去世。学生何宝光也被所谓“红卫兵警卫连”活活打死。在所谓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中，刘东声同志成了打击的主要对象，李恕同志也被揪到学校批斗。回民中学这所在党和国家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学校，被批得体无完肤。学校先后改名为“抗大一中”、“首都中学”和“135中”。学校被批斗的干部、教师直到1970年初才全部获得“解放”。

1972年刘东声、闪冲电相继调离回民中学。1974年原教导副主任、1967年起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钱金波（回族）也调离了学校。

## 复　苏

十年浩劫过去后，党的民族政策使民族教育得到恢复。1978年宣武区教育主管部门把钱金波、苏宝生、马耀3位回族干部又调回135中学，分任书记、校长、副校长。在回院工作多年的汉族教

师陈鸿仪、曹尔驹等同志带头与不少校友联名，向国家民委及市区教育、民族工作部门陈述回民学院的贡献，呼吁恢复回民中学的名称，并要求请李恕同志仍兼任学校领导。到1979年6月，上级决定恢复回民中学的校名。当年暑假起又恢复高中在全市范围内全部招收回族学生的办法。10月6日举办了三十周年校庆，那天到校校友数百人，校友代表脱士明朗诵了热情洋溢歌颂民族政策和母校的诗篇。

1981年回民中学被列为第一批市属重点中学。1982年在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下，把长期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已退休的几位老教师请回学校指导教学。1983年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由宣武区委出面聘请老院长李恕同志为回民中学名誉校长。这一年经市教育局批准，回民中学增设民族师范班，向本市区、县定向招生，第一班已在1987年毕业。停办了25年的师范班，又得以重新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后备力量。

1985年1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关于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恢复回民学院问题”的会议，市委统战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文教办、高教局、教育局及宣武区委、区政府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国家民委教育司、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的负责同志也应邀出席。会议决定第68中学仍划归回民中学，恢复原回民学院规模，努力办好，校名以后再定。恢复回民学院的工作由宣武区委、区政府负责。市政府发了会议纪要，同年8月市民委和宣武区政府又召开会议作出贯彻落实的几项决定。1985年暑假后，68中并入回民中学，改称北京市回民学校，分为中学部（包括民族师范班）和职业教育部。目前发展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 医　药

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北京医院极少，一般平民的医疗主要靠的是私人开业的中医。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医传播渐广，已有一些公私立医院，但回民治病仍依靠私人开业中医，回民所设或为回民建立的医院几乎是空白。尽管历史上元明两朝回回医药曾颇为发达（至今北京图书馆尚有《回回药方》的残本留存，可为见证），但由于经济、文化的逐渐衰落，回医后继乏人，医术失传，学而有成的名医已属凤毛麟角。回民中从事中医事业的在清末民初的人数已经不多。据《冈志》记载，康熙年间牛街地区还很有几位回民“术擅岐黄”的，到了清末，现在能知道的只有一位供职于太医院的张子藩大夫和一位住在下斜街的古佐臣大夫，全北京也不到10人。牛街地区在张、古之后，就是张子藩的门生杨保文（蕴章），他的诊所还设有药店，也是牛街唯一的一家药店。在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回族大夫先后有：杨崑（璇圃）、陈申芝、古眉僧、胡瑞峰、李芝庭、马幻云、白金瑞、马致仪、马应荣、王怀奇、刘树琛等个人开业中医，中医外科有刘少峰，而西医只有麻文贞一人。当然就北京范围来说，也有一些出名的回族中医，如外科丁庆三和他的弟子哈锐川、赵炳南，内科的陈树仁等。

就牛街而论，医有专长的高手如杨蕴章以治伤寒最为拿手，马幻云以治慢性病见长等等。旧社会回民治病就靠这些回族中医

大夫，作为一般回族劳动者，当时是没有经济能力到医院治病的，而且住院饮食问题也不能解决。遇有急重疾病中医抢救不及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解放以前，牛街地区没有什么医院，日伪时期麻刀胡同东口路北曾有过一个私人小医院，医生数人，也没有病房，时间不长就关闭了。再有就是普慈施医院了。

## 普慈施医院

这所普慈施医院，是1947年7月20日由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分会办的。当时说是“为了回民看病难，和生活习惯上到其他医院不方便”而成立的。全名叫“中国回教协会普慈施医院”。

该院院址，就设在广安门内大街100号（旧门牌）当时“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市分会”内（即现在回民学校址），院内有口字形二层楼房一幢，当时该楼东面为西北中学使用，仅西侧楼下一角为“回协北平分会”用房。为了办医院，“回协”只用了一大间房办公，腾出西南角的圆形房和西楼下的一半（一大间）为医院用房。这所楼房原是搞商品陈列的展览馆，房间很大，医院用木板隔成几个小间，有的用半截布帘当门，很像旧社会饭馆的“雅座”，分别作为诊疗室、注射室、药房和挂号、会计等部门。

这所医院既称“普慈施医院”却又有“普慈施诊所”与之并列（诊所只是大房中隔出的一间小房）。这个结构令人费解，从赵炳南大夫在解放后给北京回民工作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答案。赵炳南大夫在信中说：“查普慈施诊所由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经回协理事长常子椿，约（邀）内科（大夫）陈申芝，外科赵炳南商议筹备回教医院……系半营业半慈善性质。后即

根据此项宗旨，向本市卫生局商洽成立医院。但据卫生局法令，（医院）必须西医方能报请开业。然陈申芝与炳南均系中医，不合功令，乃登报征求回教人士之业西医者，请参加工作。旋有在卫生局服务之教胞马腾云君应征。经多次奔走方告成立。而计划中之中、西（医）两部，又为法令所不许，只可成立中医施诊所……”赵老的信不仅说明了为什么院、所并存，而且也使人看到，旧社会“国民政府”对我们祖国的医学不仅不视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持歧视态度。

赵老信中提到的马腾云，据该医院医生殷柏岩、尤效贤回忆：马是回民，保定人，曾在当时卫生局任医政科科员，对北平医务界人士颇多熟识者，后来该院院长宋元恺（原万桑医院内科主任，留法医学博士）就是由马腾云介绍来院的。有了马腾云的奔走，宋元恺挂名和请当时卫生局医政科长李六吉大夫为顾问，开业的手续才算办成，中医部分就名为“普慈施诊所”。

普慈施医院的名称，带有伊斯兰教色彩。伊斯兰教说“真主安拉是普慈今世的”，换句话说就是对全人类普遍给予慈惠。“施”就是施医施药了。“半营业半慈善”，就有“施”的意思在内。但开诊之后，经费无着，西医部分分内（儿）科、外科和眼科，只有两个半大夫（半指眼科大夫只来半天）、三名护士和勤杂人员，他们的工资开支，主要依赖门诊收入；而自从开业起，因设备简陋，缺乏必要的检验手段，从患者来说，看小病没有必要，看大病又治不了，而收费并不比一般医院低，所以患者也就到其他医院去了，这里经常是‘门可罗雀”。至于中医部分，赵炳南等几位医师是很有名的，完全靠赵老支持。开办时一切用具及医疗器械，和开业后一个月内的用药统由赵炳南大夫捐助及借用。回族中医外科医生刘少峰、李东弼、张作舟、张达三

也借给药瓶多件。赵老等老中医过去就一直有对穷苦患者免费施医给药的传统。中医均系义务职，每月由回协给少量车马费。也有的医师仍将车马费捐助回协。在“回协北平分会”的旧文书档案中发现有这样的报告：“……1948年春，由国际救济总署领来药品，每隔三、五个月始能领一次。”据说报告中所谓“领药”是救济总署对各医院例行发放的救济品，而要接受较大数量物资的医疗单位，必须有住院部，只有门诊是不给的。所以这个医院在1948年也曾号称有20张病床，实际只是仓促地铺上几张病床，作为申请的条件。该院平时门诊都很少，更谈不上有人会来住院。所谓“住院部”只是徒具虚名。

稍后，这个医院更难维持，两名医生离职他去，只剩一人既看病也司药，全院不过二三个人。北平解放前夕的围城期间，院址被国民党军队进占成了兵营，医院仅有的一点设备，用了几辆三轮车就全部运光，存放在牛街礼拜寺内。

## 北京回民医院

1949年北平解放后，当时的北京市回民工作委员会接受了前“普慈施医院”留守人员的请求，本着扶助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精神，在市、区两级人民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先恢复了普慈施医院的门诊。后又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回民医院。很久以来回族群众盼望有个真正为回民服务的医院，而旧社会的“普慈施医院”实在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医疗单位。

1949年10月，北京市回民工作委员会经过紧张的筹备，在牛街中间111号原常子椿的私人住宅（现牛街街道办事处址）一所两进的四合房中，成立了“北京市回民医院”，并任命当时回民工作委

员会群众工作科科长金雅如同志（回族）为院长，延聘医师，增添设备，建立医疗辅助科室，培训青年补充化验、药房等人员，医院规模不断扩充。回民工作委员会机构撤销后，医院改由北京市民政局代管；金雅如同志调任北京市第八区政府区长，院长由民政局民族事务科科长马务本同志兼任，该科马彭年同志为秘书驻院工作。医院仍暂设内（儿）科、外科、眼科，有三名助产士到产妇家中接生，医院实有10人左右。并由民政局民族事业费项下拨款，对生活困难的回民，实行免费医疗。

解放后，回民生活状况有很大好转，对医疗保健要求迫切，门诊增加，医院已不适应客观需要。经北京市民政局出面报请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卫生部门，于1951年4月，经中央批准在少数民族卫生事业费项下，拨款建立一所有40张病床，日门诊量200人左右的回民医院。1952年8月在牛街南口外北樱桃园（即回民医院现址）购得空地16亩，开始破土施工。次年8月建成。建筑面积主楼二层樱房一幢，楼上设40张内外科病床，楼下为门诊科室和化验、药房、放射科等，共1800多平方米。附属食堂、洗衣房和办公房新建和翻建旧房共200多平方米。患者的营养灶和医院工作人员食堂均为回民伙食。当时调回民学院刘盛林同志负责基本建设，刘后来留在该院任总务主任。这座新建的综合医院，与当时市内一般市立医院相比是较小的，但它是回族有史以来第一座专为回民设立的医疗机构，在当时的牛街地区也是唯一的新建筑，牛街回民都称它为南口医院大楼。

回民医院的诞生是个创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它是真正符合广大回族群众的愿望的，给北京市回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抚今追昔，想起解放前进不了医院的痛苦挣扎在病榻的祖辈亲朋，回族群众怎不由衷感激新社会；许多外宾来院参观，

也无不认为这是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外宾，更认为是对穆斯林的照顾，留下了感同身受的热情赞语。

1953年新楼落成后，医疗科室增加为：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眼科。外科病房开展了一般手术，医院已初具规模。为有利于对这样一所综合医院的技术管理和医务人员的调配补充，医院由原来的市民政局代管，改为由北京市卫生局领导。1954年调来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原在华北行政委员会任卫生顾问的沈成章大夫(回族)为院长，调派刘续、李露两同志为副院长(后兼党支部正副书记）。应该说明，回民医院自成立以来，就是在汉族兄弟的帮助下，日益成长起来的。这所医院建成，医疗质量迅速提高，科室很快配套增齐，主要是靠各兄弟医院的大力帮助。外科从门诊小手术，到阑尾、疝气等腹腔手术，进而肠胃吻合，肝脾切除，直到胸科手术，每当开展大的手术，各兄弟医院的高级医师都来协助，手术后还来电话询问病情，提供指导。

但是，40张病床的规模，仍难于满足回民和附近人民群众的需要。在多次呼吁下，1955年医院曾准备扩建，增加到100张病床，盖房用砖都已准备好，旋以支援农村医疗事业的急需，把这项扩建项目移到南苑医院。1956到1957年医院压缩科室用房面积，把床位增加到80张，增设了儿科和妇产科病房，日门诊量也达到1500多人次，又增设了口腔科、耳鼻喉科，放射科兼搞理疗，化验室增设生化，同时为发扬祖国医学增设中医科，聘请老中医孔伯华的弟子杨文儒大夫（回族）和回族老中医李启贤大夫应诊，增设了中药房。行政管理也有所加强，除原有的办公室外，增加了医务部、总务部和护理部，此时全院已增至130余人，回民职工占1/3，但多为行政后勤人员，医务人员很少。

十年浩劫，使回民医院遭到了极大的灾难，而且情形比其他

一般医院更糟。“四人帮”一伙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存在，否定和肆意践踏建国以来成绩卓著的党的民族政策。在“四人帮”一伙的煽动下，导致各项民族事业的停滞与倒退。回民医院的牌子被砸碎了，改名为“向阳医院”，院内单一的回民伙食变成汉民灶，回族厨师竟被迫去炒猪肉菜；经俞炳嘉主任一手创办起来的儿科病房被撤销了，年逾花甲的老院长沈成章和一批为办好回民医院尽过力的大夫被打成“牛鬼蛇神”，监督劳动。医院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医院的性质，回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很大伤害。在十年动乱中，医院的大门虽然未关，但回族群众已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医院了。

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文革”的教训，重申了党的各项政策。回民医院也获得了新生。回民医院的名称和民族性质的医疗单位都恢复了，沈成章也恢复了院长职务，落实了政策。在市民委和区政府的帮助下，医院恢复了单一的回民灶。在上级部门的关怀下，新建了1000多平方米的一幢妇产科楼和800平方米的平房，病床已达120张，日门诊量上升到1800多人次，并增添了超声波等现代检测设备，调原中医研究院回族医师马连升为副院长(马系北大医学院毕业，又学习过中医，并为赵炳南老专家的门生，是中西医兼通的外科主任医师），提升内科副主任医师金励衡（满族）为副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使陷入绝境的民族医疗机构，又焕发了青春。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开展，不仅国内各地少数民族进京人数增加，外国穆斯林来华也日益频繁，回民医院在新形势下的扩建已成迫切问题。经市区民族事务和卫生部门多次协商，并得到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回民医院的扩建更新，于1986年底动工，拆除了30多年来陈旧的主楼，新建病房、门诊楼

12层大厦，共12000多平方米，设病床400张，除一般病房外，还有设备较高的单人病房，生活设施完全按照穆斯林生活的需要。1988年初已完成主体工程，预计1989年可以竣工。届时一个设备较好，规模可观的回民医院将出现在牛街回族聚居区。

# 民　俗

北京回民的风俗与生活习惯，和全国回民一样，有些习俗就其来源说，是和伊斯兰教的教义规定有关的。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其中部分内容已经脱离了原来宗教的意义，形成为民族的习俗。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事实上回民风俗也在不断地自我改革。回民由于与汉、满、蒙古等民族，特别是与人口众多的汉族兄弟长期和睦相处，在风俗习惯上与其他兄弟民族也有所融合，这是自发的相互学习的结果，而不是迫于某种行政命令。近百年来，社会风气日开，回民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回民旧有的风俗习惯，有的保持延续下来，也有的经过自身的改革扬弃，而以新的习俗代替。这当中也有改得不好的，如婚丧礼仪就增添了奢侈靡费的内容。

北京各个回族聚居区的习俗大同小异，本文所记仅以牛街习俗而言，可以作为了解回民风俗习惯的参考。

## 一、姓氏习俗

牛街回民过去就业范围小，生活与交往局限于牛街和北京其他几个回民聚居地区，因而形成了有如农村的社会交往，家家户户彼此了解，亲朋好友之间提起话来都是熟识的。因同姓人很多，

就以职业、官职、商业字号、原籍、居住地点等特征放在姓氏之前加以区别。牛街把这种冠在姓前的说明称为“小说”。这种习俗虽不是回民独有，但回民却一直延续使用。如说某户姓张，对方会问“什么张？”答“草张”，对方就知道是经营饲草的张家。如说“通州张”，就知是祖籍通县的张家。其实通州张已从通县迁来多年，草张家也早已不作饲草的生意。至于形成这种“小说”始自什么年代已不可考，从有些户的情况看，有的始自明初，如厨行梁家、门刘家，有的是明末清初如大地马家，有的恐怕已是清末了。

从姓氏前所加的“小说”，可以看出过去约在清末民初时期，牛街回民职业构成的大体情况。下面就列举一些以原籍、官职、职业等为说的人家：

1．以原籍或在牛街祖居街巷地名为说的。如：门刘（南京水西门迁来）、通州张、易州张、板桥古（板桥古家祖居在牛街北口外下斜街，又称斜街古）、大有庄白、良乡马等。以牛街街巷为说的如小寺街梁（即著名篆刻家梁燕愚家，原也是厨行梁家的一支）、沙栏孙、河沿张、青厂张、过街沟王、醋章胡同杨（原经营骡马行，也称醋章胡同马杨）。还有因门前有大树而称大树刘，因家宅有很大的空地称大地马的。大地马即中医师马应荣家。马家原籍南京，迁来北京即住在龙凤坑这个广有空地的宅院，距今180年前始迁到现在输入胡同的住宅。住在牛街南口的杨家，称南杨；牛街的黄家为了区别于原住朝阳门的皂角黄家而称西黄。

2．以任职为说的。如：贡见马，是祖上曾在江南任过知府，后在京任管理进贡觐见皇帝部门的官员。贡见马以后讹称弓箭马。哈密馆张，祖上供职于清理藩院所属哈密馆。侍卫马，以上辈曾作过宫廷侍卫武官得名，但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是非马。清末民

初的马善亭大阿訇，就是侍卫马的后裔，他品格端正，教义精深，很受牛街回民尊重。还有在宫廷金银库任库官的龚家称库龚。清朝在崇文门税务司包税的有几家是回民，是半官半商性质，如羊毛李、貂鼠刘、獭皮李等。

3．以职业为说的。如经营蔬菜、水果业的菜王、果刘，贩卖鸡鸭鱼的鸡李、鸭子马、鱼洪，养驼业的骆驼刘，开钱铺的钱马，皮革业的皮连，以搭席棚、脚手架为业的棚于。过去有经营桌凳出租的行业，称为租赁“家伙座”的，牛街有一户称“座儿李”。清朝官员帽子上有缨络，制做缨络的王家称缨子王。

以职业为说最多的要数经营饮食业的。如切糕张、厨子梁、爆肚石、烤肉刘、豆腐脑白等等。

4．以商号名称为说的。如：月盛馆杨、两益轩杨、同和轩马，这三家都是以饭庄的字号为说。大成杨、玉丰刘都是以所开牛羊肉店的字号为说。月盛斋马，经营月盛斋羊肉铺，过去也以该号设在户部街称户部街马。

5．以某一特征为说的。如：俊王，以其上代身材魁伟，相貌英俊而得名。杨善卿善写大字榜书，人称大字杨。德国张，因为曾在德国人纪雅阁家（住牛街北口）做事而得名。小桌王，据传说上代因相貌酷似“庄王”，乡里戏呼为“小庄王”，结果被官府传去欲以冒充王爷问罪，王老说自己善做小桌子，被人称为小桌王，而不是小庄王，这才获免追究。自此留下小桌王之称。

## 二、生活习俗

1．婴儿出生和起“经名”

过去回族人家生了小孩，第三天要全身沐浴，称为“洗三”（或“喜三”），这与老北京风俗是相同的。在这天回族则要请来主管的宗教师诵《古兰经》，感谢真主“赐予”后代并保佑母子平安。然后，在产妇住室的外边，隔着门帘念“喜邦克”①，并为婴儿起个阿拉伯文的名字，习惯称为“经名”，这与天主教、基督教所起的“教名”大致相同。北京的回民一般均另有汉文名字，平时上学用汉文名字，只有在宗教活动、结婚证书上才用阿拉伯文的经名。由于不常使用，有人纵使有这个名字也不记得。在西北有的回民不再起汉文名字，而是以汉姓加上经名，如马优素福、丁阿里、马穆萨等。经名多用阿拉伯圣人贤哲的名字，如上述的几个，还有如苏来曼、哈桑等，这些都是男名。女名如法图麦、艾依莎② 等。这些年来，“喜三”念邦克（也有称“吹邦克”的）和起经名的已不普遍。

2．割礼

过去的习俗男孩在10岁左右，要举行割礼（阿语称“海提奈”）。实际就是医学上的割包皮手术。由于穆罕默德嘱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要遵行割礼，所以属圣行之一。这个风俗规定起源于犹太人，天主教也曾遵行过。应该说这是个好习俗，医学上对阴茎包皮过长也要施行手术，以防止积垢致疾。伊斯兰教的割礼习俗在宗教上已没有什么特殊的涵义，只是卫生措施。据医学界发表的统计资料，由于伊斯兰教徒有实行割礼的习俗，在他们中阴茎癌的发病率几乎等于零。过去牛街回民“割礼”多由中医外科做（有的宗教师兼做），回民医院成立后，一直有“割礼”专

① 喜邦克：喜就是喜庆，“邦克”是波斯语译音。“邦克”一般是在礼拜前高声朗诵的赞颂真主与穆罕默德圣人的词句。

② “法图麦”为穆罕默德之女、阿里之妻的名字。阿里为伊斯兰教四大哈里发（接班人）之一。“艾依莎”是穆罕默德之妻的名字。

项门诊。

3．饮食

按照伊斯兰教教规，对饮食规定得很严也很详细。今仅就回民一般风俗习惯而言。关于饮料主要要求水必须是洁净的，污染者不得饮；严格禁用酒类和带麻醉性的饮料。对食品的要求就复杂得多了。

一般人都知道，伊斯兰教禁食猪肉，其实除猪以外，还有很多禁忌。大体来说，凡食肉类和杂食类动物都不吃，食草的动物可吃。但以昆虫、鱼虾为食的禽类可吃。而马、驴、骡虽为食草类动物，但因为是独蹄，也不能吃（伊斯兰教徒有食马肉者，回族不吃）。水产类不吃无鳞鱼和食腐肉的大鱼。昆虫一般不吃，但遇灾荒可食蝗虫。还有一点是非穆斯林人士往往不了解的，这就是对任何动物的血都禁食，包括牛羊驼鸡鸭鹅等常吃的畜禽的血，而且即使是能吃的畜禽类，也必须是按照伊斯兰教规宰杀①的才可以吃，未按教规宰杀和自死的动物也不能吃。长期以来牛街回民也有自己的习惯，如过去不吃螃蟹、带鱼、比目鱼、墨斗鱼、琵琶虾等，但并非严格禁忌，这些东西沿海（河）的回族都吃。现在牛街人也是常吃带鱼的。还有如黄鳝、海参、鱼肚等，也有人不吃，特别是信仰宗教虔诚的穆斯林，但并非回民都不吃。有些食品虽可以用牛羊肉做，如馄饨，但过去牛街回民也习惯不吃。

回族的民族习惯多喜吃油炸的食品，菜肴的口味也比较重。

① 宰杀者须是穆斯林，应凭颂真主安拉之名，先念“奉普慈特慈真主之尊名”（即“太思迷”），然后念“真主至大”（都是念阿拉伯文），然后下刀割断被宰物的血管与气管，放净血液。

饮茶尤其是饮酽茶的习惯比较普遍，这恐怕与过去多吃牛羊肉食有关。招待客人必先敬茶，虽经济条件较差，生活水平不高的人家，也要饮茶。牛街回民早晨见面互致问候，不问是否吃过早点，而问“您喝了吗？”指的就是喝茶，因为每日洗漱之后首先是喝茶。

在有关饮食的语言上，也有一些表示区别的说法，如“羊肉铺”，是回民的叫法，而不用汉民管它叫“羊肉床子”的名称。管汉民卖猪肉的商店不称肉铺而称肉杠。回民到牛羊肉铺买肉不能问是什么肉？只能说是牛的？羊的？肥肉只说肥的或说油，而不说膘。屠宰禽畜只说宰而不说杀。在清真饭馆有些菜名也与汉民菜馆有区别，如辣子肉丁，称辣子里脊（回避说肉丁），溜肉片叫滑溜里脊，这种叫法没有特殊涵义，只为表示区别。北京习惯说荤菜、素菜，而回民一般不用荤字，除对汉民饭有猪肉说“动大荤”外，对回民饭只说是有肉的或素的。过去习惯称猪为“黑牲口”，猪肉称“大肉”，回民相互间说到猪时，提猪字比较少。现在在语言方面已没有什么禁忌。

4．婚娶

在婚俗方面，只有一小部分是回族自己固有的。在旧社会婚姻很多是凭媒人介绍，所谓“媒妁之言”。牛街回族中没有专业的媒婆，但有做临时性工作的大妈，也称“跑门儿的”。“跑门儿的”对家家户户都很熟识，经常出入于各家，兼为男女青年的父母当择婚的“参谋”或引线人，但并不算真正的媒人。媒人或介绍人称“古娃席”（波斯语“介绍人”的译音），也有称为“保亲的”，一般是经跑门的大妈在男女双方奔走撮合后，由男方请出与女方有交谊的亲友，出面去向女方提亲。男女定亲前由男方拿出一点信物如镯子、戒指之类由保亲者送到女方家里，称

为“放小定”。下一步就是回民特有的“拿手”。“拿手”是个宗教仪式。由男方为主人，富有者自然是在饭庄设宴，俭朴者也可以在清真寺甚至在保亲人家里，备些茶点，或只有清茶一杯，也可以进行。双方请出对等数量的男亲友，右手握住对方的右手，拇指竖起对住对方的拇指，左手放在对方右手外侧，同时口诵赞美真主和穆圣的规定用语（阿拉伯文），表示婚姻已经定妥。负责司仪的茶房或亲友则称“索洛娃提”（阿语“定妥”之意），然后双方亲友一一介绍道贺，礼仪就算完成了。这时女方交给男方一个用红纸写的未来新娘的“经名”（也称“回回名儿”，用墨或金粉书写，更讲究一些的用香料加和好的面粉或其它能固定的东西堆出阿拉伯字母拼成的名字，上涂以　粉，放在一个小锦盒或玻璃盒里）。也有同时“放大定”的，男方把聘礼交给女方，相当于汉族的“纳采”，但回民没有“合婚八字”庚帖。聘礼（阿文称“卡宾”）一般是新娘用的饰物，放在锦匣或玻璃匣内（在旧社会这种匣子很多人家不是新做，面是互相借用，称为“大定匣子”）。也有附有几枚银币的。这是买卖婚姻的残余。但这些不是给女方家长的，结婚时新娘除部分饰物戴在身上外，其余照数带回男家。“放大定”也有单独举行的。这时，女方也就开始准备嫁衣、妆奁。

“下团书”是择定日期举行婚礼，基本上与汉民相同，在旧社会纸店有印好的“龙凤喜帖”，回民也使用，不过在辞句上增加了伊斯兰教的内容。女方接到团书后，用绿纸写上同意的日期退回男方就算议定了日期。婚礼之日，过去与汉族相同也用喜轿，在婚礼之前先要过嫁妆。牛街回民很少巨富，最多不过16抬。32抬都是少见的。与汉族不同的是第一抬一般都有“炉瓶三设”（或写做炉瓶三式。设字加儿音，读如“事儿”），一为香炉，

一为香瓶内插一双香筷一个香铲，一为香盒。这三件是一套，用于诵经时焚香。有的炉、瓶、盒制作十分考究，如黑色古铜或肝尖红色铜制，也有景泰蓝的，上面都有铸就凸出的阿拉伯文，以明朝宣德年间出品的较多，也有瓷制的。一般都有木制的几和座，有玻璃罩。在最后的末抬上有“汤瓶壶”，为沐浴使用，多为红铜打制的，称为“塔儿壶”，上尖下大呈梨形，2/3以上是螺旋渐小的壶盖，形似塔。

婚礼上新郎新娘要听阿訇的证词。过去回民婚礼的证婚人必定有阿訇或宗教师。婚礼开始新郎新娘并站，有傧相相陪，首先向正面端坐的阿訇说“赛俩目”①，然后由茶房（司仪）高喊“道赛俩目啦”。阿訇开始诵经（念“依扎布”），还要用大红纸书写一份证书（写“依扎布”），内容包括新郎新娘和双方父母（主婚人）的名字，证婚人的名字，结婚年月日，是主婚人同意，男女双方当事人自愿。但都是用阿拉伯文书写，名字也都是“经名”，实际留存这个证书，当事人一般是不认识的。阿訇诵读完阿拉伯文证词后，分别问新郎新娘是否愿意与对方结婚，新郎回答“改必洛图”，新娘回答说“达单”②，然后阿訇接着用阿拉伯文念：“这妇女是有信德的理智的，没有人强迫威胁的，二人结婚是有证明人的，我们大家都为你们作证，真主恩慈你们白头到老，因为你们是具备（符合）宗教规定的原则的，求真主把最大

---

① “赛俩目”为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和平”、“平安”、“安宁”。伊斯兰教徒相互祝安和问候用语。在礼拜时也向左右道此词。

② “改必洛图”是阿语，“达单”是波斯语，都是“接受”、“同意”的意思。至于为什么一个用阿语，一个用波斯语？据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有些大阿訇原是波斯人，因而遗留下来很多波斯语汇，与阿拉伯语并用。同时使用两种词汇的情况，在其他宗教活动中也存在。

的幸福恩赐给你们两个人。”然后全体参加者一起“接堵阿”①，婚礼即告完成。其后是谢主婚人、证婚人、来宾等。至于其他“会亲”见礼等与老北京习俗没什么两样，只是不下跪磕头（因为回民除礼拜外不准给人磕头）。很早有作揖单腿跪“打千儿”的，以后都是鞠躬了。这是三四十年代的一般习俗，更早一些新娘并不在席前与新郎并站在一起，而是在屋内跪坐，只有新郎一人在席前，但新娘需听得见阿訇的证词，不能距离太远。过去回民对于“依扎布”礼仪很重视，尽管家道贫穷，其他礼仪、聘礼、请客人等都免去，也要请阿訇写“依扎布”，只有这样婚姻才算合法，符合教规民俗，否则就是非法同居，为人所不齿。到了解放前，已有汉文的结婚证书，有的兼备阿文、汉文(政府制定的)两种，有的则在汉文证书上加写阿文内容合而为一。

5．丧葬

回民过去很少能在病重时入医院治疗，病死多在家中，也还有病人希望死在家中的习惯。解放以后，经济和医疗条件都已有改善，仍有人在医院病危，医生表示无可挽救时，要求出院，以便死在家中。这有两种心理，一种是基于宗教信仰，认为人死灵魂并不消失，而是离开肉体躯壳，所以希望灵魂是从家中出走；另一个非宗教的原因则是希望在弥留时，子女至亲守在身旁，而医院不可能有很多子女亲友相陪在身边。

回民的丧葬习俗本是比较简单的，概括起来称为“洗、包、站、埋”。

洗，是洗尸体。回民称尸体为“满一台”（阿语，尸体），

① “堵阿”，阿语译音，意为祈祷，“接”是汉语。因祈祷时最后阿訇默诵祈祷词，与跟随的穆斯林一起，都是捧双手于胸前，如接受东西的姿势(手心向自己面部），默诵完了，一齐以手拂面，回民称“接堵阿”。

或“埋体”，成了“埋葬的尸体”的音义双关词汇。人死以后停放在有框的木板上，木板包以铁皮，下方有洞，以便洗尸体时水流出。回民称之为“水溜子”。“洗”由专司殡葬事务的回民(称“洗埋体的乡老”）进行，也有的是由宗教师或死者家属进行。然后就是“包”，即用白布（阿语称“凯帆”，意为尸衣）包裹尸体。先给尸体穿上内衣（无袖、自颈至脚），再裹上大小两块白布(称大、小卧单），妇女除这三件外，还有盖头、裹胸布等。现在男子也有戴一白帽者。“站”则是宗教仪式，称“者拿在”（阿语，殡礼）。这项仪式是由伊玛目或宗教师带领死者家属亲友为死者祈祷，由于是站着进行，回民习俗称为站“者拿在”。最后是“埋”，即施行土葬。在坟地先挖一个长约两米，宽一米多，深两米多的坑，称为“明坑”，然后向一侧开一窑洞（阿语称“喇哈儿”），窑洞高约一米，长、宽以能放下尸体有余为度。下葬时将“埋体”抬至坟的明坑，坑内站立一人，接住“埋体”放入窑洞，露出“埋体”面部。一般在窑洞内放些香料，以防虫蛀尸体。窑门用土坯或砖堵死（称“叉喇哈儿”），有的再加一块大于洞口的木板或石板（称“喇哈儿板”），以防回填土时把砖挤倒。原挖的明坑回土填实，这样“埋体”安葬在一个有空间的窑洞之内。上面堆土为坟以为标记。在封好窑洞门开始回填土时，宗教师诵经祈祷，参加殡礼的亲友“接堵阿”，全部殡礼就完成了。有的在亲属回家以后，再次诵经祈祷，并招待客人。在地下水位较高或沙土地土质松软，不能掏成窑洞的地方，就要挖成大坑，用砖砌上四周，放进“埋体”后，上覆以木板或石板、洋灰板盖住，所留空间与窑洞相同，上边回填土，回民称为“塔布”（不用砖砌完全用木头制也可以，没有底，称“塔布匣子”）。总之，回民风俗尸体必须放于土地，没有棺木，只用白布包裹，贫富相

同，没有任何陪葬品。时间既久，尸体即腐化在土壤之中。抬“埋体”时所用的木匣，下边是一个有框槽的木板，木板是活的，上边放活盖。将“埋体”运送到坟地，回民不称送殡，而称送“埋体”。对埋葬很少说“埋葬”，而说“入土”，或直截了当说“埋了”。“埋体”入葬后，匣子仍抬回，是公用的。“埋体匣子”和“水溜子”，过去清真寺都有。解放前，牛街有回民殡葬抬埋会（是尽义务的群众组织），也备有木匣，上覆盖匣罩，为绿丝绒黑边，上有黑绒的阿拉伯文。现在上述的殡葬从洗至埋，都由“牛街回民殡葬服务所”料理（各区都有回民殡葬服务所）。公用的埋体匣增加了用后消毒的措施，增置了木框铁纱和竹制的匣子，更为轻巧，运送“埋体”有专用的汽车，这都是解放前所没有的。牛街回民殡葬服务所使用的“埋体”车，是旅居香港的回民所捐赠的。

北京过去回民的坟地是私人所有的，只有一小块地称为“义地”，用于埋葬无坟地的贫困户或外地穆斯林。牛街回民的坟地多在阜成门外三里河村洪茂沟一带。解放后，因城区建设扩大，至1957年回民坟地分两次已全部迁至颐和园北西北旺的回民公墓，现在在卢沟桥西的芦井村山上又开辟了一块回民公墓。在社会上施行火葬的今天，回民是政府允许遵照少数民族自己的风俗习惯进行土葬的。

回民的丧葬习俗，本是比较俭朴的。但在过去也受整个社会的影响，增加了不少原非回族的习俗。如学了出殡讲排场，抬送“埋体”也用出殡用的大杠，穿孝，为死人号啕大哭（这在伊斯兰教是禁止的）。也有大摆宴席（无酒）的。这种奢侈靡费之风，早在1936年牛街搞的“正俗会”就纠正过。今天穿孝之风在牛街回民中已很少见，子女戴个白礼拜帽，臂上佩带黑纱已很普

遍。设宴之风已无，一般只招待去坟地回来的至近亲友吃顿便饭。

另外，在宗教仪式上，在旧社会也增加了很多伊斯兰教经典上没有的祈祷活动，就不一一列举了。如纪念先人的“追思”活动，在人死后的七天、一个月、四十天、周年和死者生日（称冥记），在家诵经祈祷，或到坟地“游坟”（回民不称上坟。游坟有探望之意，有的诵经，有的不诵经）。在家诵经的也有请亲友的，当然要炸油香待客等，但并不是都这么做，也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做，没有严格的规定。

6．服饰

回民服饰，在牛街与汉民没有什么严格区别，但有习惯与爱好。男人戴白帽子是比较普遍的。白帽子称礼拜帽，礼拜时戴，平时生活中也戴。戴白帽源于阿拉伯风俗，这与阿拉伯地区阳光强天气热有关。白色可以反射阳光的辐射。过去回民还有一种六角帽子，是六个长方形联接成圆形，往上是六个三角形攒成尖顶。多用有色的布料或缎料制做，也有纱料制的。不过这种帽子在牛街30年代就已很少见了，被认为是守旧派① 的帽子。过去牛街回民也只有在礼拜时才戴（不像白帽平时也戴），特别是阿訇，礼拜时要缠“太思他尔”（阿语，即缠头布），戴这种六角帽，布缠在帽的外沿，留出一段垂在脑后，帽尖在上方露出。现在北京已见不到这种帽子，西北地区仍有戴的。

妇女的盖头现在只有在礼拜时才戴，在牛街一般日常生活中

① 守旧派：中国伊斯兰教有称为“古行”的教派（阿语称为“格底木”，意为“陈旧”、“古老”），原是相对新派说的，新派称“伊合瓦尼”（原意为兄弟），守旧派（即古行）保守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的一切习俗规定，新派提倡尊经（古兰）与圣训，改革旧的不符合教义的习俗，不承认寺与寺之间有隶属关系（因此称兄弟）。

早已不见了。伊斯兰教规定妇女不能露出头发，所以盖头有些像航空帽子只露着脸，盖布披在肩上，在下颌处有钮扣或带子系住。

在穿着上，过去男人穿短裤要过膝盖，女人不能露臂和腿，当然现在只是在礼拜寺内仍遵守这些原来是教规的习俗。过去中年以上的妇女喜着坎肩，穿在衣服外边，而且比较长，现在仍有老年妇女织毛线坎肩这样穿着，在其他地区比较少见。到40年代，在家中操作的牛街老太太还常穿一种半大褂子，比上衣长比旗袍短，将及膝盖，这不是回族特有的服装，大概是满族的装束。

7．回民住宅、陈设

过去回民几乎家家门框正上方有“经字堵阿”（即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横牌。铜制、木制和纸印的都有，现在有伊斯兰教协会制做的铁制搪瓷的），以示与汉民户的区别。所刻写的内容并不一律，有的是“太思迷”，有的是一段吉祥祝福词句，赞颂真主、穆圣的祝词等等。“经字堵阿”的由来，没有详细的考查，但在国外，穆斯林家庭门口都没有，大概由子中国穆斯林与汉民共居在一起，汉民门口有门联桃符，为与汉民区别开来，标明是回族户，而创造了中国回民特有的一种风俗。而且愈是在杂居地区，设“经字堵阿”的愈认真。

在旧社会房内陈设也有特点。一般回民家庭，进门正面不论是八仙桌还是条案，正中放“炉瓶三设”，有《古兰经》的，则在两旁放经匣，经匣内各放15册（过去的手写本《古兰经》都装订成30册），前边不放杂物。经匣的两侧则放瓷帽筒、尊罐、掸瓶、瓷盘或玉石盆景等物。也有的在正中放一本“亥提”（又译“赫提”，是《古兰经》短篇选集），前边放一香炉。有的宗教

信仰虔诚的乡老之家，在明间客厅挂阿拉伯文书写的对联、横幅、中堂。没有“炉瓶三设”与《古兰经》的人家，有的在桌案正中放半米来高的红木箱（内有抽屉放重要物品钱财，称“官皮箱”），上放拜匣，拜匣之上放一香炉。一望而知是穆斯林家庭。牛街这种陈设的习俗，比较保守的家庭一直沿续到十年动乱前。动乱中大破所谓“四旧”，香炉、瓷器等都被抄或被迫交出。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落实政策，“炉瓶三设”等物凡可以找到的都已发还。

8．过去的陋俗

举三个事例：其一是忌歇日。在本世纪20年代仍然流行。“歇日”是社会上的星期二，牛街俗称为“老歇”，这天不办喜庆事，不定约会，甚至不走访，干脆叫“诸事不宜”。“歇”字是从波斯语“歇勒闪白”译音来的，恰与汉语“歇”字意思相合。相传穆罕默德逝世在伊斯兰教历十一年（公元632年）3月12日，这天是星期二，所以把它作为“忌日”，在这天避喜庆事。但在30年代除婚礼避开外，已无人再忌讳。其二是“瞧经”（看经）。把自己的困难、疑问告诉宗教师，请宗教师看经“找答案”，付给报酬。当事人随便翻一页《古兰经》指一段文字（一般不认识阿拉伯文），宗教师按文字信口解说，与拆字测卜吉凶差不多。这种迷信早已破除，没人去干了。其三是“喝堵阿”，或叫“喝经字堵阿”，不仅迷信而且不利于健康。有了病，特别是小孩惊悸发烧，请宗教师在盖碗的碗盖上用朱砂写上一句阿拉伯文《古兰经》（称为“经字堵阿”），用水冲喝，这是从道教画符治病来的。过去所以有人信，其实是朱砂起的作用，朱砂有安神镇定解毒的药效，特别是对小孩惊悸，可以暂时起些镇定的效用，与所写的经文内容毫不相干，相反往往因此延

误了治病。这类陋俗早已被抛弃，就是在解放前的40年代，就已无人相信了。

## 三、节　　日

北京回民过的开斋节和宰牲节都是伊斯兰教的节日，其中对开斋节的过节活动更受到普遍重视；已由政府定为民族节日，回族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开斋节放假一天。

1．开斋节。希吉拉历（伊斯兰教历）的九月是伊斯兰教的斋月。斋月完了到十月初一开斋，这一天就是开斋节。阿拉伯语音译为“尔代费吐尔”，“尔代”是节日的意思，“费吐尔”是开斋，但回族习惯称开斋节为“尔代节”，也称“大开斋节”。新疆维吾尔等族则称“肉孜节”（波斯语“斋戒”音译）。

穆斯林在斋月中每天后半夜起床吃饭饮茶，自拂晓起开始不饮不食，称为“封斋”，直至日落“开斋”始进饮食。回族也称为“把斋”（把守坚持斋戒的意思）。到希吉拉历十月初一开斋节就不再把斋，恢复正常饮食生活。

开斋这天仍是未明时起床，洗漱之后，忙吃一物，表示开斋了。阿拉伯风俗是吃椰枣，北京回民则吃加糖和桂花的煮红枣，称为木樨枣。家中多有炸油香的。上午到礼拜寺去“会礼”。平时不常到寺礼拜的人这天也参加“会礼”。过去这天牛街人如潮涌，人人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在礼拜寺前施散“乜帖”给穷人，到寺内拿出“费吐尔乜帖”（开斋捐）交给寺内管事人，沐浴以后上殿（礼拜殿）听阿訇讲“卧儿滋”（阿语，宣讲教义），然后礼拜。礼拜完了节日祝贺就开始了。首先在寺内不论熟识或不熟识的人，都互相问候，互致“开斋好！”然后到亲友家

祝贺，有的还互赠油香。牛街近年来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斋节所有商店供应特别丰富，附近清真饭庄、食品店也出摊售货。居民则把院内的盆花拿出来摆在门口，牛街街道办事处和民族工作部门都组织庆贺活动。政府领导也到礼拜寺祝贺节日。开斋节上午通过牛街的公共汽车改道行驶，外国穆斯林来此做礼拜，汽车停放出很远的一列长队。牛街是一派节日景象。

2．宰牲节。是希吉拉历的十二月初十日，相距开斋节70天。阿拉伯语音译为“尔代艾祖哈”，也称为“古尔邦”节，（“古尔邦”意为献牲）。俗称“小开斋”。伊斯兰教规定九月是“天命”（安拉命令）必须把斋的，以后还有两个月并非必须，但也可以继续把斋，两个月到“古尔邦”节是“副功”①，所以叫“小开斋”。

在西北地区宰牲节也称忠孝节。节日的来历是这样：真主命令信徒易卜拉欣杀死自己心爱的儿子伊斯马仪，以示自己的忠诚。易卜拉欣告诉了儿子，儿子为孝敬父亲同意了。当准备杀他时，真主命令以一头羔羊代替了伊斯马仪。宰牲、忠孝是从纪念的行为或涵义上汉译的。宰牲以羊为主，也有宰牛、驼的（提倡把肉分给穷人，也可自食）。牛街习惯凡是宰牲的人家，把肉分成若干份称为“份儿肉”，馈赠亲友，受礼品的不称谢，而说“定您的份量儿”，这里“份量儿”，不是重量，而是尊重教义的福份的量。宰牲不是家家如此，只是有经济能力的才办。一般人则上午到礼拜寺参加“会礼”，拜后互相祝贺，牛街回民互问“小开斋好！”遇外宾则称“穆巴拉克，古尔巴尼”（古尔邦吉庆）。这个节日在新疆要比开斋节隆重得多。

① 穆斯林在天命的、典礼的（宗教规定的）、圣行的（穆罕默德做过的）宗教功课以外，自愿举行的其他宗教功课叫副功。被认为“为之则美，不为则无过”。

除这两个节日外，作为伊斯兰教的纪念日，还有一些，北京在“圣纪”有活动。“圣纪”即穆罕默德的诞辰和逝世忌日，同是希吉拉历3月12日。牛街称为“办圣事”。过去办圣事要集资宰牛，“开经”（诵古兰），熬肉粥，炸油香在礼拜寺招待所有参加者。熬肉粥是回民特有的风味食品，用大麦米加牛肉、盐，熬成粥，但习惯只有在“圣事”时称肉粥，平时吃用大米做的称“一锅熟”。牛街近40余年来只是经常进寺礼拜的男女乡老诵经纪念，请阿訇宣讲穆圣生平，很少大搞圣事活动。过去也有把开斋节、古尔邦节加上圣事称为三大节日的说法。

# 结 束 语

《北京牛街》一书历时数载已经编完付梓了。对于这样一条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街道，是很难详尽叙述的。例如：牛街回民习武人员很多，谭腿、形意、通臂诸家均有传人，30年代尚有张玉莲等老镖师健在；掼跤也有名手，牛街解放前还有“跤场子”，很多人都会石锁、踢毽等本领，因资料不多未能编入。再如牛街清真书报社，从1922年前后，宗教师马魁林（字星垣）在马连福宗教师帮助下，为经堂小学刻印阿文经学教材起始，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欢迎，后从木版改为石印，创办了“牛街清真书报社”，由马魁林的次子光道、四子中道经营，复得在土耳其留学的马宏道、明道兄弟的支持，业务逐渐发展；王静斋大阿訇也把译著交该社出版。他们还首创了以阿拉伯文、汉字译音和汉文译意三对照的办法，石印了不少手写的伊斯兰教经书，并编辑铅印《正道》月刊，木刻印刷《清真大学》等多种汉文伊斯兰教书籍，行销全国各地。解放后，领有出版执照，1956年公私合营时，马中道到新华书店工作，该社遂停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交出了全部存版，现已不知下落。该社和牛街地区的其他文化、出版工作，因资料不多，仅志于此，不再单列篇目。牛街人物，夹叙在各有关章节之中，没有列项详述。此外，十年浩劫牛街所受破坏，虽在有的章节略为涉及，但应写出留作后人借鉴之事尚有很多，这本书既以解放初期为时间下限，也只好留待以后另作记

述。

本书在写作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师赛生发帮助借阅资料，甘肃省政协常委马汝邻、东四清真寺安士伟阿訇、牛街礼拜寺石昆宾阿訇还帮助审阅了部分初稿，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姜立勋主任和彭年同志，审阅了全稿，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宣武区政协的白宏生同志为征集稿件四处奔走，还有很多同志给予我们帮助，不能一一列举，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要提到的是，曾为宣武区政协撰写过牛街史料的回族前辈杨汝佶、马汝邻、王梦扬三位老先生现均已病逝，谨在此表示深切的思念。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年10月